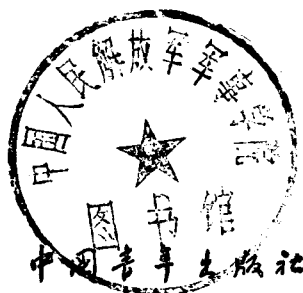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要

庄福龄主编



封面设计：邓 中 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要

庄福龄主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2.75印张 240千字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0册 定价1.15元

编 者 的 话

本书力求用不太长的篇幅和简明的结构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本书的前三章着重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后三章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本书可供青年自学用，也可供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用。

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绩，首先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理论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历史上其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此，本书对正文中没有适当介绍，而一般青年又不太熟悉的若干重要人物，还以附录的形式作了简要的介绍。

为便于青年自学，本书每章均附有复习思考题和学习书目。

本书是集体编写的，各部分执笔者如下：前言：庄福龄；第一章：冯景源；第二章：冯景源，庄福龄；第三章：庄福龄；第四章：谢浞波；第五章：唐源昌；第六章：张荣吉，谢浞波，庄福龄；附录是参加编写的所有同志共同写成的。全书由庄福龄主编。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中国

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也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许多帮助。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在我国还开始不久，本书在许多方面还是不成熟的。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	1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点和学习态度、学习方法·····	2
三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意义·····	8
复习思考题·····	12
学习书目·····	13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4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14
二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精神与他们立场、世界观的转变·····	22
三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	50
四 对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批判。唯物史观的制定·····	56
五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	65
六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	75
复习思考题·····	80
学习书目·····	80

主义哲学最杰出的代表·····	179
二 在建党和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列宁为捍卫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	190
三 在回击哲学修正主义思潮中列宁对马赫主义 哲学的批判·····	204
四 在研究认识论的基础上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 发展·····	221
复习思考题·····	234
学习书目·····	234
第 五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 列宁的哲学思想(下) ·····	235
一 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	235
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 展·····	240
三 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	258
四 斯大林的哲学思想·····	276
复习思考题·····	286
学习书目·····	286
第 六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 毛泽东哲学思想 ·····	288
一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88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304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 中多方面展开和成熟·····	330

复习思考题·····	368
学习书目·····	368
附录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若干重要人物简介 ·····	369
附录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大事简表 ·····	381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为青年同志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写的。作者希望同青年朋友一道来追溯这段关系到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历史。这段历史已经走过了大约一百四十年的战斗历程，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是内容却很丰富、很深刻，值得我们下功夫去学习它、研究它。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研究什么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应当学习哪些文件和著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形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孕育、萌芽到形成、发展，不仅有自己的历史，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既要忠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历史，更要深刻地阐明它的来龙去脉、演变条件和根据。为了实现这一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当把历史上影响和决定哲学思想发展的物质条件、社会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对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哲学概括、理论斗争的哲学分析等等作为

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比较系统、比较集中的反映，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关的历史文献和重要著作，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中的哲学思想。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主要的教材。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点 和学习态度、学习方法

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门科学的特点，采取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是建立在大量的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基础上的。而历史的变化、兴衰和得失，从来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绝不能随意地加以解释，更不允许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贯坚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解释历史，既如实地反映历史的进步，把它作为继续前进的起点；也从不讳言历史的曲折和倒退，把它看作前进中的插曲，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课堂。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历史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历史的未来也正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历史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因此，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努力澄清对历史的歪曲，杜绝脱离历史的空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学习这门科学的正确态度。

历史也是变化发展的、充满辩证法的。尊重历史也就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把历史当作一个多方面联系的、错综

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通过两种哲学思想的斗争来实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果脱离历史的矛盾和斗争，不仅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辩证过程，而且会把它弄到绝对化和僵化的程度，走向自己的反面；同样，如果脱离历史的多方面的复杂联系，仅仅依靠罗列历史事件和任意抓住个别事例，也是不可能反映历史的本质和全部联系的，只能是一种连儿戏也不如的方法。总之，违背了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的错误，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弄的面目全非。因此，坚持全面地、发展地研究历史，辩证地分析历史，同样是我们学习这门科学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历史科学的特点，就能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种种歪曲，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家们，总是力求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玩弄各种历史事例，抽取各种历史片段，随意地解释历史，以论证他们的观点、适应他们的需要。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4 年起就建立了亲密的战友情谊，尔后的四十年是他们在理论上的紧密配合，相互支持，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但是有些人却硬要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矛盾，制造他们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本来马克思是从人性论走向阶级论，从人本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有些人却硬要开历史的倒车，把前进的历史说成后退的历史，把转变前的思想说成发展的“高峰”；如此等等。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同时也是以研究理论思维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特点也必然要反映到这门科学中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己的历史中所一贯坚持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同样应当成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坚持的态度和方法。

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重要的问题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哲学来说，它首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它的发展也是由实践所推动的，哲学的生命力要由实践赋予，哲学的正确性要由实践验证。因此，哲学要经常倾听实践的呼声，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永远面对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但是，哲学思想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巨大的能动性，它并不总是一步一趋地跟在物质条件后面，它自身同先驱者的思想资料有密切的联系，有继承关系，因此历史上往往出现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而哲学上却处于领先的地位，例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英国，而它的唯物论却处于领先的地位，十九世纪的德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英法，而德国古典哲学却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的高峰。并且，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一经产生又会发挥启迪、组织、动员、鼓舞的积极作用，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哲学还能

通过对人们理论思维和实践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把人们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密切结合、高度统一的历史。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不可能懂得这段历史，学好这门科学。

坚持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就是在学习中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范畴、规律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范围中去理解，又要从历史发展和认识发展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既要注意逻辑分析的历史背景，又要研究怎样从历史中作出逻辑分析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重要的思想观点，都应当具体分析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它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它同以前的思想相比是否有所前进，它的前进和发展表现在哪里，它在理论上作过什么样的贡献，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影响和作用，等等。既不要把我们所能了解的思想，硬挂到古人的名下，也不要用我们今天的理解，对古人求全责备。总之，对任何具体思想的分析和估计，都必须注意其历史性，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要贬低某些思想的意义和作用，轻率地否定其发展，也不要拔高某些思想的意义和作用，对发展任意地加以滥用。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伟大成果。但是它的正确和伟大，绝不能归结为某些人“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恰恰是他们艰苦实践、勤奋学习的结果；它的正确和伟大，也不是一步登天、结束真理，

而恰恰是不断地开辟着认识真理的道路，发挥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科学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已经达到的成果和结论，而是取得这些成果和结论的认识过程，探讨过去是怎样认识世界的，从过去到现在，认识又是怎样发展、怎样逐步深入的，总结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从而具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情况下是怎样分析和总结社会发展过程的，是怎样吸取和改造科学和哲学的成就的，是怎样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又是怎样确定改造社会的方向的，等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供给人们的，不仅有各种具体的认识成果和结论，而且还有在认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科学的方法论。

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到，离开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同样也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好这门科学。

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首先要在判断一切事物的是非功过上找到一个客观标准，而不能人云亦云，以某种主观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形成阶段，就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各种各样的主观标准从自己的哲学中排除出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无数经验证明，只要实践标准深入人心，各种主观标准就会失去立足之地，科学思想就会兴旺起来；而实践标准的任何削弱，就意味着各种主观标准的复活，意味着迷信思想的泛滥。

实践本质上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因此，坚持真理的实践标

准,就必须同时坚持群众观点,相信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依靠实践和群众,在前进过程中不断战胜各种迷信、蒙昧和思想僵化,从而展现了一部科学的哲学发展史。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区别于其他哲学史的独具的特点。而离开了实践和群众,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更不可能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当然,尊重实践并不意味着轻视理论。尊重群众也不意味着否定个人的作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和有关活动,正是为了更好地、更充分地反映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只要不神化个人,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充分地重视个人的作用,实事求是地阐明和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有关著作和活动,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自然始终贯穿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无产阶级绝对不是一个狭隘的宗派主义集团,它没有任何损人利己的私心杂念,它的利益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是完全一致的。这个阶级的革命性恰好在于它能用彻底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也包括对待自己。“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①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注意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而不要把它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们对立起来。既不要因为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而放松了严格的科学要求，也不要因为强调科学态度而不敢坚持无产阶级原则。

三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极其重要的科学，它应该成为我们青年的必修课。这门科学以它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革命先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历史经验的极好的课堂。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一个光彩夺目的青春年华。年仅十七岁的马克思，就决心选择一种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二十四岁的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以他手中的批判武器同反动统治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恩格斯在二十三岁时就写下了天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新世界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在二十七岁时写成的，而新世界观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则是年仅三十岁的马克思和二十八岁的恩格斯合作写成的。他们青年时代作出的这些不朽贡献，绝不是轻易得来的。从他们面对现实生活，探索社会改革，不断自我改造，到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经历了十分艰苦的过程。他们的生活经常是在警察的迫害下和背井离乡的流亡中度过。他们敢于面向真理，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那些阻挡历史前进的“庞然大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严格地解剖自己，坚决地同旧我决裂，从信仰

黑格尔到批判黑格尔，从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到彼此分道扬镳，从自命为费尔巴哈派到转变为费尔巴哈的批判者。他们走的是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道路，也是不断清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道路。

即使在他们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后，也没有就此停止下来，而是继续在新的革命实践和深入的科学研究中检验和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使其达到更加系统、更加完善的程度。如果从《共产党宣言》问世后算起，他们分别在三十多年和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把新的世界观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科学、历史等各个领域中去，为人类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试问，在当时许多重要的科学领域中，有哪一个领域没有他们辛勤的汗水和光辉的思想？在当时许多重大的革命活动中，有哪一项活动没有他们闪耀着新世界观的精辟分析和远见卓识？他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一生，也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一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之所以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胜利，是同马克思、恩格斯上述精神代代相传分不开的。由列宁等所开创的俄国革命的胜利，难道不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由毛泽东等所开创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难道不正是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沿着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所开拓的道路奋勇前进，难道不是中国青年一贯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岁月是会不断消逝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在时间的距离上也会离我们愈来愈远的，但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却永远是我们

的“传家宝”。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告诉我们：实际生活中的重大争论和是非，往往是同哲学上的根本分歧或围绕某个基本原理的斗争联系着的。因此，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不纠缠于枝节之论，而是紧紧抓住它们对基本原理的背离，展开两条思想认识路线的斗争。例如，恩格斯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是通过批判杜林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进一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列宁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是通过批判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开展认识论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毛泽东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是通过揭露它们怎样背离实践观点和矛盾观点，阐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尽管历史条件会发生变化，两条思想认识路线的斗争却不会陈旧，仍然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坚持实践观点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分歧出现，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继续，又是这一斗争在我国新形势下的集中表现。人们从这一讨论中发现，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来是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明确提出过的一个重要观点。因此，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对于当前所面临的斗争，或将来可能遇到的斗争，就不会感到突然，而对于参加这些斗争就会有更高的自觉，也有助于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地端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把各项工作做好。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告诉我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绝不是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对世界的幻想和空论，而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世界、研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观点和方法。这一世界观的强大的生命力，深深地蕴藏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中，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当着我们的世界观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的时候，它就日益广泛地被群众所接受，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的事业就不断取得胜利；而在相反的情况下，新世界观的影响就会由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泛滥而日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而失败。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以震撼欧洲的革命风暴而载入史册的，但是它却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从认识上总结了经验教训。恩格斯认为，他们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要想“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①我国革命的历史也同样说明了能不能坚持科学的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民主革命在消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后，迅速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党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建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页。

设中“左”的错误和十年内乱中发展起来的极“左”路线，则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结果，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没有得到克服以至泛滥横行的结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世界观和认识路线上象一面镜子一样，我们应当以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为借鉴，走历史的成功之路，而不再重蹈历史的复辙。这样，我们就在学习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自觉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牢固地树立起来，永远地坚持下去。

当前，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一个空前伟大的转折时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祖国和人类未来的青年一代，任重而道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广阔的舞台，同时，历史的转折对我们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看我们能不能适应转折的需要，清醒地在转折的轨道上稳健地行驶，不转向，不迷航，不被抛出轨道之外。青年朋友们，不论我们战斗在哪一条战线上，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自觉地学习和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正确地对待和接受历史经验，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都是十分必要的。

复习思考题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研究什么的？这门科学有哪些特点？
2. 试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两门科学的区别和联系？

3. 怎样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4.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什么意义? 对我们青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又有什么关系?

学 习 书 目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列 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选集》第2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见《列宁选集》第1卷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见《列宁选集》第2卷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见《列宁选集》第2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 一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经过了或正在经历着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①。这个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它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已基本完成。法国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开始的，德国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也进入了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产业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居于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因素。大机器生产使资产阶级的财富急剧增长，而无产阶级的处境却日趋恶化。本来，大机器生产可以减轻繁重的体

① 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又称工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阶级和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阶级。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

力劳动,但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机器却成了剥削和奴役工人的工具。随着机器的广泛采用,资本家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的工人,用童工、女工代替男工,从而使工人的工资下降。如英国丝织工的平均工资,在1821年为每周 $16\frac{1}{2}$ 先令,到1832年降为6先令;法国里昂工人的工资,1830年只相当于1824年的三分之一;德国工人的工资更为可怜。除微薄的收入外,还必须定期向地主交纳赎得人身自由的所谓“劳动职工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由来自发地破坏机器、焚毁工场到越来越自觉地有组织的罢工和起义;由原来着重于经济斗争发展到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些情况说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更高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的政治运动。著名的英国宪章运动、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都是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的表现。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迫切需要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首先是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为基础的,同时又与当时发生的自然科学内部的革命变革有密切的联系。十九世纪初叶,与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发

展的重要时期。工场手工业是以手工技术和工人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于分工,生产工具日益专门化,这就把复杂的工艺分解为许多个别的操作,从而使劳动工具大大改进,它为从手工工具过渡到大机器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对自然科学没有提出很多复杂的要求,而大机器生产的技术需要则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近代自然科学是从十五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当时,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人们对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认识,还处在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撇开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孤立、静止地对各类材料进行考察。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只有牛顿力学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因此,形成了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机械运动的规律当作唯一的规律到处套用,因而把世界看作是僵硬的、不变的和孤立的。不仅如此,这种世界观还往往以万物创造主的外力来回答世界变化的最后原因,从而使自然科学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

但是,自然科学本身是彻底革命的。它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同宗教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着。到十八世纪中叶,康德和拉卜拉斯的星云假说,把地球和太阳系看作是物质长期发展的结果,从而给形而上学世界观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紧接着,缺口一个又一个地被突破。地质学的产生,证明了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都有其发展的历史。在化学方面,由于用无机的方法获得了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从而证明了化学定律对于有

机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这样，就把一直认为无机自然界和有机自然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补起来了。生物学上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论证了有机界是统一的、彼此联系的。这样，“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①

自然科学的这一巨大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大发现。细胞学说，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生物学家施莱登和施旺发现的。他们证明细胞是组成动物和植物的基本单位，一切动物和植物的生长和发展都是按着细胞的繁殖和分化这一共同规律进行的。这一发现说明了生命起源的共同性，说明一切有机体都是建立在细胞自身分裂的基础上，都是对立的统一。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1842年前后，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和德国自然科学家迈尔几乎同时发现和表述的。这一规律揭示出，在自然界中，一切能量，如机械能、热能、光能、电磁能、化学能等等，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按一定比例关系相互转化。这就说明，在自然界中一切能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会自行灭亡的，证明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生物进化论，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于1859年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表述的。这一学说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454页。

揭示出,今天存在的千差万别的生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各生物之间彼此有亲缘关系,生物的进化是按照“适者生存”规律长期发展的结果。生物进化论为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的原理提供了自然科学的根据。总之,“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①

自然科学上这些划时代的发现,对自然界辩证发展过程的科学说明,都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果,逐步创立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准备了条件。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标志着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结束,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深刻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革命。但是,它又不是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而产生的。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的理论来源。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

黑格尔(1770—1831)，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主张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出现之前，有一种叫“绝对精神”(有译作“绝对观念”或“绝对理念”)的东西存在着。“绝对精神”按其本性来说是一种具有矛盾性质的活动本原。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就是万物之本，宇宙之灵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按照“绝对精神”的发展之不同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逻辑学”，这是关于“绝对精神”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出现之前自我发展情况的学问。第二部分是“自然哲学”，这是关于“绝对精神”体现为自然的学问。黑格尔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它只能在空间上发展。“绝对精神”则必须向前发展。第三部分是“精神哲学”，这是关于“绝对精神”体现为人类社会的学问。在这一阶段，“绝对精神”否定自然界又回复到自身，发展重新在思维领域中进行。不过这时的思维已经是人类的思维了。在这种思维中，“绝对精神”达到了自我认识。黑格尔认为，他的哲学是“绝对精神”自己发展的最后阶段。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非是神的新名称。所以马克思称黑格尔哲学是精神创世说。但是，黑格尔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对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都进行过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许多真实的情况都反映在他的著作中。他的哲学包含有不少唯物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如关于矛盾斗争是发展的源泉，发展的量变质变过程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等思想。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又和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比如，他的辩证方法断言，认

识的发展过程是没有止境的，但同时他又宣称自己的哲学是全部发展的终极；辩证方法的出发点是一切都在发展和变化的，而他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却把自然界看作是某种凝固不变、永远如此的东西；辩证法要求承认人类社会是充满矛盾、永远发展的，而黑格尔却主张封建君主制和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妥协，从而想把用宪法略加修改的普鲁士封建君主制，宣布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这一切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被束缚在形而上学的体系之中的。因此，在现有的形式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根本不能适用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摆正了原来头足倒置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摒弃它的形而上学的外壳，拯救出合理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

费尔巴哈(1804—1872)是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他最初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者。在柏林大学他听完了两年黑格尔的课。但由于不满意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他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1830年匿名出版了《论死与不死》的著作，因为反对宗教个人不死的理论，被迫结束了在官方学院讲学的生涯而迁居农村。但他没有中止自己的哲学研究，1841年发表了著名的唯物主义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在这部著作里，他鲜明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承认自然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认为自然是人据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和人之外一无所有，宗教所捏造的神不

过是人的幻想的反映。当时，在德国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宗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基督教的本质》对于人们的思想起了极大的震惊和解放的作用。恩格斯曾经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

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他的全部论断的基础是抽象的人，即被他看做是生物学上的“一般人”。费尔巴哈把这种抽象的“一般人”称作“类”，亦即作为跟其他的人群具有相同的各种生理学特征的人来看待。费尔巴哈作为“类”的人的实践，主要是消费的实践，或如他说是“饮食”的实践，而不是生产实践，不是积极活动的实践。离开了生产实践，就不能进一步理解人的社会活动，不能理解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本质。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锋芒是指向唯心主义的，但并不反对形而上学，他注意的中心点是证明自然界的客观性，而不是它的可变性，是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客观意义，而不是它们的历史发展。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连同其唯心主义体系一起抛弃了。因此，他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乃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变种。尽管如此，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曾有过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费尔巴哈哲学中只吸取了它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的内核”，把它向前发展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思想来源。

二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精神 与他们立场、世界观的转变

阶级斗争、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但是，除了这些客观因素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努力，特别是他们的实践精神，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区别于他们的思想先驱者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们的实践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原来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即立场的转变），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即世界观的转变）。这个历史过程可分为转变前、转变过程中和彻底转变三个重要的时期。

转变前的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1818—1883)出生于曾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较大的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父亲是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律师，并被推举为特利尔律师界的首领。马克思在大学读法律，但他更为爱好和特别钻研的是哲学。马克思自1836年10月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后不久，就开始用全力来学习哲学，提出“要全力为现代哲学而奋斗”。

哲学要“为人类服务”，这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儿

劳拉的丈夫)回忆马克思时说道:“马克思曾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他最喜欢说的名言之一是‘为人类工作’。”^①为人类服务在马克思生活、斗争的不同年代具有不同的含义,表示着不同的立场。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献身于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进步的事业之中。作为中学生的马克思,就曾认为为全人类服务是一种幸福。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②。

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同时也是他对哲学的要求。这一思想集中表现为他对普罗米修斯^③的颂扬上。他认为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就是哲学的精神。马克思在他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书的序中是这样结束的: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③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决心要造福于人类,把天火盗到人间的巨神。因此,他受到宙斯神的惩罚。宙斯派他的奴仆赫尔墨斯把普罗米修斯带到高加索山钉在一块岩石上,并让一只饿鹰飞来啄食他的肝脏。被鹰在白天吃掉的部分,到夜晚又长上了,如此不已。使普罗米修斯长期遭受苦难。但是,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造福的崇高思想从未被征服。

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懦夫们，哲学再度以普罗米修斯对上帝的奴仆赫尔墨斯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你好好听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
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①

哲学的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在1843年被迫退出《莱茵报》时，在发表《声明》的同一天，同时发表了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照片，以表示他决不屈服、继续斗争的精神。

“哲学是冲上前去的工具”，这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又一特点。马克思重视哲学是从他想汇总自己的法学知识开始的。在刚刚开始学习法律知识的时候，他超过正常的要求学习了堆积如山的专业文献。但他不满足这些零星的事实和原理，想把它们融汇成一个法哲学体系。马克思在当时所接受的是康德和费希特的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青年马克思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所建立的法哲学大厦，却经受不住自己的批判而倒塌下来。他不灰心，一次又一次地从头作起，都失败了。因为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只是人的“自我”的产物，从这种观点出发，无法理解象法律、国家、自然界等等之间内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0页。

的原因和联系。不久，他开始认识到：“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①这时，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转到重视“绝对观念”和辩证发展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上来了。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和康德、费希特的哲学作了比较，认为黑格尔哲学是思辨推理的“击剑术”，是研究问题的工具。对于纷繁的事物和浩瀚的知识，马克思当时写到：“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②

从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到黑格尔哲学上来，不仅是马克思哲学观点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接近现实生活的一个转折点。马克思追随黑格尔哲学是为了要追求对现实事物的理解，因此，他很快就不再喜欢黑格尔那稀奇古怪的旋律了。当时黑格尔哲学已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分化为左右两派。以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等人为代表的黑格尔左派，又称青年黑格尔派；以加布勒、欣里克斯、罗森克兰茨等为代表的黑格尔右派，又称老年黑格尔派。由于当时马克思的思想状况，他很快就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

与此同时，青年恩格斯的革命世界观也开始独立地形成起来。

恩格斯(1820—1895)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资本主义纺

① 马克思：《给父亲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织工业的重要中心巴门。父亲是一个纺织厂主，又是一个教会负责人。这个家庭具有浓厚的宗教思想。年轻的恩格斯在读理科中学时，很有改革社会的抱负，非常希望毕业后升入大学。但是，这一志愿却未能实现。在高中毕业的前一年，恩格斯的父亲就逼着他退学去经商，他感到很不幸。但这并没有动摇他追求真理、热爱自由和进步的理想。

恩格斯追求真理和进步的思想，开始是从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的。青年恩格斯在中学时就喜爱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对恩格斯产生持久影响的是为人民传诵的英雄人物，他特别喜欢阿基里斯^①、齐格弗利德^②和退尔^③等的英雄事迹。德国文学作品中的这些英雄形象，都具有随时准备为人类作出牺牲的精神，都有坚强的性格，以及不屈不挠地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毅力。青年恩格斯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榜样。他认为应该象他们那样忠于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和热爱自由的理想，为这些理想而战斗和经受苦难。当时，希腊人正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反抗土耳其人，恩格斯很受鼓舞，曾写了《海盗的故事》赞扬这种行为，表示自己站在反对

① 阿基里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是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屡立战功。

② 齐格弗利德——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一位最英勇的英雄，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传说他非常勇敢，杀死巨龙，并在龙血中沐浴。

③ 退尔——即威廉·退尔，是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瑞士民间传说中的一位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战争的英雄人物，传说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的地方长官。

压迫的人道主义一边。

在恩格斯上中学的三十年代初期,正是德国受到法国1830年7月革命的影响,人民反封建运动逐渐发展的时期。当时人民提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的要求。随即也就在全国开始了一个广泛的反对政治迫害的浪潮。封建和反封建的斗争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热爱自由的人道主义者恩格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的。他以自己的诗篇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未来的向往^①。

恩格斯从小就受着严峻的宗教教育。他的父亲教育子女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一定遵从宗教教义。因此,年轻的恩格斯从小就受着宗教思想的束缚。当他听从父命不能升大学,不能实现自己理想道路的时候,他还曾祈求上帝把人类从种种恶事中解救出来。可是在经商的一年中,他继续学习和观察社会,到了1839年,他精神上 and 世界观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他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接触到反对封建势力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时,他陷入了对宗教信仰的怀疑之中。当时,他看到“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

① 恩格斯在他那时发表的《夜行》诗里曾这样说:“看啊,清晨即将来临,黎明前的灼灼晨星正把道路照亮。自由的钟声惊醒所有善良的人,预告着欢乐的和平,暴风雨不再临降!”(《恩格斯传》,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0页。)

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① 为了要冲破宗教思想，这位 18 岁的青年，熬过了几个星期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写信给他的友人说：“我每日几乎整天都在祈求真理；自从我开始怀疑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我仍然不能再信奉你们的那种信仰。……我到处探求真理，凡是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的地方我都探索过了；但我仍不能把你们的真理承认为永恒的真理。”^② 恩格斯有着坚定的性格和毅力，他一旦确立一种观点时，就认真地并始终不渝地为之而斗争。“我陷于极度困扰之中，……但当我确信不疑地接受了一种信念之后，我是不能、也绝不愿意走回头路的。”^③ 经过激烈地内心斗争之后，年轻的恩格斯终于冲破了宗教的枷锁。

青年恩格斯也是一个向封建势力宣战的民主战士。在当时的德国，反对宗教是和反对封建势力紧密联系着的。冲破宗教束缚的恩格斯却象获得自由的鸟一样飞行起来。恩格斯受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由衷地希望有一天“德意志的七月时光”终会来临。但是，普鲁士国王对革命人民的迫害，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当时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反动势力都是以普鲁士国王为头子的。普鲁士国王既是教会的首

① 恩格斯：《乌培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98—499 页。

② 转引自《恩格斯传》，三联书店 1975 年版，第 24 页。

③ 同上书，第 30 页。

领，又是一切进步力量的死敌。对于反动的普鲁士国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对他恨之入骨。假若我对这个坏蛋不是蔑视到如此地步的话，那末我对他的憎恨将会更甚。”^①他希望总有一天“各个山上的宫殿将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王侯的宝座在摇晃，祭坛在颤抖”，^②在革命的烈火中，人民从宝座上把他们拉下来。

年轻的恩格斯在批判宗教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在努力地寻找思想武器。他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施特劳斯的哲学。施特劳斯(1808—1874)是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三十年代中期，他的批判宗教的《耶稣传》一书在黑格尔学生中间引起左右两派的分化。左派反对哲学同宗教搞调和，不承认宗教教义为绝对真理。施特劳斯的观点给青年恩格斯指出了向宗教斗争的方向。恩格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头盔，现在我感到自己很有把握；尽管你们有你们的神学，我也将把你们打垮，让你们无处逃遁。是啊，……我是一个施特劳斯主义者了。”^③通过施特劳斯，恩格斯很快就转向黑格尔哲学。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吸引了恩格斯的心，他一连几个星期每天夜里都在读这部著作。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此使他受到鼓舞，以致恩格斯把它看作衡量一个人或一切事物发展和进步的尺度。从此以后，年轻的恩格斯就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用于研究哲学了。

① 转引自《恩格斯传》，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32页。

③ 同上书，第28页。

转变过程中的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于1841年4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结束大学生活回到家乡特利尔城。本来他想在波恩大学任教，希望能在大学讲坛上同黑暗势力进行政治上和哲学上的论争。7月，他到波恩去探望在波恩大学任讲师的鲍威尔^①。可是，不久连鲍威尔也被解聘，尽管他是亲普鲁士的。于是，马克思放弃了教学的想法，选择了一条实际斗争的道路。

青年马克思在他斗争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政治实践精神。当时，由于反动势力对进步力量的迫害，马克思日益感觉到，只在哲学领域内批判普鲁士反动势力是不够的，哲学家的职责应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当时的情况是，普鲁士反动政府一方面迫害进步力量，一方面又假惺惺地装着放宽对新闻出版的限制。1841年12月，国王颁布了一项关于书报检查的命令，引起了思想界的混乱。一些人认为这是“皇帝开恩的文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这是日益壮大的反封建的进步势力同普鲁士国家之间相互斗争的重要问题。青年马克思于1842年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②。他尖锐地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本质上是对公众的智慧和善良意志的愚弄和欺骗，因为“如果一个专制的国家

①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32），德国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之一。马克思在柏林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俱乐部之后，曾受到鲍威尔的重视。由于当时见解一致，马克思和鲍威尔的友谊十分深厚。

② 马克思这篇文章因在国内不能发表，便寄给在国外的德国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黑格尔左派分子卢格。1843年2月在瑞士发表。

想表现得忠诚，那它就会自取灭亡”。他的结论是：“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①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的第一篇政治性文章。如果说，以前的活动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活动的话，那么，他的政治实践活动是从这时开始的。该文明确地表明了作者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1年秋天，莱茵省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计划创办一家报纸。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一些人积极参加了这一筹办工作。1842年初《莱茵报》创刊。马克思为了给该报撰稿，给自己拟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计划，打算写几组论文，对1841年夏天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马克思从4月开始给《莱茵报》撰稿，由于他的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分析的才能，10月该报的股东们委任他为编辑。这时，刚满24岁的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成为这家重要报纸的首脑。

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不仅表明了他的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同时表明了他的哲学批判同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精神。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撰稿的出发点，并且，他也极力用这一思想来影响《莱茵报》的整个编辑部。在他还没有当该报主编时，写给该报出版人的一封信中，就希望把哲学同政治现实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写道：“正

①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31页。

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①这是理论同实践相结合这一主要观点第一次最明确的表述。在回击亲普鲁士的《科伦日报》的攻击时，马克思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②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些主要文章，正是体现着一个哲学家和实践相结合的精神。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的主要题目是为劳动者利益辩护。《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是两组重要的为劳动者经济利益辩护的文章。在前一组文章里，马克思同莱茵省议会及其反动当局开展辩论。莱茵省议会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议事机关，议员的半数乡绅，三分之一是城市地主，六分之一是农村地主。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随意立法，禁止在私家领地内和森林中采薪、捕鱼和打鸟，并通过罚款和劳役等为他们自己谋利益。马克思反对议会讨论关于以盗窃罪论处农民收集树枝的法案。他在文章中指出，法案辩护人引证的地主“习惯法”是非法的。他主张贫民所有的习俗的权利不可破坏。他指出，这些权利的基础在于所有权的某种暧昧的形式：既不是明确的私产，也不是明确的公产，而显然是中古遗制中两

①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②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者的混合物。因而，他指责地主是怎样蹂躏公理、正义和法律，是以贫乏者为牺牲来满足自己的私利。他指出：“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他的心。”^①

马克思的另一组文章，是为摩塞尔酿酒农民的辩护^②。马克思根据他收集的摩塞尔河沿岸地区酿造葡萄酒农民的贫困状况的大量事实材料，对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尖锐地抨击。这时，马克思“为人类服务”的精神就表现为为穷苦的劳动群众服务。

《莱茵报》的工作，使马克思有机会接触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特别是物质利益问题。他在为劳苦群众的物质利益进行辩护的过程中，使他在理论上有两方面的提高：一是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二是在为劳苦群众的辩护中，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是完全不行的，必须进行经济问题的认真研究。因为他看到：“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

①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② 指摩塞尔河沿岸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由于田园管理、酿造成本和包装费用的提高，而酒价低下，造成了日趋贫困的境况。为此，农民向当局呼吁并请求援助。对于这种情况，《莱茵报》驻摩塞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发表了不署名的文章。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曾指摘他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反动当局并谴责农民，说农民破产是由于挥霍造成的，要农民自己负责。由于科布伦茨无力驳倒沙培尔和反动当局的指摘，于是马克思就亲自担当了这一辩护的任务。

这些关系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① 青年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在认识上的提高，对他以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恩格斯曾回忆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② 在当时，也正是对实践斗争中提出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在冲破黑格尔的纯思辨哲学的束缚和费尔巴哈自然人本主义的影响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与此同时，恩格斯的立场和世界观也处在重要的转变时期。当马克思于 1841 年积极参加筹办《莱茵报》的时候，恩格斯于这年的 9 月因服兵役来到了柏林。这时的柏林和全国一样，正处在反对普鲁士的新浪潮中。1840 年新登基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推行反动政策，可是已经发展的资产阶级不仅要求取消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还提出了民主共和国、普选权等民主、自由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最发达的莱茵区的资产阶级创立了自己的《莱茵报》；在柏林，在哲学领域里，各种思想派别的斗争也十分激烈起来。在恩格斯到达柏林不久，谢林应普鲁士反动势力的邀请，在柏林大学讲学，以反对黑格尔哲学。恩格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斗争生活。

恩格斯到柏林之后，很快就和青年黑格尔派有了接触。

① 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16 页。

② 《恩格斯致理查·费舍》，《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587 页。

他的闲暇时间大多是在青年黑格尔派这个小团体里度过的。为了准备投入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他努力学习。除晚上做大量工作外，白天，只要有可能他就去听黑格尔学派的课程。《莱茵报》在1842年初创刊后不久，恩格斯就在该报发表文章，主张各种进步的力量应当向法国学习，反对一切过时的、不自由的东西；要信奉科学，反对宗教。同时，他也为另一资产阶级激进派刊物写稿，矛头直指威廉四世。他指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怎样顽强地力图重新把基督教直接灌输到国家里去，按照圣经道德的诫命制定国家法律。”^①这种国家，“不承认任何普遍的、公民的、人的权利”，因此，他指出：“人们对贵族的特权和一切教派的僧侣的贪得无厌却已恨之入骨，只要弗里德里希——威廉明目张胆地干起来，就不能不遭到失败。”^②这时的恩格斯已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了。

在努力学习哲学和反对普鲁士反动制度的斗争中，青年恩格斯很快成为哲学战线上的英勇战士。1841年11月中旬，谢林开始在柏林大学讲授“启示哲学”^③，一场激烈的哲

①② 恩格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37、541页。

③ 谢林的“启示哲学”，又名“天启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世界来自上帝，又以上帝为归宿；公开主张宗教高于科学，信仰高于理性。谢林的“启示哲学”是他的调和矛盾的“同一哲学”的必然产物。他的“同一哲学”认为世界开始于“无差别的同一性”，由这种同一性产生出万事万物和矛盾。但是最后，这一切又归结到无矛盾，无差别的同一，矛盾在同一那里得到调和。所以，他的“无差别的同一性”实际上是上帝的别名。

学领域里的斗争开始了。恩格斯以极大的注意力注视着这场斗争。谢林(1775—1854)原是黑格尔青年时代的好友,在政治上,他们都主张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和实行法制。谢林还因把《马赛曲》译成德文而出名。青年哲学家谢林并不信奉宗教,当时他写给黑格尔的信曾说:“我们两人也不再有关于上帝的正统观念了。”^①但到了晚年,他极力宣扬“启示哲学”,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神学家。普鲁士国家为了打击青年黑格尔派、麻痹青年的激进情绪,特邀请谢林到柏林大学讲学。谢林的讲学在哲学领域里挑起了向已故黑格尔及其哲学的战斗。

为了参加这场斗争,恩格斯于1841年11月15日开始去听谢林“启示哲学”的第一课。在谢林出场四个星期之后,刚刚21岁的恩格斯就于12月中旬以《谢林论黑格尔》为题,发表了第一篇反驳谢林的文章。随后恩格斯在1842年春天又发表了《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两本小册子。

还在恩格斯作商店学徒的时候,他就被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吸引。现在谢林以“启示哲学”贬低、歪曲黑格尔的辩证法。恩格斯满怀战斗的激情抨击谢林。他指出,谢林的哲学已堕落到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企图把哲学再度降低为神学奴婢的地位。恩格斯抨击谢林的文章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热烈欢迎,并且在哲学界和进步报刊中引起强烈的

^① 《黑格尔小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页。

反响。

恩格斯自从发表反对谢林的文章以后，越来越勤奋地致力于哲学的研究。从这时候开始，恩格斯的斗争从文学领域转到哲学领域。他不仅研究黑格尔哲学，还详细考察对宗教的批判及其最新成果。也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哲学。

和青年马克思一样，在青年恩格斯身上，在他开始政治和哲学活动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认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性格，而且表现出一种为追求自由和真理而斗争的坚毅精神。当他认识到宗教精神和现实生活的冲突时，就毅然地冲破宗教；当他接触到谢林的“启示哲学”同黑格尔辩证法相矛盾的时候，就勇敢地起来向当代的哲学权威斗争。青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所理解的、正确的认识付诸行动。恩格斯的这种精神，曾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他的思想还是人道主义的时候，他以同情人民疾苦的《乌培河谷来信》^①表示了这种精神。当他进到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时，就把矛头指向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批判中，又一次表现了这一精神。认识和行动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是恩格斯永远前进的力量所在。

① 《乌培河谷来信》是恩格斯 1839 年 3 月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文章，当时恩格斯 18 岁。他同情工人的贫困生活，揭露虔诚派教徒，因为在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他们。

马克思的彻底转变

《莱茵报》因为猛烈抨击普鲁士的反动政策，反动当局决定从1843年3月禁止《莱茵报》出版。为此，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前往女友燕妮的住处——克罗茨纳赫。在这里马克思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为创办《德法年鉴》^①做准备工作；一件是对《莱茵报》的斗争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回顾和总结。《莱茵报》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使马克思感到“苦恼的疑问”。一个是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一个是对那些肤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言论的评判。为了解决这两个苦恼的疑问，马克思认为需要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他当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后两篇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的这些文章，完成了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从而彻底完成了他的“两个”转变。

马克思的转变，表现在他对一些基本观点的阐述上。对于马克思来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黑格尔派，这是他那为人类服务的高尚志向和勇于实践的精神所决定的。经过《莱茵报》的实践斗争，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论证自己的唯物主义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观

① 《德法年鉴》是马克思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合办的刊物。1844年2月在巴黎仅出版过一期双刊号。该刊除载有马克思的通信和两篇文章以外，还载有恩格斯的两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点的论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为劳苦人民的物质利益辩护中，发现了物质利益同黑格尔的国家、法的唯心主义观点的矛盾。黑格尔认为，国家和法是符合他的绝对精神的，社会的一切现象应由这种国家和法的精神来说明。马克思发现，社会的经济因素（当时他称为“金钱”——引者）是社会一切现象的基础。当时，马克思认识到宗教、法和国家制度都是服从金钱的。马克思把金钱的威力形容为最高的神，说它是“世俗上帝”，是人世间一切神的神。因此他说：“在他（指金钱这个统治的神——引者）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①。在人们的一般看法上，好象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仆。

其次，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观念。黑格尔哲学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是绝对理念的外化，发展的原因在于精神自身的矛盾运动。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于社会自身的经济原因所引起的，它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必然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马克思研究了英国和法国的近代史，并把英法的历史和普鲁士当时的发展作了比较。他指出，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因此，马克思认为，在德国，反映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动之间斗争的

①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页。

一场革命风暴将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他认为,德国“归根到底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共和国,要以自由人们的制度来代替已经死亡的制度。”^①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历史不断前进”,而“现代德国制度是一个时代上的错误”^②。这样,马克思把自己的行动真正建立在唯物的、历史发展的观念上。

第三,是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方面。这里我们可以以马克思分析美国和法国的宪法为例。其中主要分析了人权和公民权的实质。在这些宪法上,都规定了平等、自由和安全。不用说平等和自由了,就以安全来说,“安全”是什么呢?在法律上,“安全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马克思指出:“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③安全不是超越财产和物质利益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相反,它是由财产和物质利益所决定的。这就说明,法律这一上层建筑,它是根基于财产、私人利益这些经济基础之上的。

对于法律、政治和理论来说,经济、财产和私人利益是基础,但是,法律、政治和理论并不是消极的。马克思的名言是这样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

① 《马克思致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3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6—457页。

③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9页。

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这里,可以说是对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反作用于物质的最初的经典表述。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证了意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当时的德国,在经济上大大落后于英、法等国家,可是在理论上它所达到的却是先进的水平。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落后的德国还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他们在观察邻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已经经历了。”^②因此,“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③这就是说,一个民族可以在理论上达到较高的水平,这种理论水平是与这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这是因为,它不仅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理论,而且还能总结、概括本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而且,他自己的理论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为“贫苦阶层”的物质利益辩护时,还是借助于公理、法律、寄希望于国家,虽然不是普鲁士国家,而是理想中的国家。由此看出,那时,马克思在法和国家观念上,还是唯心主义的。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看待以上问题了。在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② 同上书,第459页。

③ 同上书,第458页。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把自己的这种哲学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他所说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就是指的这种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由此看出,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是和他的立场转变紧密联系的。他的立场的转变,是通过关于宗教解放的批判来进行的。

宗教在欧洲各国,特别在普鲁士影响是极深的。因此,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注意对宗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等文章在当时都起过醒人耳目、解放思想的作用。但由于他们的思想和立场的局限性,使他们不能对宗教作出彻底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就是从天国转向人世。在这里,首先就有一个宗教解放与人类解放的问题。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人物之一鲍威尔在自己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提出“要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一切人放弃宗教”,“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的废除。”^②马克思不同意鲍威尔的看法,他认为不只是宗教解放的问题,对于现世的人的解放,应当探讨的是“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③

马克思分析说,在宗教国家里,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3页。

③ 同上书,第424页。

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解放。而人的政治解放，并不能消灭宗教，只是把宗教降低到私人的事情，只是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它还不是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在国家方面不过是那种专制的国家制度的解体；在个人方面，只是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我们所要求的是人类的解放。“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①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的概念，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当时，马克思对于人仍然是从自然意义上来理解的，还不是后来从社会的、阶级关系上来理解的人。但是，马克思是用这样的人同私有制、阶级剥削和作为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政治力量的国家相对立，认为这些现象是不符合自然人的本性的。因此，只有消灭这些现象，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

在考察人类解放的过程中，马克思分析了各个阶级的历史作用。在政治解放中，消灭的是特权，而获得的是人权，其中根本的是财产私有权，这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政治解放中，资产阶级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核心。马克思分析说，一个阶级要取得社会解放者的地位，“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优越感

①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是不够的”^①，它必须使自己阶级的解放同其他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而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使它被看作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在历史上，法国的贵族和法国的僧侣就扮演了这种角色；而和它对立的法国资产阶级正是扮演了社会解放者的角色。

在人类的解放中，人们要实现的是社会自由，要消灭的是财产私有权，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要求否定私有财产”^②。

对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这个阶级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它所要实现的社会自由，则是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这个阶级不要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这个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因而，它的解放就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从剖析宗教解放，而进一步研究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表明了他的立场从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上来了。

马克思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是他退出《莱茵报》以后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页。

② 同上书，第466—467页。

积极批判精神的结果。这种批判精神同样是和他的实践精神紧密联系着的。还在筹备《德法年鉴》时，他给卢格的信中，为即将出版的刊物提出了哲学批判的方针，这就是要“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①，“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他进一步指出：“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②马克思《德法年鉴》的文章正是这种批判哲学和实践精神的产物。

恩格斯的彻底转变

在《德法年鉴》上，恩格斯也发表了标志着他彻底转变的两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这是他在英国参加宪章运动、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和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完一年兵役之后，来到英国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工作。“英国有各种各样的财富，但它还是要饿死。”^③1842年的英国，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一百四十三万穷人，其中二十万被收容在习艺所，即人们说的

① 《马克思致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② 同上书，第418页。

③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1页。

穷人的巴士底狱。^①对于工人的悲惨境遇，恩格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决心为工人的解放探索出一条路来。通过他亲身调查和研究，他得到如下结论，在英国，“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②。

为了探索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恩格斯钻研了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和批判地研究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他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是不科学的。“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③。从1843年10月，他开始用社会主义的观点去研究政治经济学。根据他的亲自调查和深入研究，他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当时，他已深刻地认识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在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在这个大纲中，恩格斯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灾祸的根源。

① 习艺所又叫劳动院。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通过贫民救济法，强迫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失业工人接受低工资到工厂做工。凡不听从的则被送进习艺所。习艺所的生活条件极其低劣，工人必须负担各种繁重的工作。工人称习艺所为穷人的巴士底狱。

②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8页。

③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0页。

在“大纲”中，恩格斯还分析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他指出，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本是劳动创造的，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只是由于私有制造成它们的分裂。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完成之后，资本又分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殖，它的一部分又会加入资本对劳动再进行剥削。甚至利润也分裂为利息和利润本身。在利息中，这种分裂的不合理达到了顶点。贷款生息，即不花劳动单凭贷款就能获得收入。由此，恩格斯把现代社会的对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矛盾斗争，看作是深深根源于对立的利益之中。因此，只有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对立，这种反常的分裂状态才会消失。

进而，恩格斯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他说“这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规律。”^①因为商业危机证明它不是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平衡发展的规律，而是以生产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只要这种私有制存在着，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使更多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也是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

关于从政治经济学来剖析市民社会，从而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的实质、社会主要阶级根本对立的原因以及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中必然达到社会主义的重要结

①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4页。

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是恩格斯第一次作出的。虽然这还不是系统的阐述,但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河。对此,马克思曾给予高度评价,说这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①。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说明了他的立场的彻底转变。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也极其鲜明地反映了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这里着重指出三点。

第一,彻底向宗教宣战。恩格斯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自小又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宗教思想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一度摆脱宗教思想之后,经过哲学的学习和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调查研究,不仅不再信仰宗教,而且变成了一个无畏的无神论战士,成为宗教的无情批判者。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作了分析。当时,英国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卡莱尔,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时,指责这种社会精神空虚。恩格斯说,光控诉无济于事,要消除弊端,就要从现实生活中找出产生弊端的原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宗教产生的。因为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把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和美好的理想转移到上帝这种虚幻的神身上去了。但是,随着科学文化的日益发展,上帝的虚幻形象逐渐动摇的时候,人们失去了信仰,感到失望,精神上自然会感到空虚。

卡莱尔还谴责当代社会的伪善和说谎话。恩格斯进一步分析说,我们把这种伪善也归咎于宗教。因为宗教的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3页。

一句话就是谎话，它把人世间的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神学是其他一切谎话的蓝本。恩格斯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①。对于我们，只是要认真地论证宇宙的客观的内在事实，从而不受万能上帝的危害。

第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轻视历史，无视人类自己的发展，这仍然是宗教的罪过。他们编造了“天国史”来否认真实的历史。为了了解人类本身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的进步，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艰苦的斗争等等，我们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第三，阐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卡莱尔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目的是要确立“英雄崇拜”，建立“真正贵族”的领导。卡莱尔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而英雄和他的思想才是决定一切的。恩格斯认为生产的发展、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力量，而英雄人物或天才人物的“真正社会使命并不是用暴力去统治别人，而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②

从以上看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恩格斯“从另一条道

①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9页。

② 同上书，第652—653页。

路(看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②,即实现了他的彻底转变。正象恩格斯以后所说的:“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③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实现转变的过程,也是他们不断清算自己信仰过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是他们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批判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标志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代替。

三 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

因出版《德法年鉴》的大量组织工作,马克思于1843年10月底偕同新婚的妻子燕妮来到巴黎。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最初他研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在有关著作中,他看到了一些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这样,他的关于阶级和阶

①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曾表示,将在《德法年鉴》的最近几期“详细地谈一谈英国的状况,其中主要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德法年鉴》只出版过一期双刊号,以后恩格斯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出版。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③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

级斗争的观点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但是，是什么原因制约着各个阶级的产生、发展以至灭亡的呢？从法国历史学家那里得不到解答。对于这个问题，在他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于是，马克思的研究转向经济学，为了唯物地说明历史的发展，必须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这一时期，他的研究成果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

马克思这次对黑格尔的批判，是在他的立场和世界观转变之后的又一次批判。和以前相比，有着两个极明显的特点。第一，如果说以前的批判是着重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性质，那么，这次的批判则着重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这次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说，批判黑格尔的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①《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第一部独立著作，也是他思辨辩证法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表述。

前面我们讲过，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括三个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黑格尔为了建立自己的体系写了《精神现象学》（1807年）作为这个体系的导言。早在1800年，黑格尔就想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第一部分，就是作为导言的《精神现象学》。第二部分就是上面说的这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9页。

三个部分。《精神现象学》是研究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它从意识开始，进而通过矛盾的辩证发展，最后达到“绝对知识”。而《逻辑学》则把“绝对知识”当作系统的研究对象。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把《精神现象学》作为《逻辑学》以及整个《哲学全书》的体系的导言。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特别重视批判这一“导言”，就是为了从这一哲学体系的根基上揭示它的秘密。

第二，如果说，以前的批判，还只限于哲学本身，那么，现在的批判则超出了哲学，用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来论证自己的结论。马克思在序言中着重指出：“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①

马克思要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这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当马克思已经完成自己的转变，并积极地制定和宣传自己的新世界观时，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一伙却在关于历史、无产阶级以及唯物主义的“批判”上，继续坚持唯心主义，坚持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甚至“连语言上都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而且无宁说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②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以及后来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着重批判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这些批判，可主要概括为如下三点。

首先，揭露了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或先验主义的性质。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

② 同上书，第156页。

马克思指出,对于这一点,费尔巴哈早就做到了。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从实体的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①鲍威尔一伙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走的更远。从鲍威尔一伙的观点看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还不够彻底,因为黑格尔认为是“绝对精神”创造历史,而他们认为,“精神”,或具体地说,他们的“自我意识”就是一种创造的因素,他们的哲学就是这种积极的创造因素。因此,在鲍威尔一伙看来,一切历史的行动,一切改造社会的事业,都被归结为他们这些哲学家的大脑活动。^②这样,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客观唯心主义,而在鲍威尔一伙这里,则表现为自我意识的主观唯心主义了。

其次,揭露了思辨结构的秘密。这种秘密简单说来,就是从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中得出一般观念(抽象观念),然后,把这种抽象观念看作是各种现实具体事物的本质;一般的抽象观念是本质,各种具体事物是本质的不同表现;观念本质具有能动作用,这种作用就在于思辨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使总体的各部分、各环节相互联结,并得以发展,从而使本质在每一具体的形式中渐次地、有规律地实现自身,因而,也就使各具体事物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到另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9页。

一种存在形式，而后发展为显著的存在。这样，观念的本质就由精神的东西体现为各种现实的具体。可见，这种思辨哲学的秘密，就是用观念创造现实、创造具体事物的秘密。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用现实的各种具体的水果——苹果、梨、草莓、扁桃等，与概括这些水果的概念——果实为例说明这一思辨的创造秘密。在思辨哲学看来，作为观念的果实是本质，各种水果是本质的表现形式。观念的本质创造具体的现实的水果，这是思辨哲学最神秘的地方。“我们在思辨中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种现实的果实，但这些果实已经是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它们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而是从我们脑子的以太中生长出来的，它们是‘一般果实’的化身，是绝对主体的化身。”因此，当“一个普通人说苹果和梨存在着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说出了什么特殊的东西。但是，如果哲学家用思辨的术语说出这些存在的东西，那他就是说出了不平凡的东西。他完成了一个奇迹……每当思辨哲学家宣布这些或那些实物存在时，他就是进行了一次创造。”^①在这里，马克思以生动的例子揭示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观念创造世界的秘密。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讥讽为“创世哲学”。

第三，揭露了这种思辨哲学是主观构造各种体系的方法。马克思特别指出黑格尔对否定、否定的否定所作的“形式的抽象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一切现实的、活生生的变化都变为否定、否定的否定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4、75页。

成为“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正是对任何内容都通用的，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①黑格尔正是用这种抽象来构造体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里，更形象地揭露了这种构造体系的方法。他们指出：“思辨结构的主要兴趣则是‘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来自何处’正是概念的必然性、它的证明和演绎（黑格尔）。‘走向何方’则是这样的一个规定，‘由于它，思辨的圆环上的每一环，象方法的生气蓬勃的内容一样，同时又是新的一环的发端’（黑格尔）。”^②思辨哲学注重概念的发展，而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及其变化，反对一切感性的经验。马克思指出，基于感性经验的认识，人们的认识是决不会预先知道这种发展是“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的；而基于概念变化的思辨哲学，却是借助概念的“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来构造自己的体系的。黑格尔这样处理概念，是由他那绝对观念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绝对观念是独立自在的，它要发展，没有别的途径，就是把自己外化，设置对立面，即否定；可是这种对立面又没有实在的客体永远安置自己（因为客体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观念的影子，是要遗弃的东西），所以精神只得重新安排自己，使自己再结合起来，即重新回到自身，即否定的否定。观念或概念的这种发展，使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页。

他极其重视概念的“来自何处”和“走向何方”。概念的这种来和去，就是黑格尔把精神自己“颠来倒去”、创造体系的方法。马克思讥讽说，这是一种“醉熏熏的思辨”。

四 对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批判。

唯物史观的制定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时，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了很高的评价：“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①当时，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共产主义等问题上已远远超出费尔巴哈。但是，在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时，还主要采用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可是，当马克思进一步向前走时，就发现了他和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矛盾，必须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进行严肃的批判。这一工作，是通过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进行的。

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

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是从天上降到地上，即从宗教到人，从唯心主义的思辨回到了感性的人，回到了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天上回到地上，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来说，这是“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这看作为德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7—158页。

国哲学领域中的“一次空前的变革”^①。

黑格尔哲学的瓦解过程，是从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宗教开始的。1835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开辟了这一批判的先河。鲍威尔·施蒂纳以及费尔巴哈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②在这整个批判中，费尔巴哈是最有成果的一个，他从唯心主义的思辨回到感性的人，从而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威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一批判过程，使“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③。

从天上降到地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的唯物主义又是极不彻底的。这首先是他的体系是根本错误的。这种体系的论证方法不是从分析社会的经济状况出发，而是从精神出发的，即从思辨、宗教这一基础上出发的。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这一根本缺点，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不彻底性，诸如轻视感性物质的分析，忽视实践的作用，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等等。和费尔巴哈思想体系相对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说到自己的唯物主义，或这一唯物主义的论证方法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30页。

到天上”^①。这里说的德国哲学，指的是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在这一哲学中，费尔巴哈的哲学最具有代表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阐述他们的哲学体系时，首先选择了费尔巴哈的体系这不是偶然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着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 *de bonne foi* [认真地] 加以分析。”^②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系统阐述，最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体系的过程中进行的。

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对立，这里首先应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即关于对人的看法。

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从天上降到人。但是，这个人，或“人自身”只是抽象的人，是生物学上的“一般人”。费尔巴哈把这种人的本质称作“类”，即无数单独人们的共性。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③ 费尔巴哈也讲人的感性，说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这个感性并不是物质的感性活动，而是指感情的爱与友情，“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④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理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③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的人及其本质和费尔巴哈根本相反，他指的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在对感性的理解上也具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理解的人的感性是人们的感性活动，即人们对感性世界的共同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因此，对于人的不同理解，成为这两种哲学的不同分界点。费尔巴哈体系停足的地方是抽象的人，正是对这一抽象人的批判，并进一步分析现实的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出发点。他们认为，这种人是从事感性活动的即从事实践活动的真正现实的人。

新世界观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制定是一个过程。在这一制定的过程中，实践的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1888年，恩格斯在回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制定过程时说，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写的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②，这里主要指的就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提出的实践观点。马克思在这一提纲中就曾指出：“他（费尔巴哈——引者）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哩。”^③这个工作，主要是对世俗基础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③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本身进行实践的分析，它是在马克思的“提纲”中，更主要的是在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进行的。

马克思把社会的人放在世俗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时，他首先指出，人们的一切感性活动，都是能动的实践。这样，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扩展为对以往一切唯物主义的批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

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首先在制定这一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阐明了实践的能动作用。在费尔巴哈那里，只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实践，从而人的一切感性活动只是一种卑污活动的表现形式，是没有什么能动性可言的。按照这种观点，能动作用只能是被唯心主义去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能动性的观点，使唯物主义具有极显明的实践特点。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称自己的唯物主义是“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次阐述

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阐述从地上升到天上这一新的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实践观点，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主要指的是生产实践,通过生产实践,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分析,又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即揭示出国家、法、道德和宗教等的内在原因。这就是说,从地上升到天上这一思想体系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它的最大成果,是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接触社会经济的分析,也就进入了社会生活的现状和历史。现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很重视历史分析。他们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①这种历史观的观察方法,它的前提是人,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生活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只要能够描绘出这个人类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形而上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30—31页。

唯心史观不重视现实生活的分析，他们认为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在于现实的物质生活，而在于思想。宗教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认为历史的最终动力是绝对观念；在鲍威尔那里，这种动力被看作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后消失于“自我意识”之中等等。因此，在那时“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①，唯心史观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他那种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费尔巴哈对历史理解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缺乏历史的分析。他重视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的自然也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是没有历史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②

对于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的这一历史所提出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次给予了科学的回答。“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页。

② 同上书，第51页。

释观念的东西”^①。这里，物质实践指的就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有它才是说明各种观念、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只要这个由经验可以确定的感性基础被科学地阐述出来，那么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为了阐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着重剖析市民社会^②，并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③

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以下两个重要的结论：意识或意识的各种形式是由客观的物质关系决定的，因此，它们的消灭不是靠自身，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② 市民社会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在狭义上，这一术语指的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社会”。在广义上，它指的是一定社会的财产关系，即由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市民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注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是靠物质的力量，靠由物质的关系所引起的革命力量来解决。“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①，而只有实际地推翻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另一个结论是，没有由一定的生产力所达到的物质条件及其所代表的革命群众，尽管有变革的思想，那么，革命在实践上也不可能实现。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曾有过这样的情况，社会上曾经产生了变革社会的理论和革命思想，但是，“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两个结论，既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又是对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批判，这对于用科学理论指导共产主义运动是极为重要的。

对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分析，作者又进一步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③统治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44页。

③ 同上书，第52页。

阶级的思想，同代表这一阶级的人及其思想家是分不开的。这是因为这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或这种思想的生产者，为了进行自己的物质统治，就必须“调解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鲍威尔等人，以及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的错误，都是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一方面把一定时代的统治思想同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分割开来；另一方面，又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种思想又归结为元首、哲学家、思想家的作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一切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包括费尔巴哈在内，他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人及其实践活动的认识，根据对市民社会物质经济关系的分析，建立起自己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看法。通过他们对鲍威尔以及费尔巴哈等人唯心史观的彻底批判，表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历史领域中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五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形成中的地位

正象有人所说的那样，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没有一个概念、一个理论象异化理论这样受到马克思主义敌人如此大量的滥用和歪曲。这种滥用和歪曲是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于1932年发表

时开始的。《手稿》由伯恩斯坦等人隐藏达三十年之久，1932年由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S·朗兹胡特和I·迈耶尔公布于世。发表时，他们公然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作“新的”解释。他们说，《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新的福音书”。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歪曲，被资产阶级学者进一步发展，这就是后来形成的所谓的“马克思学”。“马克思学”以研究马克思为名，借《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曲解、篡改。他们伪造出一个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一个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手稿》被说成是马克思“成就的顶点”，而《资本论》则被贬低为马克思创作能力的“衰退和减弱”。他们通过曲解“青年马克思”，在哲学上，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反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割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制定和捍卫这一哲学体系上的关系。这种思想在一些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E·蒂尔在《青年马克思论人的图景》一文论证说，马克思的“人本学是可以充分阐明的……而无需考虑价值规律及其疑难问题”。R·图克尔在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他的思想从哲学到神话的发展》中提出：“至少人们可以说，关于马克思的一般观念在二十世纪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科学体系的旧观点，越来越让位于它实质上是一个伦理和宗教思想体系这样一种看法。”^①蒂尔希望要一个没有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这种“疑难”问题的马克思；

① 参见〔东德〕G·克劳斯、M·布尔：《何谓异化？》，《哲学译丛》1979年第2期，第62—63页。

图克尔则蓄意抹煞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分析的意义，从而达到贬低科学社会主义而抬高早期马克思的目的。因此，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进一步说明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什么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异化这一术语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它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等著作中曾被广泛地使用过。在黑格尔哲学里，异化指的是绝对精神的异化，是指绝对精神把自己外化为自然和历史，然后再复归到自身的过程。黑格尔极其广泛地使用了异化，以便用它来建立自己的体系。在费尔巴哈那里，异化主要用来分析宗教，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人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就是说，人根据自己的共同特性创造出上帝并把他当作世界的创造主。费尔巴哈力图克服黑格尔在异化问题上的唯心主义，他把异化的主体归结为纯自然的抽象的人。但是，这同黑格尔哲学相比，异化的活动范围要狭隘得多，异化的内容和形式也贫乏得多。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异化观念主要表达的是这样的思想：一个事物产生于另一个事物，但是当它产生之后，却反过来作为一种异己的外力同原来的事物相对立，并成为它的统治力量。因此，异化表示的是一种关系。比如，宗教本是由人脑创造出来的偶像，但它却成为一种脱离人而独立的精神力量，反过来又成为统治人们的“精神鸦片”。所以，宗教上的异化，就表示人和自己制造出的神的关系。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手稿》中广泛地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又是根本不同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异化（绝对精神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费尔巴哈是人本主义的异化（人的自然本质异化为上帝）。马克思的《手稿》讲的是异化劳动，它是唯物主义的经济异化。

马克思异化劳动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理论，说的是劳动者与其产品及其各种关系的异化，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劳动与资本、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即主要论证“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①的这种关系。马克思的异化观既吸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合理因素，又克服了他们的唯心主义或人的抽象本质的论证，是用经济事实辩证地研究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表现，是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是他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精神的必然发展。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异化劳动呢？因为他在开始钻研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一些范畴，如工资、利润、地租的分析是没有历史论证的，因而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永恒的。马克思为了建立社会发展的观念，必须批判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指出：“国民经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页。

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①

马克思为了论证政治经济学各种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关系,他的异化劳动首先从这样的一个经济事实出发: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甚至要失业。这个事实说明,劳动产品对劳动者来说已从自身分离出去,成为异己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产品变为另一部分人所占有,这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但是,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相反,“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②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本质的异化,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是逐步深入的,他指出了如下相互联系的四点:

第一,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劳动,这种劳动产品是由工人生产出来的,但却不属于工人,反而对工人来说,成为异己的力量,成为统治自己的力量。所以,马克思说:“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①因为工人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为资本家所占有，并进一步转化为资本，资本作为一种权力加紧了对工人的统治。异化劳动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说的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关系。

第二，是劳动本身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这是从结果上来考察的。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更主要的是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没有后者的异化，就不会有劳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主要是说，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可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本身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这种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到摧残。在这里，劳动异化的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其结果必然是：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②马克思把第一种异化叫做“物的异化”，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② 参见上书，第94页。

而把第二种异化叫做“自身异化”。

第三，马克思根据前两种异化进一步指出，人同自己的类^①本质相异化。人是类存在物，其特点就在于他同动物不同。动物只生产自身，只适应环境；而人是有意识的生命，他能通过自觉的活动再生产出整个自然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②人们通过自觉的实践活动改造对象、改造自然界，从而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已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等。但是，动物只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本能地生产。然而，在异化劳动的情况下，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这样异化劳动，“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③。因此，异化劳动使人失去了类本质，把人降低为动物。

第四，是人同人相异化。以上三种异化直接的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④比

① 类、类本质，这是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它表示的是人或真正人的共同生活这一概念。费尔巴哈用这一概念批判宗教，同时用来说明人不象动物那样是单个的存在物，通过“类”说明每个具体的人能够在无限多样的个人中间实现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前提是爱、友谊。人们之间的敌对关系不是来自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而是来自人的真正的类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这里所借以论证的主要是从人的自觉的生产活动同动物的本能的活动的区别来看异化现象。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③ 同上书，第97页。

④ 同上书，第98页。

如,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它到底属于谁呢?自己的活动不属于自己,它到底属于谁呢?这只能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属于资本家。“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①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

《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尽管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在马克思建立自己的科学世界观的过程中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制定科学的唯物史观的进程中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的时候,认识到对它们的理解,不能在国家和法的自身,而应当到市民社会,到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手稿》是马克思最早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富有成果的著作。在这里,他第一次用经济关系来分析当代社会两大对抗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关系。这时,它提出的异化概念不是异化一般,而是“异化劳动”,这是历史上特有的一种异化现象,一种经济事实。他要对这一现象、这一事实进行理论分析。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劳动、资本,工人的贫困,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都是当做既定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的事实出现的，他们不能也不可能说明它们产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对立，提出“异化劳动”。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看作是“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①。正象马克思所作的那样，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对劳动和资本之间本质的各方面关系作出有力的论证，说明了当代社会的阶级本质。

在历史观上，费尔巴哈从天上降到人世，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对人世的经济关系的分析，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却是无能为力的。马克思推进了历史观的发展，他在费尔巴哈停步的地方，从经济关系上去理解社会，这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就成为打开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是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重要的一步。

其次，《手稿》的异化理论，表示了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研究的结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表示出他的研究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有机的联系。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不追溯马克思经济异化提出的初始原因。我们曾经提到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遇到的“苦恼的疑问”。这种“疑问”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利益方面的，一是如何理解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面的。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当时，马克思受人道主义的影响是很深的，从人道主义出发，他同情劳苦群众，他认为劳苦群众的经济地位是不人道的，要改善这种地位，只有社会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页。

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当时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缺乏研究。马克思的实践精神，要求他从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研究中去寻找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在他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提出了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恰恰能够表示出人的不平等的原因及其消灭这种不平等的途径。《手稿》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①。并且还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需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② 异化思想在它自身的理论上乃是哲学辩证法思想。因此，异化劳动表现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把辩证法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内在地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已经表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统一的端倪。

《手稿》中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在制定新的世界观的过程中所走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它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提出的，在理论形态上，还带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特色、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对异化劳动本身的分析也还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和历史的分析中去。因此，他的异化理论还带有局限性和不成熟的性质。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② 同上书，第140页。

六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

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

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们就着手把自己的理论在那些能够把革命理论变为实践的人们，即工人中进行传播。为了使科学理论不致成为少数人的空谈，为了使工人运动不致在前进的道路上盲目徘徊，新世界观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是非常必要的。

1846年2月，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紧张地从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们就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通过这个委员会同英国宪章派的革命代表人物、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系。但是，他们特别关注的是先进的德国工人及其组织——正义者同盟^①。

正义者同盟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但是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或影响很深的是各种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共产主义。如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的空想共产主义，以海尔曼·克利盖(1820-1850年)为代表的“真正社会主义”。

^① 正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后来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即工人阶级第一个革命政党。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会上通过决议，以新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口号。

新世界观在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中，同魏特林和克利盖的斗争及其取得的胜利，在正义者同盟的发展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错误，愿意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他们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帮助对同盟进行改组，还愿意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作为同盟的纲领公开发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正义者同盟。

1847年6月初，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改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批准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谴责了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并宣布将制定一个科学的纲领。8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成立，马克思被选为支部主席，并被选入区部的领导机构。为了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底建立了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公开的工人协会的发展，迫切地需要一个以新世界观为其理论基础的党的纲领。为此，恩格斯草拟了一个《共产主义原理》的著名手稿。1847年11月28日，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党纲成了会议讨论的中心。会议经历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全体代表都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申述的纲领的原则。在讨论的基础上，大会以阶级的重任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共产党宣言》是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

列宁在说到《宣言》的意义时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宣言》在阐述这一新世界观的基本理论时，显著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宣言》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②

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们，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合理的以及无产阶级生活贫困的种种现象，但是，他们始终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这一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的任务只能是祈求于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从头脑中去创造这些条件。这样，社会的实践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物质条件要由他们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斗争要实现的社会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③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③ 如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示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

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宣言》则根本相反，它在理论和实践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哲学意义，在于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总结；而工人阶级政党在实践方面，较之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之处，在于它有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具体分析，表明了新世界观关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原理。“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①正是这些理论，又在实践上成为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的指南。

《宣言》也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到当时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即通过经济结构的研究而得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制定后，在运用这一思想武器进行斗争的初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效。马克思在回忆把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正义者同盟，变为以新的世界观和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时，客观地指出了对经济结构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说，那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的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①这是马克思所做的对魏特林、克利盖等人进行斗争的总结。《宣言》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它以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理论基础,从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建立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

理论的运用必须与实践相结合

《宣言》不仅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而且还为这个阶级及其政党提出了运用这些基本理论的根本方法,即基本理论的运用要与具体实践相结合。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的新版本合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们着重阐述了如下思想:“这些基本原理的实践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是他们理论的基本要求。这是因为《宣言》是对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指导无产阶级实践活动的理论武器。所以,它的高度的科学性和伟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同实践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

《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必须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永远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财富。

①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科学地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了制定这一阶级的新的世界观，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全面地、创造性地进行了批判研究，而《宣言》就是上述成果的集中反映。《宣言》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光辉典范。它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许多光辉的有重大意义的哲学概括。《宣言》也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纲领性文件。

复习思考题

1.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什么时代？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2.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实现“两个转变”的？实践精神对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转变具有什么意义？
3. 什么是异化劳动？怎样评价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4. 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制定过程是一个批判的过程？唯物史观具有那些具体内容？

学习书目

列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选集》第2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见《列宁选集》第1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42 卷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1 卷第 1 章），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第 二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 实践中验证和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结欧洲 革命经验中的巨大作用。 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

《共产党宣言》经受第一次实践考验

1848年2月，当《宣言》刚刚出版时，巴黎就爆发了革命。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危机和农业欠收。当时，工厂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从而加剧了广大人民对反动王朝的不满，人民纷纷起义反对封建王朝。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德国后，德意志各邦的革命就暴风雨般地掀起来。从二月底起，革命运动还席卷了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等国。在短短的数周之内，革命已具有全欧洲的性质。

这次革命，尽管在每个国家中各有其特点，但总的来看，革命的性质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比如在法国，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就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不但被排除在政权之外，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受到限制和损害。在德国，由于封建专制

以及政治上、经济上的割据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障碍。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所预见。《宣言》的最后一章就是论证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和最近目的之间的关系的。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的准备。他们特别关注德国革命的发展，根据《宣言》的原则，进一步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用以指导德国的革命。4月初，就有三百至四百多名流亡法国的德国革命工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携带着《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返回到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1848—1849年的革命斗争中去。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这次革命时指出：“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受过的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在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①。《共产党宣言》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并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

①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结革命经验中的作用

1848—1849年革命，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动摇而失败了。在法国，政权最终落到了路易·波拿巴的手中。路易·波拿巴反对民主共和，阴谋复辟了帝制。在德国，广大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市民发动了三月起义。三月起义以后，几乎所有的德意志各邦的大资产阶级自由派都参加了政权。大资产阶级在分享了政权之后，就公开和封建阶级结成同盟，反转头来镇压工人和其他民主力量。恩格斯对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这样总结的：“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器，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①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因此，“革命没有进行到底。”^②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了，但工人阶级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而革命斗争实践也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① 康普豪森-汉泽曼(1803—1890)德国银行家，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月29日，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他为普鲁士首相，由他组成新政府。新政府奉行与封建王朝妥协的叛卖政策。

② 《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2-73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以前的理论著述中，着重从经济基础上分析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根据 1848—1849 年的革命实践，他们又着重从政治上分析了国家机器的反作用。在这次革命斗争中，工人群众由于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广泛地存在着对议会的幻想。但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运用国家机器镇压工人的残暴行为，向无产阶级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即使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也只是一空想。于是，在现实斗争的教育下，无产阶级不得不用“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来代替过去那种“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① 马克思这一深刻的概括，在后来他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又作了极其明确的解释：“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② 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③ 只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从法国革命中还作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④ 的光辉论断，充分肯定了社会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巨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

② 这里的《雾月十八日》即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③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④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大作用。列宁对马克思总结的历史经验极其称赞，认为他在这里的论述比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一般的概念和表述。而在这里，对国家问题已经作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即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密切相联系，马克思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理论。如果说，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反动作用，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散布的议会幻想而提出的，那么，不断革命论则是对民主阵营中各个阶级进行阶级分析得出的。

在法国，1848-1850年的革命过程中，反动的力量（取得统治权的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与民主革命的力量（马克思称作“无政府党”）形成公开的对立。在“无政府党”中，几乎所有的阶级和政治集团都打着社会主义这面“红旗”，虽然“无政府党”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所持的社会主义思想，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条件和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在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目的上，却是一致的。

当时，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有人把废除保护关税说成社会主义，有人把整顿国家财政叫做社会主义，有人说自由输入外国粮食与肉类就是社会主义，有人把反对天主教集团的伏尔泰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等等。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将这些社会主义

在阶级实质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这是用来骗人的。而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想使革命停止在一个他们认为“理想”的阶段上。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理想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以为它能实现一切革命要求和消除一切革命冲突。

马克思在分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关系之后，提出了一种“革命社会主义”与之相对抗。“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秘密散发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中又阐述了不断革命的任务。他们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希望用限制遗产权，尽量把各种事业转归国营，以限制资本的增长；在工人方面，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及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等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来作为革命的要求。一旦上述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

①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①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考虑的是，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具体提法是过时了，但是，根据革命实践总结出来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却是有深远意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1848年革命中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法国革命中，工人阶级争得了一定民主权利。工作日从11—12小时缩短为10—11小时，争得了普选权、集会自由及一定的出版自由等权利。在大资产阶级共和派贩卖革命后，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和劳动权力^②，进行了英勇的六月武装起义。对于工人阶级这种革命精神，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③但是，在当时参加革命斗争的一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们中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②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三月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城市兴办了一些“国家工厂”，目的在于指望使劳动者放弃参加革命斗争。六月，临时政府以“国家工厂”妨碍“实业生活”和首都“安宁”为借口，要强行将工人迁往外地做苦工，实则是驱逐工人，还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是编入军队。

③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们中间，对于这场阶级斗争表现得十分无知，并且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法国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1811—1882）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以“社会主义民主派”的领袖自居，后来又是临时政府的工人问题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宣扬的是一套由国家拨款资助工人组织生产协作社的计划。这个计划反映出他根本不了解在现代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及其阶级斗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因此，他的计划是一个向资产阶级妥协的计划。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卡尔·海因岑（1809—1880）是一个激进派政论家，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中，曾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但是，他也不能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以及这一阶级斗争的规律。比如，他认为贵族地主拥护谷物法，是因为他们想“垄断”；资产阶级反对谷物法，主张谷物、棉花等的进出口贸易自由，是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等等。海因岑由于不了解阶级的本质，所以他极力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为了清除路易·勃朗和卡尔·海因岑等人的影响，在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自己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马克思指出了路易·勃朗、卡尔·海因岑等人既不懂得阶级的历史，又不了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之后，又对自己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做了新的概括：“我的

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新概括，深刻地反映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以往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的重大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新贡献，唯物而又辩证地阐明了阶级从产生到消灭的全过程，阐明了这一过程的发展都是由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所决定的，从而深刻地阐明了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这是继《共产党宣言》之后，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光辉典范。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通过剖析法国革命中的历史人物得到了发展。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就是这一发展的最杰出的成果。路易·波拿巴本来是一个平庸的军官，为什么一跃而成为国家的总统呢？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了精辟而生动的分析。首先这是由于法国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造成的。当时的法国虽然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小农人数众多的国家。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着地域的联系，还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更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

^①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67页。

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 要找一个“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来代表他们，这是小农这种分散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其次，为什么这个代表就找到路易·波拿巴呢？这还有社会历史和旧的传统势力的原因。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农民怀念十八世纪末叶拿破仑一世制定的宪法，怀念那时的土地法。他们把路易·波拿巴和拿破仑一世联系在一起。这种“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② 于是，农民们抱着天真的幻想，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仅仅三年就进行了政变，接着又复辟了帝制。第三，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行径之所以得逞，除了依靠骗取农民的信任外，也和他个人的品质、特点密切联系着。“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所依靠并用来进行党派斗争的是一个叫做“十二月十日会”的秘密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赌棍等等。因此，“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③ 最后，他还善于利用舆论工具突出个人的宣传。大

①②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699、661页。

型的官方报纸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都被他用来为自己的行为捧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其人的分析，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人物的光辉典范。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经济学研究 相结合的伟大成果。《资本论》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内容，但是，它的发展，却因为历史条件不同有时把注意力放在这一方面，有时则放在另一方面。“在德国，在 1848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 1848 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特别突出，在 50 和 60 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①如果说，1848 年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注重的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断革命等政治思想方面，那么，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阶级解放，除了在组织上建立自己的政党之外，主要的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教育。在理论研究和对工人的理论教育中，马克思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马克思分析了 1848—1849 年革命过程中的一些激进分子的情况后指出：“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

①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59 页。

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①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于1843年。1848年—1849年的革命中断了这一研究。但是，革命实践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欧洲革命风暴之后，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用自己制定的科学世界观具体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规律，从而用严密科学论证了的理论来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为此，马克思贡献了他的一生。在这一时期，他留给人们的就是不朽的伟大著作《资本论》^②。

《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就曾准备写一个辩证法大纲，他说：“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③ 马克思没有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他

①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67页。

② 《资本论》共分四卷。前三卷称为理论部分，第四卷称为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生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他逝世以后，恩格斯整理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但没有来得及出版第四卷。第四卷初由卡尔·考茨基编辑出版，但他对马克思手稿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现在出版的版本是按马克思手稿的次序编辑出版的。第四卷共分三册，即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3册。

③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21页。

留下了《资本论》。《资本论》是一个哲学宝库。在这里马克思作出了使哲学一般原理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资本论》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科学

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自己的崭新的历史观是有一个过程的。1844年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马克思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相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唯物主义观点；1844年秋，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着重研究了当代社会两大对抗阶级的经济关系，对当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作出了经济学上的唯物主义理解；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一步把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路线来同当时德国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路线相对立。1845年，当恩格斯也来到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回忆说：“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②。这种对立突出的表现在历史观上。当时，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把唯物主义路线贯彻到历史观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他们从分析现实的社会物质关系入手，然后进一步分析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贯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彻的这条路线，是历史观上一条新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对于这条路线，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概括的经典表述。他指出，这条路线旨在说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他论证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分析所得出的这个重要结论，把自己论证的基础从天上、从宗教移到地上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中。但是，这在理论的形态上暂时还是一个假设。因为这一理论，在当时还没有通过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而得到验证。所以，列宁说：“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①。

马克思从四十年代开始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用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资本论》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大量的事实材料的分析，揭示出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天然合理的，因而不作历史的分析；空想社会主义对于这种社会制度作了极其有力的抨击，但是，这种抨击与其说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这一制度所产生的恶果，因而，它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完全不同，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质，它首先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②《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历史过程。马克思证明说，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生产两极分化的内在规律，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在商品生产中，货币和商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最初并不是资本。它们转化为资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发生，即在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相互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7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对立又相互联系时才能发生。这就是：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在封建社会内部，劳动者还占有一些生产资料，现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了。“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①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资本论》还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在它自身存在的条件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断变革的。这种变革的原因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外部，而是由这一制度的本身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主要是生产力的不断变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引起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变更，反过来又促使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②从资本主义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从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不以资本家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中首要的办法是加强分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更全面地运用和不断地改进机器，从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可是，“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①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终有一天达到它的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时候。那时，社会革命就会到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就会取而代之。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这里，马克思首要的观点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在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直接的物质生产关系来说明各种政治形式。比如，对于国家这一上层建筑来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②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证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国家这一形式中特别明显。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国家在强制工人接受延长工作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不能单纯依靠经济的力量，因而不得不依靠国家的干预强制延长劳动日、甚至通过习艺所（劳动院）强迫劳动来进行剥削；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经济立法和税收政策来影响生产，或鼓励某种生产，或限制某种生产，因为国家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不仅它的正确的政策、法令能促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92页。

进生产，而且它的错误的政策、法令，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从坏的方面影响社会的经济。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教导人们也必须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理论，为剖析以往其他社会的经济形态，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①。达尔文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密切联系的思想，《资本论》也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成为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有规律可循的科学了。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矛盾的分析

马克思说，他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②。《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一方面体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另一方面又是辩证法的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辩证法。

第一，矛盾分析法是《资本论》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在《资本论》中，矛盾分析法，首先是把事物或者对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进行矛盾分解，然后将矛盾的各方面综合起来，在它的统一中揭露事物或概念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资本

①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39页。

论》对商品的分析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马克思说：“商品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方面来考察的，每次考察一面。可是，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①。商品的使用价值指的是它作为物的有用性。商品的这一方面，说明它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它和人们的生产关系无关。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同，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当一部分劳动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时候，“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分离开来。”^②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的分析进而引出价值。他认为，交换价值首先是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某种一定量的商品可以同时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许多其他商品相交换，这就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物，即隐藏在交换价值背后的商品的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的质是千差万别的，无法进行比较。作为价值，商品却是同质异量的，它的使用价值被撇开，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一属性，全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作为价值，它体现的是生产关系，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商品，它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首先是使用价值，但仅有这种有用性还不行，因为空气、天然草地、野生森林等都具有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其次，商品必须是劳动产品，但仅是劳动产品也还不是商品，因为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劳动产品，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6页。

因此，商品必须是能够通过交换，为别人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社会的使用价值”；最后，凡是商品，它有价值，必须具备使用价值。“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①这样，我们对商品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商品是用来交换、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它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

矛盾分析方法是《资本论》贯彻始终的重要方法。继商品分析之后，对劳动的分析，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继而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分为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分析，分为资本的价值构成和资本的技术构成；直到对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分析，分为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等等。《资本论》对于这些矛盾的方面都是逐一进行分析，然后综合起来，从总体上把握这些经济结构的。

在马克思那里，矛盾分析的方法要求由现象进到本质、由形式进到内容。但这不是任意的分析、分解所能达到的。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方法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揭露事物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说：“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1页。

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我就来分析价值。”^①

马克思对事物矛盾的分析是逐步深入的。他把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看作是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对这两种形式也不是同样对待,他着重分析了交换价值这一方面,即揭示隐藏在交换价值背后的价值。为了科学地理解价值,他进一步论证了劳动的二重性,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样就从形式进到内容,将交换价值看作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资本论》以后的分析就是建立在价值上的。只是到这时,马克思才说:“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②价值是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生产关系的本质的概念。这一本质概念是通过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等一系列分析得到的。反过来说,只有当分析进到价值的时候,才能对商品具有本质的理解。商品从价值概念上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然后才能进入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各种本

①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75页。

质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矛盾分析方法还要求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马克思指出,在劳动和价值的关系上,古典经济学已经达到了这种认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劳动创造了价值。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他们“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①所以,“……象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②马克思与斯密和李嘉图不同,他不是单纯分析劳动,也不是仅仅注意劳动量的考察。他所注意的是对劳动进行矛盾的分析,注意决定劳动量的质的考察。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学说,区别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研究了价值的质和量的关系,进而阐明了价值所体现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从而完整地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从价值到货币的分析中,马克思抓住价值形式(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这一主要矛盾进行考察,从而建立了科学的货币理论。在对剩余价值及其表现形式,诸如利润、利息、地租等曾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困扰的关系中,马克思暂时撇开流通过程,抓住生产过程,又着重分析不变资本和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7页,注(31)。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50页。

变资本等的关系，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抓住主要矛盾，使《资本论》的分析，一步比一步更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

第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重视量的分析，更重视质的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图在内，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量的方面，而忽视其质的特征。他们看到的只是量变，因此得出了资本主义永世不变的结论。马克思与此相反，他不仅重视事物的量的分析，而更重视事物质的分析，他非常重视量变转变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历史的行程中同其他事物一样，也进行着量变质变的发展过程。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马克思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连劳动力也成了商品。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有没有商品生产，而在于这种商品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居于统治的地位，起着决定的作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表现为雇佣劳动。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商品关系具有决定的意义，它“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第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②这两个特征，一个是从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1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96页。

劳动，一个是从生产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质的规定性。

其次，是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马克思指出，这一生产方式是以往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生产一系列古旧形态的灭亡和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它同以往的生产方式一样，也是要经历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正象马克思所证明了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它已经经历了协作、手工业工场和大工业等不同的阶段。同样，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达到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相容的地步，那时，根本的质变就要到来。在前者，即在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生产的各个阶段，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后者，即资本主义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则是矛盾所导致的根本质变。

《资本论》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科学论证

否定之否定规律，在黑格尔那里，不仅是唯心的，而且是极其神秘的。马克思不仅唯物地改造了它，同时用客观的经济事实科学地论证了它。

首先，从商品到货币的出现，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客观性的表现。在由商品到货币的发展中，马克思论证了价值形态^①发展的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马克思分析说，比如二

① 价值形态，指商品的价值在交换中由别一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地表现出来的形态。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它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证明其存在。因此，一个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商品的交换才能表现出来。商品交换的价值关系：相对价值形态=等价形态。比如，二十码麻布等于一件上衣。

十码麻布等于一件上衣，它表示的是生产物之间的偶然交换。马克思称为偶然的价值形态。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分工的发展，偶然的价值形态必然为扩大的价值形态所否定。这时，它表现为，二十码麻布等于一件上衣，或等于十磅茶叶，或等于一夸特小麦等等一个无限系列。在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扩大的价值形态又必然的为一般的价值形态所否定，即否定的否定。这时它表现为，一件上衣，或十磅茶叶等等于二十码麻布。在前者，等价形态表现为一个无限系列的商品，在后者，它为一种商品（或几种商品）所占有。第四种价值形态，即货币价值形态。这种价值形态和一般价值形态没有质的区别，只是由金或银独占了这个地位。由上看出，货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出现，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从资本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是经历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分析了资本运动的总公式。这个总公式可简单地表述如下： $G-W-G'$ （货币——商品——带有增殖额的货币）。从货币（G）到商品（W）不仅是自然形态的变化，它在质上表现为买，这是第一次否定；从商品（W）到货币（G'），又是一种物质形态的变化，在质上表现为卖，这是否定的否定。

资本运动的总公式只是从总过程上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它却产生了一个矛盾：它和等价交换的矛盾。等价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于是，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公式： $G-W\left\{\begin{matrix} A \\ P_m \end{matrix}\right. \dots P \dots W'-G'$ 。这个公

式是资本总公式的扩充,它把生产过程加了进来。在这里, W 被分解 A (劳动力)和 P_m (生产资料), P 表示生产过程, $\cdots$ 表示生产过程的中断。其中 P_m 只是把其价值一次或多次地转移到产品中去,它不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这样,剩余价值的秘密被揭露出来了。资本运动的这一公式,表明了它能增殖货币,“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①。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条件下,资本循环,即剩余价值生产的这种否定之否定就始终存在下去,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正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存在和不断发展,促进了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建立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正是这种否定,劳动力变为商品,所以才使资本能以 $G-W-G'$ 形式无止境的运动着。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资本在 $G-W-G'$ 中的运动,有一个必然的趋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总有一天要达到它的资本主义外壳所不能相容的地步。这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这时,社会又建立起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不过这不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公有制为基础了。由上看出,资本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3页。

《资本论》中的否定之否定，从商品生产开始，它就在价值形式中存在着；在生产过程中，它又以 $G-W\left\{\begin{smallmatrix} A \\ P_m \end{smallmatrix} \dots P \dots W'-G' \right.$ 的形式无限发展着；正是这种发展，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否定”。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以特定的社会经济事实，科学地论证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资本论》的逻辑和方法

马克思非常重视《资本论》中的逻辑问题。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也即逻辑体系的问题。因为没有这样的逻辑体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成果就不可能科学地、系统地表述出来；另一个问题，是形成这一逻辑体系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没有这些方法，《资本论》的科学的逻辑结构就不可能形成。

对于第一个问题，早在 1858 年，马克思就指出黑格尔《逻辑学》对他在材料加工上的意义。他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① 1866 年，当《资本论》第一卷正在加工定稿的时候，马克思又一次说到《资本论》逻辑结构的意义。他对恩格斯说：“你明白，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 121 页。

就”^①。这里显然是指德国从康德以来的哲学，特别是指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成就。马克思还说过，他的《资本论》，不管有什么缺点，但它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②。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等哲学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统一在《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中，只有在这一逻辑体系中，它们才形成一个统一的艺术整体。

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也极为重视，他曾强调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③抽象的方法，就是以抽象思维（或理论思维）为特征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诸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由上看出，《资本论》的逻辑问题是从总的方面、从最高层次上把握《资本论》的哲学问题的。它对于学习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资本论》的逻辑表现为一种概念（或范畴）和另一种概念（或范畴）的关系，表现为概念或范畴的体系。对于这种情况，马克思曾经指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④就是说，它们好象是一个脱离实践、离开经验事实的主观自生的概念结构，比如说，象黑格尔的逻辑学，在那里，“绝对精神”发展的各种概念，便是离开人们的实践，并且先于人们的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02页。

② 同上书，第196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④ 同上书，第23—24页。

验的纯主观概念的推演。马克思说“好象是”，实际上，它根本不是先验的结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是精神创造世界，所以，他的精神，他的概念必须先于客观世界、先于实践经验。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的概念是来自客观物质世界。在马克思那里，概念都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都是在研究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逻辑只是以这些概念为材料，将它们的内在联系辩证的表述出来，使事物科学地、有规律地再现出来。因此，马克思和黑格尔在世界观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黑格尔是辩证的发展论者，在他的《逻辑学》中有一个很好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概念与概念之间是辩证发展的，是一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这一合理的逻辑方法。不同的是，这个方法，在黑格尔那里是精神创造世界，是精神自己丰富自己内容的方法。而在马克思这里，则是通过概念再现世界的方法，即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用概念的形式表述出来。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首先要求对“具体”和“抽象”两个概念作辩证逻辑的理解。辩证逻辑所说的具体不是感性的具体，即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的具体物，而指的是思维中的具体，是指已经认识、已经理解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理性具体。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这里所说的抽象，是与具体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思维所把握的对象的一个侧面、一个方面、一种规定。事物是多样性的具体的统一，因而，

①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抽象是认识具体的一个步骤或者阶段。抽象和具体是就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把握一个复杂事物的认识过程来讲的。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认识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从初级本质进到更高级本质的发展过程。比如，《资本论》的逻辑从商品开始。商品是《资本论》逻辑的起点，它只是反映着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的这种性质，它是人们对生活中重复亿万次，到处充满着商品关系这种最一般性质的认识。商品的逻辑发展必然进到货币。这是因为在商品交换中，商品交换的价值形态（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形态）的矛盾发展，导致了货币的产生。如果说，商品概念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初级本质，那么，货币的认识则进到资本主义生产的高一级的本质。在对货币的进一步认识中，它又必然地进到资本，资本是货币，但货币不是资本，一定数量的货币额才能起到资本的作用，即必须有能够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和购买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与设备的货币，这时货币才可能转化为资本。这就是由货币逻辑地进到资本。对资本的认识，是进到比货币更高一级的本质。对资本的分析，马克思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如生产资料所表现的资本）和可变资本（如工人的工资），就揭示出剩余价值的产生。因为不变资本不带来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创造的。可变资本表示出工人创造的价值多于工人的工资，这部分资本是可变的，它带来了剩余价值。所以又由资本必然地逻辑地进到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最初资本家以延长劳动日来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是绝对剩余价值。延长劳动日受着自然时间（一天 24 小时）的限制，

又受着社会及道德等方面（例如工人的家庭婚姻和一定的文化娱乐的时间）的限制，所以延长劳动时间是有一定限度的，于是资本家还采用改进技术、更新设备等办法来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是相对剩余价值。由于剩余价值的产生，引起资本的积累、引起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引起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这一切，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自身的灭亡。在这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概念每前进一步，都是进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更高一级本质的认识。资本主义是各种矛盾、各种规定的综合，或者说，资本主义是“许多规定的综合”。人们要从理论上把握它，即从本质及其各级本质之间的关系上理解它、掌握它，就必须遵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这是一个许多规定的综合过程。因为具体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从一个逻辑概念进到另一个逻辑概念时，都是对一定矛盾的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上面我们说的是《资本论》中较大的逻辑概念之间的关系，但是，从一个大的概念进到另一个大的概念时，必须经过各种不同的矛盾分析和综合的过程。比如，从商品进到货币，其中必须首先由商品的矛盾分析，进到价值。在这里，把商品进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又进行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析，而只有在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和综合中，才能进到价值的认识，即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人类共同劳动的凝结，表示着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有了价值的概念，才能进行价值形态的

分析,才能进到货币。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逻辑的上升也就是辩证扬弃的过程。在《资本论》的逻辑中,它从商品开始,而在货币的关系中,商品不是货币,但货币却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商品的价值关系;在资本的关系中,以扬弃的形式又包含着货币的关系;剩余价值又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资本的关系。总之,凡是较发展了的关系,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以前较为简单的关系。辩证扬弃的这种过程,说明逻辑上升不能跳跃。比如,不能跳过货币直接从商品到达资本,或从货币不经过资本直接到达剩余价值。如此等等。这样,一些概念发展为另一些概念,一些概念建立在另一些概念之上,它们相互联结、逐步发展、上升。因此,认识的辩证扬弃这一特点,说明认识象登山或上楼一样是逐步上升的。

逻辑上升的另一个特征是概念的变异性或灵活性。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在思维发展过程中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思维的进程不断发生变化的。比如,在逻辑认识的货币阶段,货币对于商品来说,它是一个发展了的具有较为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可是,它对于资本概念来说,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资本对于货币是一个发展了的具体概念,但对于剩余价值来说,它又是一个需待进一步发展的抽象概念,如此等等,一直到完全把握这一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在《资本论》的逻辑中,概念(或范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上升的必然关系。

这种逻辑必然性体现着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性。这就是逻辑的认识必须和历史的客观发展相一致。在这里，历史是逻辑关系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说：“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①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首先要求确定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起点。马克思认为，确立这种起点的原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事实的典型性；一是最发展的事实。《资本论》中的商品就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作为典型性，这个商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它是资本主义的商品。《资本论》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在人类历史上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是个特殊的存在物。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成为普遍的存在物，表示着人们最一般的关系，具有典型的意义。

商品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对历史的范畴的分析，又不能从它的最古老的形式开始，而要从它最发展的形式开始。商品在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着，在马克思时代，“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这样的商品，它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最发展的形式。但就对资本主义逻辑分析来说，它却是一个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胎的，需待解剖的最抽象的概念，是一个逻辑的起点。所以，马克思说，确定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是对各种事实进行分析、比较，即做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

①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页。

才能确定下来的。

逻辑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的发展。但是，历史常常具有偶然性，有时是跳跃式和曲折前进的。如果逻辑处处跟着它，那就会常常打乱思维的进程，不得不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这样，逻辑就不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认识方法中，只有逻辑的研究方法才是唯一适用的方法。但是，这种逻辑方法又不能是任意的，它必须是历史的概括和总结。

因为逻辑必须符合历史，但又不能跟随历史，它必须是在大量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总结。所以，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逻辑和历史的起点相一致是有条件的，是具体的。我们上面分析的商品，它对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这些概念的关系来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也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的起点。脱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们就不能具有这样的统一性。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不同，它探讨的真理是具体的真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具体的统一，反映了真理的具体性。

其次，逻辑对历史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反映，即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本质的统一。恩格斯说，逻辑对历史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①。比如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在历史上，不仅是商业，而且商人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

①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现得早。商人资本离不开流通领域。商人资本的公式是 $G—W—G'$ (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在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货币财富集中在商人手中,商人资本成为一种独立的形式。它既可以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可以存在于封建社会。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就是说,一旦在资本支配生产的情况下,商人资本就只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产业资本的公式是 $G—W\left\{\begin{matrix} A \\ P_m \end{matrix}\right. \dots$

$P\dots W'—G'$ 。这里,它把商人资本,或商品流通过程包括到生产资本中去,把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般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它只是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不再具有决定的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逻辑地安排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就不能按照历史的发展过程去安排,而是按照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去安排。在《资本论》中,对地租、利息等的考察也有这种性质,它们在历史上出现是较早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曾居于主导的地位。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因此,它们的地位必须以逻辑的关系加以修正。

第三个特点是,通过逻辑的“纯粹演绎式的叙述”或“理论模型”去反映事物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对价值形式(货币的起源)的考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货币是早在奴隶社会就出现的,但是对它的起源,从亚里士多德直到李嘉图一直困扰着人们。而马克思通过价值形态(相对价值形态与等价形态)的矛盾发展推导出货币的产生。所以列宁说,这里

所作的是“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①这种在大量的事实基础上“理论模型”的叙述方法，不是远离了历史，而是更接近了历史，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军事科学中的运用。恩格斯的军事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后，首先面临的是一场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存亡的武装斗争。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战争在阶级社会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重要的不是消极地回避它，而是应当积极地去研究战争，正确地去驾驭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他们不仅关注着当前的每一场战争，而且力求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科学中去，分析战争，总结战争，阐明科学的军事辩证法，用以武装工人阶级，使他们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胜利地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恩格斯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

恩格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前后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深入研究了战争和军事科学。他青年时期，就服过兵役，当过炮手，并培养起了研究军事科学的兴趣。1849年，在德国工人武装起义中，恩格斯又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92页。

盟员奥古斯特·维利希所领导的志愿部队，担任过副官，参加过四次战役，担负着训练战士、组织后勤等任务。“所有在火线上看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镇静和漠视任何危险的精神。”^① 恩格斯的这种经历和实践，为他进一步研究军事科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恩格斯仔细地研究了十九世纪从四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所发生的每一次重要的战争，从1848—1849年巴黎的六月革命，以及陆续爆发的英国殖民战争，印度起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直至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等等，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些战争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深刻的概括，发表了一系列科学的军事论文。他还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几十个军事条目，内容涉及到军事科学的各个领域，从各个不同的兵种到各种不同的武器，从军队的组织编制、指挥管理到战略战术，从军队的物质保证、后勤供应到作战工事的构造等等，都作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考察，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军事思想史，是一批在军事理论上具有科学价值的专题论文。他还结合一些战争的发展进程及时地为报刊撰写“战争短评”，仅就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而发表的军事评论文章就有五十九篇。在前后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周发表两篇，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每周发表的文章多达四篇，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恩格斯也因此和朋友中间获得了“将军”的绰号。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5页。

恩格斯在军事科学上所取得的成果，是同他认真地研究战争的实践经验，熟悉各种军事文献和军事资料，批判地吸取一切军事思想的优秀成果分不开的。他在军事上所拥有的渊博的知识，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在军事著作中作出的精辟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不仅博得了马克思和广大读者的称赞，而且经得起任何一个军事权威的审查。恩格斯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在军事研究中坚持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是一门科学。它在分析和评论具体的战争和各种军事问题时应当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对于战争，不能把军事上的成败得失同政治上的正义、非正义混为一谈。剥削阶级的军队和它们所发动的许多侵略性和掠夺性的战争，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和非正义的，但是某些战争在作战的组织指挥和战略战术方面却可以总结出值得借鉴的经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军队和他们所进行的正义的战争，在政治上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在军事科学上却也免不了有缺点和错误，应从中吸取教训。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至于政治，我将尽量少把它同军事批评牵连在一起。在战争中，只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大的精力进行战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同意你的条件。”因此，“我还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军事科学象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不包括特殊的政治见解。”^①

① 《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609页。

当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科学性不仅不排斥它的革命性，而且和革命性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战争和军事问题的出发点和目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是为了武装无产阶级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军队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恩格斯把推翻旧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的武装和革命的军队。恩格斯对当代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为了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军队的；他对某些战争失败的教训的分析，例如指挥者的骄傲自负，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不服从指挥，放任腐败贪污的空气侵袭军队等等，是为了给无产阶级军队提供借鉴的；他对殖民地武装起义的分析和支持，是为了帮助被压迫人民掌握战争的艺术，鼓舞必胜的信心。

军事研究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还必须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的重大贡献也正是在于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这门科学中去。恩格斯的重大贡献也正在这里，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军事问题的典范。

恩格斯在军事研究中首先注重的，是掌握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掌握大量的军事资料和军事文献。他在动手写文章之前，总是通过各种办法收集有关战区和作战双方的地图、作战计划和专门资料等，时刻关注着电讯报导中的战争动态，力求使自己成为将要研究的那门军事知识的内行，为此他曾多次要求马克思帮助他查找有关文献、资料、期刊、地图等等。他在着手研究战争史的时候，大量阅读历史上许多军事家的著作，研究许多著名战役的历史，广泛熟悉火

药和火器的发展史,作战方法的演变史,等等。他认为“在写战史方面,如果没有关于兵力、给养和装备等情况的各种材料,就想加以论述,那是最容易出笑话的。”^①恩格斯这种注重从实际出发的研究态度,坚持一切判断和结论只能来自研究第一手材料的科学态度,正是他在军事研究中一贯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表现。

恩格斯在军事研究中也极其重视辩证地考察和分析各种战争和军事问题。他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总是全面地分析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既重视武器的作用,又重视人的作用;既肯定将帅的作用,又估计到士兵的作用;既重视作战的前方,又不忽视作战的后方;既研究进攻,又研究防守;既力求保持主动,又不忽视可能的被动;等等。他总是十分重视研究战争中各种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各种发展变化的情况,同时又十分重视对战争和各种军事范畴作历史的考察,从历史的基本联系中去考察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恩格斯的这种坚持全面性和历史性、反对片面性和绝对性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正是他在军事研究中一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表现。

唯物辩证地研究军事科学中 两个重要的问题——战争和军队

战争和军队是军事科学中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战争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的建设又总是为了进攻或防御,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49页。

为了胜利地进行战争。恩格斯在研究战争和军队时，总是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分析，作出科学的说明。

战争不是什么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现象。战争和军队是同社会阶级的产生、发展紧密联系的，因而也是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考察战争和军队，首先应当考察它们的阶级性质，考察它们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战争和军队又是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联系着的。一方面，军队的建设，武器和装备的变革，都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另一方面，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初的薪金就是在古代军队中首先实行而后发展到其他部门的；行会制度是在古罗马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公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规模运用机器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把金属作为货币来使用也是首先以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各部门内部的分工首先是由于军队内部实行了分工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军队的发展也或多或少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军队发展的历史中也一定程度地反映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了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各种关系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考察战争和军队,还应当考察它们同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考察它们受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的范围和程度,把发展武装力量建立在可靠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

影响战争和军队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固然是经济,但是经济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如民族性质、历史传统和文化水平,对战争和军队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文化水平的高低在战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早就看到,炮兵比步兵和骑兵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需要知道许多不同口径的火炮,掌握炮架、炮床、装弹的专门知识,掌握测定仰角和不同射程的原理和方法,掌握火炮射击学的要领,了解弹药和烟火器材的制造,掌握攻城术、永备工事和野战工事的基本知识,等等。军队的现代化如果离开了文化科学知识,那是寸步难行的。所以,提高军队的文化水平,对于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恩格斯说:“只有多动脑筋,在军事领域和国家资源的利用方面不断地改进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才能在一个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在竞争者中间跃居首位。因此,我们就看到,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对不够发达的邻国在军事上具有怎样的优越条件。”^①恩格斯的这一分析和论断,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益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恩格斯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还包含着对军国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预见。战争和军队既然受着阶级利益和经济发展

① 《欧洲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467—468页。

的制约，那些一味穷兵黩武的好战的军国主义必然由于自身的辩证发展规律而走向崩溃。恩格斯在分析普法战争中指出，军国主义由于激烈的军备竞赛而不得不每年在海军、陆军、火炮等方面花费大量的金钱，而军备竞赛又会使刚刚制造出来的武器和装备变得陈旧过时，不适于战争，这就加速了经济上的崩溃，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另一方面，军国主义的疯狂的扩军，使军队建设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似乎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随着这种义务兵役制的采用，其结果必然是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从而有可能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拿起武器来反对军事长官，推翻军国主义。这样，“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①

辩证地分析装备和士气的作用与相互关系

任何军队如果离开了一定的武器和装备，就不成其为军队了。因此，武器的发明和创造，装备的生产和革新，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在生产上不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在军事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从战史上看，凡是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器材的发明者，便是首先运用以前新发明的第一人。恩格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86页。

斯在这里非常重视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对它们作了辩证的考察和研究。他不仅研究武器装备本身发展变革的历史，研究军事将领、工程师、发明家在军事技术变革中的作用，而且研究这种变革对于作战方法、军队组成和其他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当然，重视武器装备不应当同重视人的作用对立起来。任何军队都是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组成的，军官和士兵的思想状况、勇敢精神、军事素质、文化程度等等对军队的战斗力都有很大的意义。一切最好的武器装备都是由人来掌握的，“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① 恩格斯一贯强调军队士气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认为在战争的紧要关头，精神因素、勇敢往往会立即化为物质力量。军队的士气首先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但是还必须有严格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只有严格的训练，才能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灵巧，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掌握必要的军事知识，那种缺乏严格的训练与组织而单凭热情去作战的部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只有严格的纪律，才能保持作战计划的贯彻执行，保证作战行动的一致、战斗的自觉性和荣誉感。那种不遵守纪律，任意抢劫和掠夺的军队，实际上是在涣散士气，使军队陷于瓦解和变质的境地。

恩格斯的分析深刻阐明了战争中装备和士气的作用、阐明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既重视物的因素，又重视人的因素，既要不断地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又要不断地

^① 恩格斯：《德国战争短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1页

革新军事手段，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把握作战的时机

恩格斯是从总结战争经验中提出战略和战术的。不论是对战争的全过程或一次战争中的各个战役，都应当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周密的作战计划；具体的战斗部署。

任何战争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认真地进行。制定作战计划，首先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判明客观情况，了解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兵力对比，把军事行动建立在客观的可靠的基础上。为此，恩格斯要求参谋人员在战争中应当成为军事首脑的助手，对行军经过的或可能经过的地形进行侦察和目测，协助制定作战计划，明确计划的各个细节，使军队不致丧失时机，不致引起混乱，不致白白地消耗体力。他特别强调，作战计划应当经过深思熟虑，而绝不可作为儿戏，听凭主观想象和一时的兴会来任意地处置问题。

关系到战争全局的，还有一个不失时机的问题。随着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战争的空间距离相对缩短了，时间问题也就更加突出了。因此，战争中谁赢得时间，谁就会获得胜利，谁丧失了时间，谁就会遭到失败；谁不失时机地发动突然袭击，谁就有可能出奇制胜，谁对突然袭击失去准备，谁就会被动挨打；掌握战机，就会转败为胜，化被动为主动，丧失战机，就可能失败，化主动为被动，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行动的迟缓可以使大量兵力失掉优势，如此等等。这无一不是同时间有关的。恩格斯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强调在战争中“时间就是军队”^①，“时间就是胜利”。他认为，“放过有利的时机，不利用机会调派优势兵力去对付敌人，这就是犯了战争中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②

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探索战争的规律

恩格斯一贯强调在战争中夺取主动权的问题。一支在战争中丧失了主动权的军队当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和失败的地位。怎样才能在战争中保持和夺取主动权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兵力，保持战场上的优势，反对分散兵力，才能避免被分割切断、各个击破的危险。而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战争本身的特点所要求的，也有助于夺取战争中的主动权。历史上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战果，在于他能集中兵力，有一套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找寻其他出路，出敌不意地将自己的军队调往新的攻击目标，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甚至使暂时的失败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

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并不绝对拒绝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为了不让自己的人员和武器遭到损失，给敌人以真正的打击，有时在军事上放弃某些据点，作适当的退却是允许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不懂得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与此相联系，在一定情况下，军事上的防御也是必要的，但这种防御不应该仅仅是消极的，而应

① 《土耳其战争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406页。

当是积极的、能转化为进攻的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①。这种退却和防御应当有助于给敌方以重创，有助于使己方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它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一部分。当然，这种积极防御需要有机动灵活、经验丰富和指挥熟练的将领，需要有训练有素和行动敏捷的部队，而且首先需要有指挥熟练而又极其可靠的旅长、营长以至连长。因为在战斗中，一切往往要靠各个独立的部队行动的迅速和机警，要靠中下级军官及时而正确的指挥。

进攻虽然在军事上能获得更大的胜利，但绝不应把这种进攻简单地理解为直线的、千篇一律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要求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进攻方式。是正面进攻还是侧翼迂回，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防御阵地，从正面强攻，往往会招致重大的伤亡，等于完全丧失理智，而采取从后方迂回的方式，却能够攻破这种防御。可见，军事上的攻击和退却、进攻和防御、正面和侧面、直线和迂回，都应当辩证地对待和理解，而不应当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如果在战争中对于这些问题拒绝必要的机动灵活，拒绝军事辩证法，企图用一成不变的方法来对待千变万化的战争势态，那就会丧失主动权，处于被动的地位，受到应有的惩罚。

战争总是依靠第一线的部队在前线进行的，但是，战争又不能没有预备队和巩固的后方。没有预备队，就不能保持现有的阵地，更谈不上扩大战果。要有巩固的前线，就必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96页。

须有巩固的后方，就必须使军队不断地从后方得到兵员、弹药和粮食的补充。只要有现代的兵工厂和铸炮厂，只要有电报和轮船，只要握有制海权，就不必担心缺乏武器弹药。有了巩固的后方，才能从物力和人力上给前线以巨大的支援。而后方不稳固，往往会使最精锐最团结的军队情绪不稳固，从而不利于作战。因此，正确处理第一线部队和预备部队的关系，前方和后方的关系，同样是关系到夺取战争主动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军事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正确地指挥战争、组织战争和进行战争，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规律，人们必须研究它，否则就会战败以至灭亡。恩格斯在概括武装起义和革命战争的经验时，特别阐明了它作为一种艺术所固有的要求：第一，不要玩弄起义，要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对付起义可能带来的各种变化，特别在敌人占优势的情况下，更要集中强大兵力去打击敌人；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采取进攻，对彼此分散尚未集中的敌军进行袭击，并且每天都要力求获得新的胜利，保持精神上的优势，以鼓舞士气，把那些动摇分子争取过来。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不要玩弄起义，是指起义的严肃性，绝不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发动起义；而所谓充分准备，既要能对付各种必然的因素，又要能对付各种偶然的因素；起义前需要的是慎重、周密，不凭一时的激动。但起义后需要的则是坚定、勇敢、不犹豫动摇；要使起义的过程成为不断扩大队伍、不断扩大胜利的过程。恩格斯作出的这些理论概括，是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强大武器，也是军事辩证法宝库中极其

珍贵的理论财富。

复习思考题

1. 试述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经验中对历史唯物论的发展。
2. 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由假设到科学的发展?
3. 试述《资本论》中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这一方法具有辩证法的哪些特点?
4. 试述恩格斯军事辩证法的主要内容。

学 习 书 目

马克思:《1844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见《资本论》第 1 卷

恩格斯:《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 1 卷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斗争和 研究中进一步系统化

一 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马克思 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工作

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历史经历了十年反动时期，又重新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高潮的重大标志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公社虽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但它突出地表现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斗争精神，创造性和无穷智慧。它既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沉重打击，又是照亮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曙光。它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是无产阶级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

巴黎工人的起义，使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迫害进一步加强了，西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全面反动，资本主义也进入了没落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和斗争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决战进行和平准备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带有“和平”的性质，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到处都在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并通过兴办报纸，建立教育机关，组织工会和合作社，传播马克思主义，聚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未来的斗争进行准备，尽管这种准备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上述情况清楚地说明：第一，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以前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但是为下一次革命作酝酿和准备的进程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二，革命还在前进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第三，随着斗争条件的变化，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也应当相应地跟着变化，耐心的宣传教育和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的活动被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

面对着历史条件的这种新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战斗的工作重点和斗争方法，必然也会有所变化，带有新的特点。

感染人民和工作重点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革命失败到另一次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党应当从思想上、理论上教育和提高工人阶级，统一认识，积聚力量，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战斗。既要反对

在失败面前消极悲观，无所作为；又要反对不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轻举妄动，过早地进行决战。因此，做耐心的宣传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这就是新时期赋予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项最重要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政党从来不抱幻想，他们始终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他们所从事的理论工作、宣传工作，都是为了“感染人民”的。

革命者应当如何对待前进过程中的挫折、失败以至牺牲呢？这是一个在革命遭到暂时失败的情况下，必须从理论上认识上正确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是十分重视的，他们一贯致力于用革命发展的辩证法来武装群众，使人民能够从失败中看到前进的方向，看到一切反动派自食其果的不可抗拒的逻辑。当轰轰烈烈的1848年革命遭到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喊出“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样震撼世界的口号；当史无前例的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敢于向全世界宣告：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社的曙光将照耀着人类前进的道路。违背历史辩证法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在洒下仇恨种子的土地上自食其果。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成立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英勇的巴黎公社社员虽然被屠杀了，但是他们的子弟从初生的孩子已经达到成年，当了士兵，正在学习使用武器的本领，学习组织起来和持枪自卫的艺术。反动统治阶级训练士兵的结果，和它们的愿望相反，恰好为无产阶级造就了一支人数更多、力量更强大的战斗队伍。因此，公社的失败绝不是公社

的死亡，它仍然活着，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人民的觉醒，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思想。当然，革命暂时失败毕竟是一个客观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也是不对的。针对这种情况，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也应当有所改变，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利用它们所提供的议会讲台，进行公开的议会活动，应当在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彻底清算党内机会主义的影响。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新时期工作的重点，是通过理论宣传、理论研究和理论斗争来武装工人阶级，指导建党工作，反对机会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重新回到科学研究上来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不再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了，但同时他们仍然和欧洲、美洲的工人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几乎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通信，他们愈来愈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公认的和有求必应的顾问。新的斗争形势也使马克思、恩格斯赢得了时间，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上来，为捍卫、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付出巨大的精力。他们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科学而勤奋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事理论工作的这一时期，是他们一生中最后的时期，是在理论上取得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的一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

一时期又可以根据马克思逝世前后而区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871—1883年马克思逝世,是两位革命导师并肩战斗,相互支持,紧密配合的十二年;后一阶段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恩格斯为整理马克思的遗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而独立战斗的十二年。

在前十二年,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精力研究理论,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理论著作。“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的精神生活。”^① 他们与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写出了《论权威》、《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这样一些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和重大发展的著作。马克思还用主要精力写作《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并为此收集了大量资料,广泛地研究了有关的各门科学,如农业科学、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和财政、银行、工业发展、土地关系等等问题;同时,他也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阅读了有关原始文化的其它著作,写了读书笔记,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状况进行了科学的探讨。马克思晚年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难度之深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而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在极端艰苦和贫病交加的条件下,用“入地狱”的精神,从事着创造性的劳动,为人类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理论巨著。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用有生之年写一部辩证法的专著,还在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国的动向,

①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1页。

努力收集有关的第一手资料，借以预见未来的事件，弥补他不能亲眼目睹的遗憾。恩格斯为了保证马克思能够完成他的主要任务，不仅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持他，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研究计划，暂时放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主动承担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而迫切的任务，诸如，撰写政治评论文章，指导和组织国际工人运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批判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进攻，等等。恩格斯这种甘当“配角”，把困难而繁杂的任务留给自己，为战友的崇高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马克思能够写作《资本论》这部巨著的最重要的保证。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每一个贡献，都渗透着彼此的亲密支持和辛勤劳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类最美好、最感人的战友情谊。

在后十二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导师，他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他面临着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的历史任务。他不惜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首先集中力量整理出版马克思的遗著、遗稿和书信。这方面最伟大的贡献是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逝世后仅仅两年，恩格斯就迅速地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然后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在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正如列宁借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话写道：“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将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①当然，恩格斯并没有

^①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

仅仅停留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和遗著上，而是在整理过程中进一步研究有关资料，作出新的结论，写出新的著作，既实现了马克思生前未能实现的遗愿，也极大地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这部著作不仅充分利用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和批语，而且利用摩尔根所提供的实际材料和某些结论，写成了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原始社会以及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专著，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和他自己对原始社会史的看法，填补了唯物史观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恩格斯也一贯反对用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或简单化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学说，强调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一贯反对那种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原理和结论，而忽视这些原理、结论的前提和条件的作法，反对那种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的作法，反对那种把马克思的话同上下文割裂开来的作法，等等。他对翻译马克思著作的态度也是十分严肃的，绝不允许歪曲马克思的原意。恩格斯为了帮助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总是密切结合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阐发马克思的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在重新出版马克思著作的时候，既注意保持这些著作的本来面貌，又注意密切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社会实践来阐发这些著作的思想内容。他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写的序言，为《法兰西内战》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都贯穿着这种精神，是帮助我们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领会这些著作的指南，也为我们

用科学的态度理解这些著作提供了最好的典范。恩格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为了正确阐明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先驱的关系而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是他和马克思在哲学上怎样继承，又怎样变革的回顾和总结，是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的系统而扼要的叙述，也是对机会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相互关系的批判。总之，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十二年中，为了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事业，为了实现马克思的遗愿，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他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勤奋工作，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恩格斯在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这样说过：“请你们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将献给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让我在我不能进行斗争的时候再死去吧。”^①这也是恩格斯一生的最好写照。

二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唯物史观在创立以后，经历了二十多年不平凡的岁月，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有力的验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急风暴雨的革命，连绵不断的战争，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以及政治舞台的变幻，历史人物的沉浮等等，无一不进行了及时的、深刻的分析。但是，如何从这些具体问题中作出普遍性的概括，如何把这些问题同社

① 《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1页。

会生活的本质、同历史发展的规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说明，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剖析中对唯物史观作出更系统的论证，怎样对各门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材料和成果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研究。这一切都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系统化。重新回到科学研究上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极大的精力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新时期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二是通过批判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进攻和歪曲，三是通过研究社会科学有关的文献资料。

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

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历史奇迹和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公社虽然只存在过七十二天，但它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这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把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向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他们对公社的一切，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别对公社所提供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总结。马克思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就写出了《法兰西内战》这部光辉的历史著作和理论著作，对公社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作出了透彻的分析和精辟的总结。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早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第一批成熟的著作中就明确地提出来了，后来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著作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些思想毕竟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总结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中提出来的，免不了受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所局限，还不可能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提供比较具体的设想和实际的经验。经过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才直接提供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经验，提供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经验。

巴黎公社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不仅能够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且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崭新的国家机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社打碎的正是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却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由于巴黎公社的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和未来的设想了，而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生动的、具体的、实际的榜样了。

巴黎公社是怎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它在这方面的根本经验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为两条：一条是取消军队，建立人民的武装；一条是取消特权，废除官僚制度。有了这两条，不仅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而且根本摧毁了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公社为了实现第一条，废除了常备军和政府警察，这就摧毁了压迫人民的物质力量。为了实现第二条，实行了普选制和低薪制，这就使国家机关和一切公职人员不再是社会的主人，而成为社会的公仆。公社的这些原则和围绕这些原则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其伟

大目标都是为了了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因此，不论公社的命运如何，公社的这些原则是永存的。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理论上总结了公社失败的原因，帮助无产阶级吸取教训，继续战斗。他们认为，公社的失败是由于错过了时机，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卷土重来；公社的失败还由于没有坚定地是一切方面剥夺剥夺者，甚至象法兰西银行这样重要的机构也没有夺取过来。总之，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同它没有正确地坚持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

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之所以可贵，就在于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概括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借鉴。它既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器，是给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宝库增加的新鲜内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贡献。

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 阐发如何对待权威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存在的十年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同巴枯宁集团进行斗争。这是因为巴枯宁主义者对第一国际的分裂、破坏活动最为突出，他们在理论上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主张消灭一切国家，妄图用秘密阴谋的办法来实现欧洲革命。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有关的通信中，在《论权威》、《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政治冷淡主义》、《所

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等一系列论著中，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作出了精辟的阐述和重大的发展。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谬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否认一切权威。恩格斯为批判这一观点专门写了《论权威》一文。他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深刻地论证了权威的必要性。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来看，不论是工业关系还是农业关系，都有一种从分散活动逐步被联合活动代替的趋势。分散生产的小作坊被现代工业的大工厂所代替，客货运马车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被轮船所代替，农业中的小自耕农也逐渐被耕种大片土地的农业工人所代替，等等。而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不能没有权威。试问，组织工厂生产、铁路运输、航海交通，哪一项可以脱离权威的指挥呢？不仅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需要权威，革命活动也不能没有权威。恩格斯说得好：“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①可见，社会需要

^① 《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权威，革命需要权威，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认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是根本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是为反动派效劳的。

巴枯宁否认权威，是同他反对一切国家，放弃一切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谬论密切联系着的。很显然，在巴黎公社已经把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提到日程上来以后，鼓吹这些谬论，就是向工人散布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准他们起来革命，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

反对拉萨尔主义，阐明过渡时期 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另一个机会主义派别，是以“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和“马克思的学生”自居的拉萨尔派。拉萨尔鼓吹超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国家观，用所谓“自由国家”的谬论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认为无产阶级依靠“国家帮助”，就可以争取普选权，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由国家拨款建立起生产合作社，从而实现“公平的分配”的社会主义。拉萨尔扬言用这种“最合法、最和平又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得到解放。拉萨尔的这些机会主义谬论，在工人群众中有极大的欺骗性，加上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培植亲信，组织宗派，同革命的爱森纳赫派相对抗，危害就更大了。甚至在他死后，拉萨尔派在政治上、组织上陷于瓦解，要求和爱森纳赫派合并的情况下，后者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还同拉萨尔派共同起草了一个浸透着拉萨尔主义

的纲领草案，随后又在 1875 年 5 月哥达城召开的合并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为了反对拉萨尔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 1875 年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一书。这是一部运用唯物辩证法剖析未来社会发展的光辉典范，也是一部对历史唯物主义有重要发展的理论著作。

这部著作第一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马克思主义形成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阐明了资本主义一定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具体阐发这条规律，澄清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种种歪曲，进一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历史作用，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以回答和解决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拉萨尔主义和哥达纲领关于“自由国家”的谬论时指出，建立“自由国家”决不是党的斗争目的，也不是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因为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需要了。因此，无产阶级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后，不是取消国家机器，而是要建立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以便继续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各项历史任务。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

革命专政。”^①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同过渡时期联系起来，同建设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同社会发展规律联系起来，不仅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而且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同时由于这一论断创造性地提出过渡时期的理论，对于深入研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部著作还深刻剖析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阐明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原理，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进程及其客观规律，为人类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

拉萨尔为了蛊惑人心，唯心主义地离开社会的生产方式来宣扬“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并把它归结为革命的最终目的。这一切，对于共产党人早就明确宣布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目的，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探索和总结的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对于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因此，马克思在这场论战中，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及其基本原则作出了科学的预见和分析。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任何分配关系都是占有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抽象的道德原则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然谈不上“公平的分配”，即使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也不可能实现“公平的分配”。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要经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劳动还没有从“谋生手段”变成大多数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使社会产品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种分配原则，就其按同一尺度劳动进行分配来说，是平等的，但是对于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来说，有的人劳动能力强些，有的人弱些，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从而又会在实际收入和富裕程度上出现差别，这种差别也就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以承认劳动能力不同的劳动者有不平等的权利为前提的。马克思认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因此，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当然，按需分配同拉萨尔所说的“公平分配”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的发展来说明分配方式的，后者则是从抽象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原则来说明分配方式的，前者坚持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而后者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

至于拉萨尔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那更是在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的无稽之谈。马克思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认为社会总产品根本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拿来进行个人分配，只有把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补偿起来，把扩大再生产需要的部分追加起来，把后备基金、管理费、公益金等等扣除下来，而后才能进行个人分配，这种分配只能是也必须是“有折有扣”的。拉萨尔的这种“空洞的废话”，表明他根本看不到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完全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反对杜林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全面阐述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

在德国党内，由于以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革命派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而引起了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映。在柏林，首先是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又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份聪明的博士妥协，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日益泛滥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同杜林主义的论战，以及随后发生的八十年代反对新康德主义的斗争，都是哲学战线上的重要斗争。而恩格斯在这些斗争中所写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有关书信，则集中地阐发了被机会主义所歪曲的基本原理，尤其详尽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

正如恩格斯自己说过的那样：上述两部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

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具体分析了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及其特点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主要精力是用在唯物论上的。他们一方面需要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又需要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出科学的说明，着重阐明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切历史运动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因，阐明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对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作用则还来不及作出详细的说明。而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理论家在这方面则力图取消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这就更加促使恩格斯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唯物史观明确地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绝不能把上述观点歪曲为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诚然，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曾经针对德国青年中过分看重经济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倾向，特别要求人们注意研究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各种法权形式、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注意研究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恩格斯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分析了国家和法的特点。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产生以后，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实现着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家和它所产生的法律的出现，使政治同经济的联系日益模糊起来，好象它们是绝对独立的领域，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完全无关的。实际上，这种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国家和法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都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工具。同时，这种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发展又往往有巨大的反作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一是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这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这就会延缓以至破坏经济的发展；三是既阻碍经济沿着某些方向发展，又推动经济沿着另一种方向发展，其结果无非是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恩格斯还具体分析了哲学、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特点。就拿哲学来说，它和经济的关系是复杂的、曲折的，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精神活动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要从它的先驱者那里继承一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因此，经济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往往并不一致，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哲学上却可能是落后的，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哲学上却能够处于领先的地位。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否定经济发展对哲学的支配作用，而是说明哲学接受经济的支配作用有它自己的特点，即经济在这里并不创造出任何东西，它只能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经济的这一作用

也多半是间接发生的，影响哲学最大最直接的因素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因此，分析一定时代的哲学，固然要分析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状况，更要从它的思想继承关系上去分析，从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上去分析，切忌片面性和简单化的作法。

道德同社会意识的其他形式一样，也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每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都有自己特殊的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也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但是，杜林却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道德，说什么道德是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提出所谓永恒真理的道德原则。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道德观，同时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他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恩格斯认为“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①。

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以抽象的人类之爱作基础的，而抽象的人类之爱又是与他离开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孤立地、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抽象地研究人分不开的。费尔巴哈认为人只是脱离社会实践、脱离历史的自然界的一种生物，两性关系、爱、意志力等等就是人的本质，他既不懂得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也不懂得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如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人剥削人的现象。对此，费尔巴哈除了依靠抽象的爱的说教以外是一筹莫展的。费尔巴哈的道德论同现实生活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尽管费尔巴哈标榜自己的道德论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其实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它同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是完全脱离的，是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

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好象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但是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仍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最初，它是自然界的自发力量统治着原始人类的结果，或者说，宗教观念是统治着原始人类的外界力量在他们头脑中荒诞的歪曲的反映。这说明原始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无能和恐惧，从而产生了对超自然力的崇拜。而宗教一经产生以后，在继承某些传统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加工，特别是经过阶级关系的影响而引起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宗教愈来愈成为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成为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宗教成了麻醉人民的鸦片烟。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宗教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分析，对于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的分析，是我们正确地对待宗教和消灭宗教的理论武器。既然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有它深刻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既然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因此人们意识中的宗教偏见还不可能一

一下子克服。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的消灭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是说，既要积极地发展经济，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使一切社会成员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彻底摆脱奴役状态，完全消灭异己力量，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又要大力发展科学文化，宣传科学的无神论，帮助人们从愚昧无知，软弱无力和宗教迷信的偏见中解放出来，而绝不能用行政命令和简单化的办法来消灭宗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给人类指明的摆脱宗教意识的道路。

总之，在对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上，既要坚持唯物论，又要坚持辩证法。既要肯定“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又要肯定它们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唯物史观真正做到了把经济条件的决定意义同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揭示了经济条件在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作用，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另一方面又阐明了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恰恰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总之，历史进程中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但是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可见，没有历史的辩证法，就不会正确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也就不会有科学的唯物史观。

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全面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

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历史事变中那种主观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被现实的联系所代替，使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有许多不同于自然界的特点，有追求各种目的的、自觉的有意识的人在活动着，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在起作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中，区分出物质的经济关系和精神的思维关系，区分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且发现经济关系是它们当中的决定因素，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而各种思维关系、意识形态又都根据它们自身的特点对经济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起着不同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使“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①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页。

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作出的一个伟大贡献。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他们就开始了这一艰苦的探索和创立过程。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史发展，历史本身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唯物史观的正确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间所发表的许多著作，作为历史事变的科学反映，也对唯物史观提供了大量的令人信服的论证。这就使恩格斯有可能在八十年代所写的《反杜林论》、《卡尔·马克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提出更加完整的理论说明。

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来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

对于过去的全部历史，唯物史观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它科学地说明了阶级社会的历史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由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存在，大多数人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悲惨的生活。阶级的产生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阶级的存在又是生产还不甚发达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①这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页。

就科学地揭露出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说明否定这个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高的社会制度的因素，恰恰就在这个社会制度本身之中。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未来的历史发展，唯物史观也作了有事实根据的科学分析。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划分为彼此敌对的阶级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不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剥削，便不能解放自己。因此，它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只能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且通过有计划的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生产的产品得到极大地增长，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得到满足。这种社会制度是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①

恩格斯就是这样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实现。恩格斯也正是综合了上述分析和研究的全部成果，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了真正科学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8页。

的预见。他认为，这个社会将用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生产来代替过去的无政府状态。这个社会里人们为生存而相互斗争的状况将会停止，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终于脱离了动物界，第一次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真正的主人。这个社会里不论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自觉地控制它们，把它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能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只是从这时起，才能促使社会向着他们所预期的方向发展。人类才能真正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研究人类社会的形成史和原始社会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着重研究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史和原始社会史，仔细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有关文献，认真阅读了摩尔根的著作，分别写出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用新的结论和新的内容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从创立以来，着重研究的是阶级社会的历史及其运动规律，而对于阶级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史，对于人类社会的形成史，则还是一个很少触动的领域。因此，大量占有这一领域的资料和文献，认真吸取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深入探索和研究这段历史的问题和规律，是进一步论证唯物史观的需要，也是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用极大的精力承担了这一

任务。

人类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古代类人猿是如何转变到人的？实现这一转变的决定性环节是什么？这些都是唯物史观面临的研究课题。恩格斯通过自己的考察和研究，提出劳动、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有决定的意义。他在1876年写的未完成的手稿《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是这一重要研究成果的集中表现。

古代类人猿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前肢的机能逐步从事着和脚不同的活动，学会了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随着前肢解放出来从事其他活动，形成中的手也就变成了劳动的新器官，用来参加各种劳动，从而使手变得愈来愈自由，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可以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但是手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人的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部分，它也必然会对机体的其他部分发生影响和作用。随着手的发展和劳动的发展，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从而也就产生了有音节的语言。在劳动和语言的影响下，猿脑逐渐地变成人脑，随着人脑的进一步发展，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①完全形成的人和人类社会，就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3页。

是在这种相互推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的个体，而且创造了人类社会。这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恩格斯提出的劳动创造人、创造人类社会的科学论断，澄清了自然科学家关于人类起源的种种迷雾，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世界观，也有力地论证了唯物主义的史观。

唯物史观在人类形成史的领域内所取得的胜利，推动着恩格斯决心把唯物史观继续贯彻下去，运用它来分析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的历史，以便取代长期统治着这块阵地的唯心史观，夺取新的胜利。恩格斯的这一打算，也是马克思生前已经着手而未能实现的遗愿。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美国人种学家摩尔根在研究原始社会上作出的重要贡献。马克思曾仔细阅读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详细的摘要和批语，并打算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打算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逝世了。恩格斯认为摩尔根“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①他为了补偿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一方面充分利用了马克思生前留下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又科学地吸取了摩尔根所提供的实际材料和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某些结论，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针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都是永恒的、从来就有的谬论，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和材料，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析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和阶级社会的形成的过程，阐明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性。

从唯物史观来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划分，是以物质生产为依据的。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论点把原始社会的历史过程分为两大时期：一是蒙昧时期，这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然后进入另一个时期即野蛮时期，这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人类社会经过这两个时期以后，原始社会才逐渐解体，而后过渡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期。

家庭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复杂的形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在经历了一个非常遥远的杂乱性交关系的社会阶段以后，人类之间才有了婚姻关系。婚姻形式和家庭形式的发展，大体上是同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的。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同样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决定的。恩格斯对家庭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深刻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反映，而社会主义的家庭关

系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

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是一定社会组织解体的结果,也就是氏族制度解体的结果。恩格斯唯物辩证地考察和分析了这种制度,他一方面高度赞扬“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指出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都知道“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因此“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而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指出“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生产又极不发达,人口极度稀少,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人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因此,氏族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促使这一历史过程实现的却是一种堕落的势力。这就是“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①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他具体考察了在原始社会的发展中,当人类从使用石器过渡到使用金属工具生产时,劳动生产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剩余产品开始出现,因而人们积蓄产品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4页。

和交换产品也就跟着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社会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社会劳动的大分工，对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产品交换的经常化，必然地产生第一次社会大分裂，产生奴隶制；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贸易发展起来了，作为零散现象的奴隶制成了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社会上除了自由人和奴隶外，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即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原始社会下的氏族制度也就让位给奴隶制度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出现了一个商人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且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和剥削者，这次分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划分。恩格斯就是这样从社会的内在原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阐明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必然过程。

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也就出现了产生国家的条件和必要性。恩格斯考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认为尽管国家的形式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各不相同，但国家的本质只能是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

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些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既然不是从来就有的,当然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①

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同时这种研究又根据新的历史资料,对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新的概括,“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② 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观点及其对社会的制约性,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唯物史观,不仅为当时的实践所证实,而且也经受了以后实践的检验。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综上所述,恩格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到八十年代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古代类人猿是怎样变成人的,人是如何组成为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是怎样从无阶级向有阶级过渡的,也就是分析了全部人类形成史和原始社会史,分析了阶级社会形成前的全部历史,从而使唯物史观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完整,更加系统化了。如果再加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那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间,不仅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把它象一根红线一样,从人类遥远的过去一直到无限美好的未来都贯串了起来,使人类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自觉的认识,从而真正担负起推动历史前进的重任。

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既密切注视着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挑战,十分重视保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斗争,又迫切感到辩证唯物主义面对着自然科学上的许多新材料和新成果,应当有一个更大的发展。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哲学上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和概括这些发展。因此,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特别是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成了他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恩格斯主动地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出色地

完成了这一任务。《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在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哲学上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果， 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恩格斯密切关注自然科学内部意识形态的斗争，深入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前后用了大约十年时间。从1873年开始，他着手《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后来因为反对杜林的斗争而暂时中断。但是就《反杜林论》充分地运用和反映了前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和有关资料来说，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任务也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停止下来。因此当《反杜林论》一旦脱稿以后，恩格斯又立即把暂时中断了的写作继续下去，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又不得不再度放下这一写作而从事更为紧迫的任务，以至他在逝世时留下的《自然辩证法》仍然是一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伟大著作。

恩格斯严肃地揭露和批判了自然科学中各种反动的学派和思潮，例如企图用生物学的规律来曲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定人类认识的无限性、宣扬不可知论的生理学唯心主义，否认数学同现实之间的联系、否认数学的客观内容的数学唯心主义，宣扬“宇宙热寂说”和世界末日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否认化学中认识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的不可知论，以及在部分自然科学家中间流行的所谓降神术等等。恩格斯对上述思潮的批判，有力地说明了自然科学家由于受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影响，不能对自然

科学的发展和成就作出科学的解释，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为了使自然科学摆脱这种混乱状态，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成就作出正确的说明和总结，必须正确处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就天体和地球来说，它们都有一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恩格斯说：“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①。天体除了位置移动以外，内部的物理状态和化学状态也在不断地变化。恒星的运动过程同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一样，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或者说，都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人类居住的地球，同样也有它自身演化的历史。“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②

就生物学来说，一切生物都有它自己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恩格斯在总结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对生命运动和生命的本质，作过科学的概括和论述。他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③。因此，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所谓的“生存斗争”，而是生物体的新陈代谢，或生物体内部遗传和变异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646页。

之间的不断斗争。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只有全面地看到有机界中的“和谐”和“冲突”、“合作”和“斗争”，才能正确地说明生物进化的过程。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之所以错误，在于他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了生物界。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则走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他们把这一理论又从生物界搬回到社会领域，断言生存斗争也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是以生存斗争来取代阶级斗争，从而否定阶级斗争，取消社会主义革命。唯物史观把阶级社会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①

就数学来说，恩格斯深刻地阐明了它同现实世界的关系。任何数学都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和实践经验而存在。一切数和形的概念都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数学的无限也不是先验的，而是从现实中借来的，只能从现实来说明。因此，“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②某些数学家之所以陷入唯心主义，就是因为他们退入了所谓纯数学的抽象堡垒，忘记了数学同现实世界的联系，这样，“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而在分析中所运用的方式和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3页。

②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页。

方法就显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经验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东西了。”^①

就物理学来说，某些自然科学家把物质运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仅仅归结为机械运动一种形式，企图用力学规律来说明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恩格斯批判了这种观点，阐明了物质运动的各种基本形式，指出自然科学家把物质运动和机械运动、位置移动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大大妨碍了对各种过程的清楚的理解，并且把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煞了。

恩格斯还批判了当时自然科学中的不可知论，阐明了人的感觉器官不是认识的绝对界限。蚂蚁的眼睛能够看到人们所看不见的紫外线，但是在对这些光线的认识上，人们却比蚂蚁前进得多，不仅可以依靠自己的感觉器官，而且可以借助于科学仪器和理论思维。因此，人们是能够认识世界的，而这种认识又是以感觉器官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的。同时，恩格斯也批判了康德和赫尔姆霍茨等人企图以认识的有限性去否定认识的无限性的错误观点，阐明了人的认识就其受一定的科学技术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就其作为个人的具体的认识来说，都是有限的，而就客观世界的发展和认识的本性来说又是无限的。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恩格斯说得好：“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5页。

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①

恩格斯就是这样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阐明自然界的发展，阐明从天体到地球，从生物到人的辩证发展过程，阐明各种自然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科学地揭示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任何自然科学都无法离开思维和必要的逻辑范畴，都无法摆脱哲学的支配。历史上由于唯心论、庸俗唯物论、机械论，或形而上学世界观占统治地位，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是常有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妄想摆脱哲学、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因此，“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②所以，自然科学家只有自觉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成为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才能使自然科学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

只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即唯物辩证法，才能对于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对于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对于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正确的说明。因此，恩格斯还根据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大量材料，着重探讨和研究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他明确地把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5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归结为三个规律，即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没有打算对辩证法及其规律进行全面的研究，而只是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这些规律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恩格斯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阐明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指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实物。实物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因此，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质是从运动的形式得出来的。自然界在质上的多样性，是由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所决定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是物质的固有属性。恩格斯从研究物质运动的形式中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分类的问题。他从当时自然科学的状况出发，把物质运动的形式区分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形式，从而把当时的自然科学分为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这种在物质运动不同形式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分类和各部门科学发展顺序的思想，客观地反映了从一种运动形式到另一种运动形式自然而然的转化过程，揭示了各部门科学的内在联系，突破了自然科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的状态，指明了各种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和相互渗透的道路。

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分析，对自然科学史的考察，有力地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愈来愈多地打开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缺口，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恩格斯把这一切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点。他认为既然这些基本点已经完备，整个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就可以基本上解释清楚，因而整个自然界也就会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恩格斯就是这样在总结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作出了完整的论述。

总结哲学发展的经验，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总结人类认识发展史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划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科学标准。

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中，认为必须有一个明确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科学标准。这一标准不应当由某一个哲学家主观地制定，而应当从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求。于是，恩格斯考察了从远古时代直至文明时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发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关系问题，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形式有所不同，却始终是人们在认识世界中着重思考、在哲学中占

有极重要地位的一个问题。而且哲学史上的所有哲学家都是根据他们如何回答这一问题而分为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源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源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恩格斯正是在这样考察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仅仅归结为本源和非本源，归结为先后的关系，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恩格斯接着又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②恩格斯是在哲学区分为两大阵营的基础上提出认识论问题的，又是把认识论问题纳入哲学基本问题之中的。这样，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哲学上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而且明确了认识论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肯定了哲学在认识世界中的巨大作用。

哲学史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都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问题是在什么前提下去认识世界，认识的那个世界的本质又是什么，这就需要联系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把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② 同上书，第221页。

对待,才能判定它究竟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还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是,哲学史上的情况是复杂的,某些哲学家对于客观实在的问题并不直接作出回答,如休谟认为客观实在是否存在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康德虽然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但又力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因此,仅仅根据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作出判断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它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持什么态度,然后再综合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休谟和康德的哲学尽管不完全一样,但他们都是在坚持不可知论的时候,也就是在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失足的时候,彻底暴露其唯心主义立场的。

恩格斯在批判休谟和康德不可知论的时候,以哲学基本问题为武器,揭露了它们的唯心主义的实质,同时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①恩格斯还针对当时德国新康德主义泛滥的情况,指出既然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早已被推翻,那末新康德主义复活康德哲学的企图,在科学上就只能是开倒车的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提出的用实践驳倒不可知论的思想,是对其早已形成的实践观点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的重大发展。这不仅同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区别开来，而且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区别开来，鲜明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恩格斯在继续批判不可知论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人类的行动”在认识事物及其特性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人类的行动”比“论证”更为优先的思想，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

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既是对哲学史上两种世界观、两条认识路线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他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斗争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又是他们提供给后代的发展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锐利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在哲学发展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用唯物辩证法解释世界， 全面阐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运用它去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把这种哲学观点贯彻到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当中去，进一步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当这一任务大体完成以后，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完善化、系统化，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恩格斯以极大的精力着手这一工作，《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

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这一任务展开的。

首先,世界观的问题,世界本来面貌的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一个首要问题。世界的统一性究竟在哪里?杜林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存在。但是,存在这个概念是模棱两可的、不明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世界是各种现象的客观的物质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物质的过程,因此,这种物质性不是靠魔术师的三两句话就能证明的,而是靠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

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杜林形而上学地把物质世界和时间、空间割裂开来,把有限和无限绝对对立起来,提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限的,物质世界是可以脱离时间而存在的。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这些谬论,分析了他从形而上学陷入唯心主义的必然过程,同时又科学地提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是永恒的,既无开端也无终结,空间是无限的,任何一个方向都是没有极限的。恩格斯分析了开端与终结、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时间空间的无限性。

世界最初是处于不变的状态还是处于运动的状态?杜林形而上学地把物质和运动割裂开来,并且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提出世界最初是处于物质和机械力统一的状态,即自身不变的状态,只有发生了统一的破坏以后,自身不变的状态才转变为运动的状态。恩格斯揭露了杜林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即世界是怎样从自身不变的状态过渡到运动的状态的。他除了求助于“第一推动力”即

上帝别无他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而物质的运动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绝不能仅限于机械运动一种形式。

恩格斯在同杜林的斗争中所阐明的世界统一于物质的问题，世界无限性的问题，以及世界在不断地运动着的问题，都是运用辩证法考察和分析唯物论的重大成果，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的最好的解释和说明。恩格斯的分析，说明只有唯物论，不坚持辩证法，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不会有科学的世界观，甚至要陷到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恩格斯的分析，对于人们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世界如何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如何。这是关系到世界观的另一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固然要以唯物论为基础，但是离开了辩证法，也是不能正确解决的。

杜林从形而上学出发，鼓吹所谓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等等。恩格斯针对杜林的谬论，运用辩证法分析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就整个人类思维的本性来说，是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是能够获得绝对真理的，可以说人们的认识是至上的、绝对的；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是通过世代更替的无数个人的认识来实现的，就每一个个人的认识来说，都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都是非至上的、相对的。所以恩格斯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

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①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是一个从有限向无限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接近的过程。真理和谬误也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了这个范围，真理就会走向反面，变成谬误，它们之间的对立就只有相对的意义了。恩格斯在这里深刻地阐明了认识过程中至上和非至上、有限和无限、相对和绝对的辩证法。不懂得这个辩证法，就会堵塞认识真理的道路，就会陷于消极悲观和狂妄自满的境地，就不可能积极地、清醒地去认识世界。

再次，世界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如何把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一般的、普遍的规律。

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和批判杜林主义的过程中，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成果论证了辩证法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所固有的，离开了辩证法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整个世界。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任务就是要把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辩证法提炼出来，概括为普遍的规律，武装人们去正确地认识世界。

恩格斯论证了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即一切现象和过程都有内在矛盾的矛盾规律，由量变为质和由质变为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不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反杜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4—95页。

林论》，都论证了这些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随着辩证法规律及其思想的深入人心，恩格斯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实际地而不是口头地把辩证法真正贯彻到各个研究领域中去。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提醒人们口头上承认辩证法是一回事，而具体地实际地把这个思想运用到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他认为只要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就永远不会提出所谓永恒真理和最终解决的狂妄的要求，就会始终意识到自己所获得的一切知识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就不会迷信形而上学关于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绝对对立的论调，而真正懂得它们之间的辩证法。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发现现实的内在的联系，清除臆造的人为的联系，真正把握住它的发展规律，推进各门科学的发展。可见，恩格斯在他的晚年，不仅注重从理论上把唯物辩证法完善化和系统化，而且特别注重唯物辩证法的实际运用和实际贯彻，使它进一步“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①。

复习思考题

1. 试述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2. 试述巴黎公社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战线上所进行的几次重大斗争。
3. 试述巴黎公社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丰富和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发展。

4. 恩格斯是怎样全面地研究人类社会发史史的？
5.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是怎样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学 习 书 目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恩格斯：《论权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 四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 和列宁的哲学思想(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以后，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重大特点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西方发展到东方，在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的发展和贡献。

一 列宁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 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最杰出的代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生活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的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形势，

揭示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以后的各种矛盾，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与此同时，列宁还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优秀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进一步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列宁不愧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杰出的代表。

列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条件

列宁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的贡献，首先是同他所处的历史前提和时代条件分不开的。列宁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特征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到了列宁生活的时期，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这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垄断逐渐取代了自由竞争。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组织成了金融寡头、百万富翁们榨取工人和劳动者膏血的“万能机器”。由于剥削的加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激化起来，无产阶级纷纷起来反抗。在这种条件下，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经常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和别国领土而发生剧烈冲突和掠夺战争。他们互相厮杀，彼此削弱，从而加速了无产阶级革命时机的到来。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也变得异常尖锐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斗争，使殖民地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救亡图存，他们开展了如

如火如荼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不仅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那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也使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革命发生发展的规律也会发生某些相应的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曾经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在一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在多数先进国家内把无产者共同发动起来。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矛盾的发展，由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这一切都将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又如，过去曾经认为革命将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占多数、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首先开始。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虽然把全世界的所有角落都卷入了垄断资本控制的经济体系之中，但是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垄断资本毕竟经营不久，又系外资侵入，它的统治远不如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那样牢固有力，因此，某些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倒成了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资本主义战线最有可能首先在这里被突破。总之，社会前进了，时代变化了，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随着不断发展，不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特别是在当时的俄国，正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革命风暴表现得最为强烈。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的残酷统治压迫，这里的革命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在很短的时间

内,几乎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斗争特色和斗争方法。在上述条件下形成的列宁的哲学思想同那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完全相反,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面对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同第二国际领导人所标榜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条件下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分析了俄国社会革命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列宁哲学思想的自然科学前提

在列宁生活的时代,除了社会条件的变化之外,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这对列宁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自然科学发生了深刻的革命。这个革命开始于三种具有伟大意义的新发现。第一是X射线的发现(1895年);第二是放射性的发现(1896年)以及放射现象的物质承担者——镭的发现(1898年);第三是电子的发现(1897年)。这些伟大的发现,推翻了自然科学中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例如,原来以为原子是物质的最小颗粒,一切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而新的伟大发现却证明了,原子内部还有更复杂的结构。又如,原来认为原子和化学元素是绝对不变、不可转化、不可分割、不能发展的。而新的伟大发现却证明了,原子具有可变性和可分性,它的内部变化也是多种多样的。再如,原来认为物理学在当时已经臻于完善,似乎已经穷尽了客观世界的绝对真

理，而新的伟大发现却给传统的物理学提出了一大堆无法解释的难题。总之，自然科学的这些新发现，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界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质，揭示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总是通过无数相对真理而逐渐接近绝对真理的。

但是，上述情形对于一些受形而上学世界观束缚的科学家来说，却感到迷惑不解，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他们把人们关于物质微粒及其结构的观念的破灭，看成物质本身消失了，甚至以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世界也并不真正存在，各种科学理论不过是理性思维在解释世界时虚构出来的假设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反动哲学流派便乘虚而入，极力把自然科学拉入唯心主义的怀抱，以便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把唯心主义乔装打扮得更精巧、更富于欺骗性。

列宁一向关注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他敏锐地察觉到自然科学的最新革命以及在这个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当唯心主义向自然科学进行腐蚀侵袭的时候，列宁总结了历史上两千多年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条哲学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自然科学发生最新革命以来的新鲜经验，痛击了各种唯心主义胡说，并在斗争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列宁的哲学思想既包含着对当代自然科学中重大问题的探讨，也包含着自然科学发展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回答，它深刻地反映和概括了当代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最迫切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传播的开始 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广泛传播，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在此以前，俄国先进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民粹主义^①。早期民粹主义者虽然仇视农奴制度，主张向沙皇政府进行革命斗争，希望通过农民革命来改造国家，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是，他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在实践上则迷恋于依靠个人恐怖活动来取胜。由于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阶级斗争，因而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引起了内部的分化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信奉过民粹主义的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在1883年流亡西欧期间组织了“劳动解放社”，声明与民粹主义彻底决裂，转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战斗的旗帜。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是同普列汉诺夫的活动分不开的。普列汉诺夫的一生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876—1883年，是民粹主义者；1883—1903年，是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以后，开始一步一步堕落为机会主义者。他后期虽然在政治上犯过严重错误，但从一生看仍不失为一个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

① 民粹主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产生于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早期民粹主义仇视沙皇专制制度，反映了农民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到了八十至九十年代，早期民粹主义演变为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它代表和维护农民村社中的富农的利益，主张同沙皇专制制度采取调和态度。

普列汉诺夫自 1883 年与民粹主义决裂时起,就立志要把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第一,普列汉诺夫与“劳动解放社”的同仁曾大量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1882 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并写了序言。随后,他又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主要哲学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作了注释。此外,“劳动解放社”还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等著作译成俄文出版,由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1851—1919 年)、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 年)等人写文章、作演讲,系统地阐述和解释马克思的学说。普列汉诺夫及“劳动解放社”的这些活动,被恩格斯誉为“是对俄国的革命发展将有高度重要性的一种进步。”^①第二,为了批判民粹派的唯心史观,批判他们希图单独依靠农民革命来推翻专制制度、依靠农民村社^②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幻想,普列汉诺夫写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这些著作“用明白的、简练的、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笔法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给工人阶级展示了新的世界,号召工人阶级去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③第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第二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27 页。

② 十五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存在于俄罗斯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由定居在一定区域内的一群家庭组成。耕地归村社公有,分配各家使用,实行定期轮换,并用摊派方式缴纳赋税。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仍然保留了这种村社组织,作为束缚农民和统一征税的工具。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第 7 页。

际修正主义开始泛滥时，普列汉诺夫第一个举起了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旗帜。他在这时写的一系列论战著作如《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等，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使他成了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杰出战士。第四，当他转变到孟什维克^①的立场以后，他写了不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②的文章；而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爆发以后，他进一步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辩护士。但即使在这时，他还能继续在理论上学术上作出有益的贡献。从1907年起陆续写了批判马赫主义、造神主义等一系列哲学著作，深得列宁的称许。第五，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和俄国社会思想史的一位巨匠，在这些领域撰写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

总之，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是界于恩格斯与列宁之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之一。列宁在1921年说过：“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③ 列宁提出应把

①② 孟什维克，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的一个反对列宁的建党思想的派别，因其在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时居于少数地位而得此名。布尔什维主义，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在革命实践中所遵循的理论原则、方针路线、策略思想等。

③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①，要求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

勿庸讳言，普列汉诺夫在捍卫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错误观点。比如，他虽然引证了许多实例来说明辩证法的普遍有效性，但没有弄清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尤其是没有意识到辩证法同时也是认识的规律，不了解辩证法与认识论的统一，因而也就不能彻底划清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在认识论方面，他曾把感觉和表象比喻为事物的符号或特种象形文字，说它们不同于自己所传达的客观事物，普列汉诺夫后来承认自己犯了术语上或修辞上的错误；在历史观上，他有时过份夸大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其中更为致命的是，普列汉诺夫从1880年侨居国外起，长期脱离俄国的革命运动，脱离广大群众的火热斗争，这就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知识分子书斋的范围内，在不少方面有严重的学究气；使他的研究不能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帝国主义的时代条件结合起来，并从中做出新的结论。普列汉诺夫所未能解决的历史任务，是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来完成的。

年轻的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 的好学精神和实践精神

青年时代的列宁生活在俄国历史上一个最反动、最黑

①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暗的时期。他在大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一度遭到逮捕和流放。经过战斗的洗礼，列宁更加自觉地献身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事业。为此，他如饥似渴地寻找着斗争的武器。1888年冬，列宁从流放地柯库什基诺村返回喀山，开始认真地自修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劳动解放社”为反对民粹派而写的文章，潜心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久，列宁参加了喀山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他不仅在小组里作学术报告，而且要求小组成员用心学习。他不赞成那种仅仅从生活中猎取到一鳞半爪的材料就急于写文章的做法，而是反复强调要在基本理论上打下深厚的基础。他常说：“未曾做这样的事之前，要先把‘四只蹄子都钉上铁钉’，读书，读书，再读书……”^①经过这些小组的活动，“劳动解放社”在西欧早已宣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开始在俄国各地深深扎根，在先进思想界中一天天扩大着自己的阵地，越来越多的革命分子脱离了过去曾经热烈崇拜的民粹主义。

列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限于书本上。列宁决不是那种死啃书本、咬文嚼字、对“常青的生活之树”丝毫不感兴趣的书呆子。恰恰相反，他特别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在牢固的事实上面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他在从1889至1893年留居萨马拉的四年期间，经常找机会与农民交谈，仔细考察农民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他在研究农民经济时，总是用实践以及用对于农民生活状况的直接观察来

^① 《列宁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216页。

检验自己的结论，批判民粹派的理论。列宁特别重视组织周围的同志有计划地开展对萨马拉附近乡镇的经济调查，按不同类型的农户积累大量的统计资料。1893年春，他根据自己仔细研究俄国经济所得出的结论，写成了《农民生活中的新的经济变动》一文。这篇论文表现了年轻的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表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剖析俄国现实问题的卓越才能。

1893年8月31日，列宁来到了俄国首都彼得堡，并很快投入到工人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去。从此，列宁的脉搏，始终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脉搏一起跳动；即使在他身陷囹圄之中，或在边远地区流放，乃至被迫侨居国外，他都设法与群众的革命斗争呼吸相通，休戚与共。因此，群众在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就成了他建造理论大厦的宝贵材料，成了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好学精神和实践精神，是他能够逐步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原因。有了好学精神，才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继承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有了实践精神，才能不受书本结论所局限，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列宁正是这样把学习和独创、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的，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身兼备的这些特点和优点，是许多革命领袖包括同时代的历史人物都不能相比的，既高于那些勇于实践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但理论上很弱的领袖

拉萨尔和布朗基，也高于那些理论上很强，但实际经验却很弱的领袖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因此，列宁当之无愧地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杰出的代表。

二 在建党和第一次俄国革命 时期列宁为捍卫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

列宁一到彼得堡，就同当地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取得了联系，并以不倦的精力和蓬勃的朝气投身于工人运动之中，很快成了工人运动的领袖。他在领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年代里(1893—1905年)，主要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创立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党，确定党在革命高潮到来时的路线和策略。在解决这些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战斗的武器，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经济派的自发论和孟什维克的机械论等等，在斗争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 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有它自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还刚刚从农奴制的基地上破土而出，它还相当薄弱与幼稚，农民的分化还没

有显露出来。民粹派当时认为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号召农民起来反对沙皇专制、反对农奴制残余。它代表了俄国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观点。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俄国一切经济生活领域里迅速地确立起来，农民村社已经分化出贫农与富农，这种村社事实上已经成为富农盘剥贫农的阵地，成为沙皇政府榨取赋税的工具。而民粹派却仍旧把它美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胚胎和基础。这样，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民粹主义的阶级内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的民粹派已经变为富农阶级的思想家和捍卫者了，他们抛弃了早期民粹派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传统，主张对沙皇政府实行调和妥协。从此，革命的民粹主义又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民粹派就由原来的人民之友变为人民之敌了。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头面人物米海洛夫斯基，极力维护民粹主义理论，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与生物学上个体的进化加以类比，宣扬一套主观社会学的唯心史观。为了肃清民粹派的流毒，列宁在 1894 年写成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在这一著作中，列宁除了详尽揭露民粹派的历史演变以外，特别着重地批判了民粹派的唯心史观，深入剖析了这个唯心史观在俄国的最新表现形态——主观社会学。

民粹派主张从“人类天性”出发来研究和评判各种社会制度。在他们看来，正如生物体的组织器官日益精巧完善意味着生物体的进步一样，在社会中也同样进行着争取个性独立和全面发展的斗争。凡符合“人类天性”的，就有存

在的理由；不符合“人类天性”的，则失去存在的根据。资本主义所以不能在俄国得到发展，由于它不能满足“人类天性”的需要；农民村社所以是生长“社会主义的胚胎和基础”，由于它能使“人类天性”得到满足。总之，一切都以他们虚构出来的不可捉摸的“人类天性”为转移。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人类天性”出发，从一般的“公平”、“正义”出发，就是从抽象空洞的概念出发。这样来研究历史，是“纯粹先验论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是“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①。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决不是先验地臆造出“符合人类天性”的关于社会进步的一般理论，而是老老实实在地分析事实开始，在分析事实的基础上，找出某一客观存在的社会形态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发展规律来。马克思的不朽著作《资本论》，就是应用这一科学方法的典范。《资本论》彻底摈弃了所有关于“人类天性”、关于一般社会的抽象议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存在——商品开始，周密地考察了商品交换的全部实在过程。通过这种考察，马克思切实而透彻地分析了一种具体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的进步），从而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列宁指出，这是“‘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②，而民粹派的主观方法，则是彻头彻尾的反科学的方法。

①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民粹派从“人类天性”出发来研究和评判各种社会制度，他们片面强调英雄人物的作用。是谁能发现和解释这种“人类天性”呢？他们认为这决不可能是芸芸众生，只能是非凡的“有批判头脑的个人”；人类仰仗他们的智慧之光把自己的“天性”昭示出来，并推动社会向着适应这种“天性”的方向发展。在他们那里，社会历史领域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一切都靠英雄人物的自由意志。为了驳斥民粹派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列宁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所不同，也不否认人们在从事一定社会活动时抱有某种自觉的目的，它只是断然否认，人们单单依靠自己主观的意识就可以凭空创造历史，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各种社会关系。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巨大功绩，正是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随便改变或偶然产生的观点，他把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看作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确定了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这就最终找到了人们的社会意识产生的物质根源，打破了把它说成是上天赐予或天才人物主观自生的神话。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关系是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过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

程中形成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来决定的，它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不适应，生产关系终将被改变，社会革命就要到来。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社会经济形态决非人们的意识所能创造出来的，它的发展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服从自己内在的变化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人们的历史活动受客观规律所支配，即承认“决定论”，这是否意味着象民粹派所指责的那样“贬低了人类的尊严”，从而导致“宿命论”呢？列宁指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①所以，把“决定论”同“宿命论”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数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这里的问题正是在于，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个人的活动只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有所成就；历史是由群众创造的，个人的活动只有同群众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重大成果。列宁就是这样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辩证关系，同时也阐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

阐明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

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同时，还批判了另一个思想流派即“合法马克思主义”。如果说，民粹派代表了小市民的社会主义，那么，“合法马克思主义”则代表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当时的俄国，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取得节节胜利，民粹主义一天天变得日暮途穷，于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穿起一套马克思主义的衣衫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他们经常在合法的、经沙皇政府准许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言论，因而有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他们乐于同马克思主义者结成联盟来反对民粹派，但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来诱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著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就极力赞美资产阶级，号召大家“承认我们不文明而去向资本家领教”，这就是叫工人阶级甘心充当资产阶级的奴才，而不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合法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特点是用所谓“客观主义”来冒充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替资本主义作辩护、受资本家所赏识的东西。“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到处大讲历史进化的客观过程，却拒绝对这个过程作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当他跟在马克思主义者后面承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时，却吹捧资本主义并否认它崩溃的必然性。列宁在批判司徒卢威的客观主义时，指明了唯物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原则区别：客观主义只谈论社会经济

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唯物主义则不仅指出这种过程的必然性，而且阐明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即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这一客观进程的，是什么样的阶级活动实现这种必然性的。客观主义证明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为这些事实作辩护的立场上，而唯物主义则是揭露阶级矛盾，指出斗争的方向，促进事物的转化。可见，“合法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客观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企图掩盖矛盾、维持现状、阻止革命的思想武器，而只有唯物主义才真正揭示了社会发展客观进程的内在动力、真实内容以及实现这一过程的具体途径。所以，唯物主义比“合法马克思主义”标榜的客观主义要更全面，更深刻，更彻底。

为了彻底划清唯物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界限，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党性统一的原则。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的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无产阶级因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相一致，而无产阶级党性正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因此，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的立场上，才可能真实、准确而又深刻地反映客观现实，才可能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列宁从理论上论证并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党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贡献。

①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批判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粉碎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斗争的胜利，促进了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895年秋天，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它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最初萌芽。1898年，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地的“解放斗争协会”，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但是，这只是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为一个政党的尝试，并没有明确规定出党纲党章，达到真正的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党内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依然盛行，特别是经济派的出现，使党更加陷于组织上的分散和思想上的混乱。经济派盲目崇拜自发性，为工人运动中的落后状态辩护，不承认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能够首先从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经济派的这些主张，实际上等于使工人阶级在迫切的革命任务和强大的敌人面前解除武装，是当时俄国工人运动的最大危险。

对于经济派的活动，列宁早就密切注意着。1902年，列宁写了《怎么办？》一书，对经济主义从哲学上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且阐明了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崇拜自发性，这是经济派的基本错误。他们认为，纯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工人运动不需要任何革命理论的指导，不需要有人向它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列宁认为，在工人运动初期，自发性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但是，从这种萌芽状态提高到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自

觉意识，这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完成这个质的飞跃，单靠自发的工人运动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从有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思想家在继承人类优秀思想成果并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如果没有先进政党给他们灌输这种思想，仅仅依靠自发运动的力量，那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绝不能自发地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列宁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工人阶级只有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和指导，才能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才能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从自发地参加斗争到成长为为本阶级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先进战士。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崇拜自发性，否认先进思想的教育作用，就是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来瓦解工人运动，把工人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经济派从崇拜自发性的观点出发，歪曲地引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利益有决定作用的论断，宣扬“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②，提出“政治始终是顺从经济的”，工人运动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② 同上书，第253页。

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①，认为无产阶级单纯进行经济斗争是阻力最小的路线。列宁在同经济派的论战中深刻地分析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内在联系。他指出，所谓经济斗争，就是工人为暂时改善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向资本家进行的集体的反抗斗争，这种斗争可以唤起工人群众的初步觉醒，是社会民主党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动工人运动的开端，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要形式。但是这种斗争，毕竟只涉及某个职业的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而不涉及整个资本家阶级以及代表这一阶级利益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斗争并“不能改变使劳动者变为商品”的现象，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压迫和剥削，而只有同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被奴役的地位，才能使劳动者真正获得解放。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②社会民主党应该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而这一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力、争取政治自由。而经济派主张离开政治斗争去专搞经济斗争，这就是鼓吹工联主义，使工人运动变成资产阶级黄色工会的尾巴，用争取眼前的小恩小惠

①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52页。

② 同上书，第262页。

来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诱使他们离开革命斗争，离开社会主义。这决不是什么“阻力最小的路线”，而是“等于政治上自杀”^①。

经济派既然把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局限于领导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他们在组织上也就必然崇拜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他们认为，现有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各自单独地开展活动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全俄统一的党来领导，更不用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列宁根据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对社会民主党人残酷迫害的具体情况指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固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有了这样的组织，才能够向工人阶级灌输革命理论，把工人阶级所进行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列宁强调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②他满怀信心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③。

通过对经济派自发论的批判，列宁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关于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的理论。列

① 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全集》第4卷，第155页。

②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332页。

③ 同上书，第337页。

7
宁的这些理论，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为俄国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批判孟什维克的机械论

阐明主观因素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

在反对经济派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03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制定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在讨论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与马尔托夫分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列宁在讨论党员资格时坚持党员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要求把党建成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马尔托夫主张党员只须经常协助组织，却不必接受组织的领导和监督，这样势必使党变成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和没有定型的团体。在选举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时，两派的斗争更加激烈。表决结果，拥护列宁的人占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派；反对列宁的人占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派。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时期，两派围绕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同年夏天，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批判了孟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形而上学机械论的世界观，并结合革命的具体实践，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论，进一步论证了主观能动性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孟什维克派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一般原则出发，不

顾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机械地规定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他们根本不懂辩证法，他们表达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抽象的教条主义的，“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对根本和辩证法观念不相容的旧唯物主义的评语（见马克思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①他们硬说既然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民主制度。孟什维克的不幸就在于，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时候，他们却不去具体分析各种民主主义在程度上的差别，以及各种民主主义在性质上的区别，看不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则界限。他们既不分析俄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也不分析俄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既不了解资产阶级的特点，也不了解无产阶级的特点，既看不到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也看不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他们不是从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的分析中得出“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而是从“革命的一般性质”这个抽象的概念中得出革命策略的重要结论，提出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的思想等等。这种只援引“一般真理”而不分析具体现实的态度，在政治上是直接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在理论上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忽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抹煞主观因素在社会革命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35页。

中的能动作用，从而降低了唯物史观的意义。

孟什维克派既然反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就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在革命中夺取政权并建立革命的民主专政。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始终如一地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做一个反对派”，把胜利的果实统统送给资产阶级。列宁根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论述了建立革命的民主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指出，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在革命过程中，人民群众必然要通过各个阶级和各个集团的代表人物来为自己建造新的上层建筑，借以巩固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由于孟什维克坚持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必然否认上层建筑的变革在革命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也必然否认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列宁还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革命行动，阐发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敢不敢大胆地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敢不敢争取胜利，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列宁认为，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必然要比平时更强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必然要比平时有效千百万倍。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一方面要“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另一方面，必须“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

命首创精神”^①。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创造出并正在创造着丰富多样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在于向群众的实践学习，把运动过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从而引导群众不断前进，直至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孟什维克违背了这个原则，他们脱离实践，按自己主观虚构的公式办事，结果就不能不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

列宁在哲学上批判孟什维克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胜利，大大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激发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在列宁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在取得政权的地方，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工农苏维埃。1905年革命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它是一次重要的演习。“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②

三 在回击哲学修正主义思潮中 列宁对马赫主义哲学的批判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沙皇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恐怖统治，不仅在政治上加紧血腥镇压，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反革命势力极尽所能地诽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哲学上“批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成了时髦，追求唯心主义哲

① 《反对抵制》，《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4页。

学的倾向更加严重了，流行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的所谓“批判经验”的哲学即马赫主义，一下子成了俄国思想界中备受推崇的宠儿。

马赫主义的创始人是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以及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他们打着运用科学材料分析人的经验、人的感觉的幌子，大肆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人的经验理解为与客观实在无关的人的主观体验和感受，而把感觉看作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按照他们的观点，整个外部世界也不过是人的感觉的某种复合。在俄国鼓吹这种哲学的，除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公开敌人如列谢维奇、切尔诺夫之流以外，还有一批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如孟什维克的瓦连廷诺夫、尤什凯维奇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公然鼓吹用马赫主义来修正辩证唯物主义。在1908年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出版了四本书，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马赫主义的反动理论。当时，揭露和批判马赫主义，阐明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一项特别紧迫的战斗任务。

一场意义重大的哲学斗争

赢得同马赫主义斗争的胜利，首先是为了痛击在俄国思想界中泛起的一股宗教迷信思潮。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寻神说”和“造神说”这种反动的宗教哲学广泛地流传开来。它的代表人物宣称，俄罗斯人民已经“失去了上帝”，需要把它“寻找回来”。与此相呼应，卢那察尔斯基带

头要求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新式的宗教，并美其名曰“人类的宗教”、“劳动的宗教”，认为这种宗教式的社会主义对俄国人民是易于接近和接受的。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所鼓吹的这些谬论，英国人早在实践上作出了先例。列宁在侨居英国期间，曾经亲眼看到英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办的教堂，而且看到他们在教堂里一本正经地举行祈祷仪式。在那里，社会民主党的负责干部用鼻音读着圣经，然后就说教起来。接着，大家都站起来，按照社会民主党的祈祷书唱到：“主啊！请把我们从小人国引到社会主义王国去吧！”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恰好与唯心主义哲学一脉相通，而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是绝对不能相容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引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离开革命斗争，把自身的解放寄托于上帝的意志。因此，列宁把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观念都看作是“最危险的东西”，是“最可恶的传染病”。他指责“寻神说”和“造神说”的鼓吹者们用糖衣裹着的毒药来毒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灵魂。

赢得同马赫主义斗争的胜利，也有利于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揭露他们错误策略的思想实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党和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党必须及时地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善于把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重新组织和教育群众，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就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但是，党内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分子却经不起考验。他们神情沮丧，悲观失望，不敢再“照马克思那样革命了”。

他们主张取消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一个完全合法的工人党。他们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放弃党的纲领。“取消派”的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取消党、取消革命，向沙皇政府屈膝投降。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一些人，则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无视革命处于低潮的客观情况，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革命者，而留在杜马中作合法斗争的人则不配享受这个光荣称号。他们向党呼吁，要党放弃合法的工作方式，并从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党团。“召回派”的这些主张，势必使党同群众隔离，放弃党对群众的工作，实质上也是放弃革命。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他们用以估计形势和观察问题的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都和马赫主义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马赫主义标榜“科学”而卑弃革命，标榜“中立”而反对“极端”，标榜“新颖时髦”而不固守“死板的教条或原则”，这些很适合取消主义的口味；而其中否认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及其客观规律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对论证“召回主义”的冒险策略也很方便。这些情况表明，为了同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划清界限，彻底清算他们的错误，就必须批判马赫主义。早在1908年3月，列宁就明确指出：“内部的哲学论争必将最好地说明布尔什维主义不等于波格丹诺夫哲学。”^①

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有

^① 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159页。

它的自然科学前提。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个伟大的科学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但是，当历史进入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自然科学也经历着新的革命，深入到物质结构的微观领域，从根本上动摇了几百年来形成的一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观念。许多自然科学家囿于形而上学的偏见，不能正确评价这些现象，以为知识的基础正在遭到破坏，甚至认为物质本身也变成了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马赫主义及其信徒极力歪曲自然科学的这些伟大发现，攻击唯物主义肯定物质的客观存在是形而上学，诬蔑辩证法是“神秘主义”。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不落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必须对自然科学革命给以合理的说明，作出理论的概括。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并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划时代的发现而赋予自己以新的形态。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列宁集中精力专门从事对马赫主义的批判，并于1908年2月至10月写成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哲学巨著。

抓住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

揭露马赫主义哲学的实质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出把如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作为划分两大哲学阵营和哲学派别的水分岭。根据恩格斯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把两大哲学派别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主张，概括为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前者是唯物主义的路线，后者是唯心主义的路线。^①列宁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古往今来的一切哲学体系，不是站在唯物主义路线一边，就是站在唯心主义路线一边，任何所谓的第三条路线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哲学史上形形色色的“中间派别”，实际上并没有超越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而是或多或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唯心主义因素的混合物，它们仍然归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或唯心主义阵营。马赫主义哲学把自己打扮成“最新哲学”，“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标榜自己公正中立，不偏不倚，似乎凌驾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上，摆脱了双方固有的“片面性”。列宁紧紧抓住了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这一锋利的思想武器，对马赫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剖析，指出：“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地都在陷入唯心

① 参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①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处处都在戳穿马赫主义者的伪装，揭露他们的唯心主义实质。

在揭露马赫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实质的过程中，列宁选择了马赫与阿芬那留斯的早期著作。在这些早期著作中，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明确地直言不讳地叙述了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基本前提。马赫认为，构成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等，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那些东西。在他看来，“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这是正确的。”^②这就是马赫主义对世界本源问题的回答，对宇宙的总看法。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马赫主义的观点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感觉和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确实存在，这就导致了最纯粹的唯我论。不管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怎样拒绝唯我论，但事实上，如果他们不陷入惊人的逻辑谬误，他们就不可能摆脱唯我论这种困境。

为了掩盖这种赤裸裸的唯我论，马赫杜撰了“世界要素”说，阿芬那留斯杜撰了“原则同格”论。马赫主义者企图在这些生造的哲学术语下面隐丑藏拙。但是，这些拙劣的掩饰，并不能改变他们哲学路线的实质。“世界要素”是什么？马赫说它既不是物质的化学元素，又不是纯粹精神性的东西，而是中性的；它在同人的神经联系时是心理的，而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8页。

② 同上书，第37页。

在彼此发生联系时又是物理的。但“要素”本身到底是什么呢？马赫自己供认，原来“要素”就是感觉。这样，世界归根到底还是由感觉的复合所构成，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又暴露出来了。列宁说得好：“以为造出一个新字眼就可以避开哲学上的基本派别，那真是小孩子的想法。”^①至于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也是同样的货色。按照这种“理论”，自我与环境处于原则上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自我不能离开环境，环境也不能脱离自我；没有自我，也就没有外部世界。结论依然是：离开了或不依赖于意识，就谈不上任何客观实在。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吗？其实，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都承认，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自然科学早已证明，地球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这就说明，在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感觉的复合”、任何自我的时候，我们的行星已经围绕太阳运转了好几百万年了。

马赫主义用以迷惑人的，还在于它把自己所依据的原则吹嘘成是什么“思维经济原则”。马赫主义者竭力赋予这个原则以貌似科学的形态，说这个原则要求人们对经验材料进行“最经济的记述”。其实，马赫主义者所指的“经济的记述”，并不是从科学材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人的认识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而是要从材料中清洗掉它的一切客观内容，把物质及其运动的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50页。

规律都“经济地”赶出哲学。为了“经济”起见，宣布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的。这样，感觉就成了没有物质的感觉，思想成了没有头脑的思想。列宁认为，这种无头脑的哲学“是企图在新的伪装下偷运主观唯心主义。”^①

列宁在揭露马赫主义哲学的时候，不仅剖析了这个哲学体系本身，还追溯了十八世纪主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根对立，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与马赫主义的对立是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的继续。列宁还清理了马赫主义的来龙去脉，揭示了这种哲学是从康德出发，向右的方向的发展，即丢掉了康德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然后又退回到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去。与此同时，列宁又考察了马赫主义同其他唯心主义哲学派别的联系和相互关系，确定了它在两条哲学路线斗争中的地位。列宁就是这样彻底揭露了马赫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

只有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 才能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唯物主义哲学以承认自然界是本源，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为自己的基本前提，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但是，感觉究竟是怎样在物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通过感觉能否如实地反映客观的外部世界？人的意识在总结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获得了科学理论以后是否就成了凝固不变的？为什么有些被实践所证实的科学真理又会被以后的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1页。

科学发现所推翻？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善于辩证地思考，才能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到底。列宁正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回答和解决了一系列认识过程中的问题，批判了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驳斥了马赫主义的种种歪曲和诡辩，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

马赫主义者在企图驳倒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种责难，他们说：完全不能设想，任何心理体验，任何感觉，怎么可以从物理学所使用的要素即质量和运动来构成。列宁回答说：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从物质的运动中引出感觉或者把感觉归结为物质的运动，而是承认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特性之一。”^①感觉作为感官接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主观映象，是大脑这种物质器官的特殊属性，它在质上不同于物质的其他一切特性，当然不能从物理学所使用的要素中引伸出来。但是，这种特性又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它和大脑中发生的一定物质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离开人体的神经和大脑，就不可能有感觉。承认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承认任何脱离肉体的感觉，实际上是把这些感觉归属于神。列宁还进一步指出，虽然具有明显形式的感觉，只同高度发展的物质即只同有机物有联系，虽然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但感觉这种特性在有机物中出现也决不是突如其来的。根据已有的科学材料，列宁做出了这样的假定：一切物质都应当具有一种实质上和感觉相似的反映特性。在这种反映特性的基础上，经过物质本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页。

身的长期发展，才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形式的感觉。马赫主义的荒谬之处就在于：它不去分析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不去探求物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感觉这种新特性的基础，不顾明显的感觉只和高度发展的物质相联系这一事实，武断地把感觉当作第一性的东西，宣布一切物质都由“感觉的复合”所组成。

马赫主义者还喜欢唱这样一种高调，说他们完全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相信我们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反对超越感觉的范围，他们攻击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感觉，肯定在感觉之外还有客观实在，从而使世界“二重化”等等。马赫主义者这些谬论的要害就在于：他们无视人类实践中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的事实，硬把感觉看成是隔离人的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形而上学地隔断感觉和它的客观源泉之间的联系。列宁在驳斥这些哲学诡辩时指出，无数无可争辩的事实告诉人们：当感觉受到来自外界的某些对象的刺激时，人们关于这些对象的某种感觉就相应而生；而当某一障碍物使得客观存在着的对象不可能对我们的感官发生作用时，原来感受到的某些现象便不复存在。这不仅表明对象、物和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而且还表明感觉是意识联系外部世界的直接桥梁，人能够通过感觉反映外部世界。科学史和技术史上千百万个类似从煤焦油中发现茜素的例子还告诉人们：“自在之物”可以转化成“为我之物”；尽管感觉作为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不可能与事物本身绝对等同，尽管人们通过感觉只能逐步反映客观事物的某些部分、某些方面，而不能一下子穷尽它的全部，但是，在

感觉与被反映的事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不存在天生的不一致。人们正是通过感官所提供的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映象,才能从不知发展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发展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马赫主义者由于不承认客观外界是感觉的源泉,不承认在人的表象中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内容,从而走向了相对主义。他们歪曲人类知识可变性的事实,企图证明认识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波格丹诺夫甚至因恩格斯承认绝对真理而非难他有折衷主义。列宁发挥了恩格斯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①在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间并不存在坚固不破的障壁,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互相转化的。因为,绝对真理正是由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而科学上的每一个新的发现,都是向绝对真理迈进了一步。人类知识的可变性,决没有推翻客观真理的存在,而只是证明了人类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过程具有辩证的性质,证明了日益发展的科学理论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界的里程碑都具有相对的、近似的性质,而人类正是沿着这些里程碑不断地接近于完全地反映着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

在批判马赫主义者的真理观的过程中,列宁明确地提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35页。

出，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同时，他还把辩证法贯彻到实践观中去，提出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原理。这就是说，人们的实践活动，总要引出一定的客观效果；这种客观效果，既不随人的愿望、也不依人的意志而改变；用它来检验认识的真伪，就可以成为铁面无私、界限分明、证据确凿的客观尺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标准是确定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的实践活动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人们的实践在历史上总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由它所证实的某一真理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全部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标准又是不确定的。列宁的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基础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严密整体

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在一般哲学问题上公开叫嚷要用马赫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但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他们却声称自己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虚伪的声明，完全是欺人之谈。波格丹诺夫之流既然在一般哲学问题上贯彻马赫主义路线，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①实际上只能是历史唯心主义。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29页。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波格丹诺夫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已经不能完全让人满意了，需要加以修正和发展。他的理由是：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他于是得出结论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来说，是等同的。”^①用社会存在等于社会意识的公式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就是用马赫主义来歪曲和篡改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指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等同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等同的一样。人们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互相交往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等同的。归根到底，社会意识是被社会存在决定的；而社会存在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波格丹诺夫不仅在一般原理上歪曲和篡改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还把“唯能论”或“生物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比如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地是社会整体的能量的增长”，“但是，由于这个过程性质不和谐，因而它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能量的急剧减少”^②。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看不到一点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迹象，只有定义的制造，以及把这些定义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23页。

② 同上书，第334页。

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波格丹诺夫说，他的本意是想证实和加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结论，但他为此既没有补充一点具体材料，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危机的性质和它在不同社会阶段上的历史发展，而只是在马克思的现成结论上贴上了唯能论的标签。列宁问道：“难道还能想象出比罗列这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毫无意义而且也不能有什么意义的生物学和唯能论的名词更无益、更死板、更烦琐的事情吗？”^①

列宁在揭露了波格丹诺夫之流用唯心主义歪曲和糟蹋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以后，还分析了出现这一情况的历史原因，这个原因可以用历史条件的不同来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形成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了摆脱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把哲学唯物主义贯彻到底，他们特别注意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注意一般唯物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以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而将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赶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广泛的传播，资产阶级哲学就胆怯地回避直接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是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了认识论的方面；资产阶级哲学企图通过对认识论的研究来复活唯心主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唯心主义开辟道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马赫主义正是适应着这种潮流而出现的哲学派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4页。

别。这个哲学派别的特点是用自然科学的材料来伪造所谓超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片面性”之上的认识路线，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掩盖其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波格丹诺夫等俄国马赫主义的信徒，迷惑于马赫主义哲学的貌似科学的外表，看不清它的唯心主义本质，完全作了这种哲学的俘虏。他们口头上声明拥护马克思主义，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另一方面又妄图以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仿佛他们这样做是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波格丹诺夫之流正是这样失足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

鉴于这种情况，列宁特别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他指出，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心理的东西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大大优于他们同时代思想家的地方正是在于：第一，他们从来没有企图在哲学的两个基本派别之外又去发现什么新路线或找出什么新方向，从来没有打算用任何糊涂观念、古怪术语、以至诡辩伎俩来混淆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模糊问题的实质；第二，他们也不是在旧唯物主义哲学已经达到的水平上止步不前，满足于重复旧唯物主义已经解决了的那些认识论问题，而是把这种唯物主义彻底贯彻到社会科学的领域里，从而使唯物主义哲学上升成为一种严整的首尾一致的世界观；第三，他们始终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鄙弃任何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无聊把戏，并善于敏锐地发现一切“最

新”流派背离唯物主义而纵容唯心主义的倾向，及时给以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列宁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必须时刻坚守他的导师们的这个最伟大最宝贵的传统，特别是在情况复杂、各种思想流派斗争激烈的条件下，更要严格地信守自己哲学派别的党性原则，善于结合在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来贯彻自己的哲学路线，而决不能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去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他借用狄慈根的话说，如果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别比做固体和液体，那么中间分子就是烂泥一类的东西。“讨厌的烂泥”虽然似乎说不上有什么党性，但它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对立，而只是乱七八糟地将它们搅和在一起。波格丹诺夫之流用马赫主义来发展和补充马克思的学说，这正是妄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与它毫不相干的哲学流派搅和在一起，这种糟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行径，必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唾弃。

列宁最后指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①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在这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中，列宁彻底揭露和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以及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系统地全面地捍卫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就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使它免受修正主义的篡改和歪曲，而且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不仅是我們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极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批判哲学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彻底坚持哲学党性原则的典范。

四 在研究认识论的基础上列宁 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在1908年至1910年的革命低潮时期，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仅捍卫了党的理论基础，而且锻炼了党的组织。1912年，在布拉格党的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彻底决裂，形成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以新的战斗姿态领导着俄国广大工农群众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而斗争。

正当俄国革命运动开始新高涨的时候，1914年7月底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爆发，不仅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而且也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

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第二国际大多数党的领导人直接背叛了自己签名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公然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煽动工人在本国政府的驱使下去屠杀别国的阶级兄弟。原来曾经称兄道弟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开始互相指骂,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而撕破了面皮。第二国际的门面终于无法维持而可耻地破产了。在这种严重关头,列宁和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挺身而出,砥柱中流,努力团结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用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争取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

研究辩证法是理论战线 和实际斗争的迫切需要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为了替自己的叛卖路线辩护,制造了各种各样的荒谬理论。他们或者用诡辩术来歪曲辩证法,或者用庸俗进化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分别为本国开脱,却又标榜自己“辩证地”援引了“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他们口口声声吹嘘自己的理论根据是“辩证法”,而左派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辩证法。列宁愤怒地斥责考茨基是“愚蠢透顶的学究或滑头的骗子”^①,斥责普列汉诺夫“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的这一崇高事业中”“创了新纪录”!^②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43页。

② 同上书,第624页。

正当帝国主义者激烈争夺、拚命厮杀的时候，考茨基却抛出了“超帝国主义论”，硬说战争的结局“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他象牧师一样，祈祷战争的教训会使各国之间达成协议、裁减军备、实现持久和平。他天真地认为工人阶级从此就可以依靠和平手段，经过改良办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而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了。列宁称考茨基的理论是“死硬的抽象”、“痴愚的童话”、是“丧胆的市侩想逃避险恶现实的反动企图”。在考茨基的理论中，没有一点革命辩证法的影子，剩下的只是一点一滴的改良和平庸缓慢的进化。

为了确切判明恩格斯逝世以来的世界形势和时代特点，确定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任务和策略，批判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列宁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哲学方面，他着重研究了辩证法的问题。1914年至1916年，列宁在旅居瑞士时，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遗留下八本笔记，这就构成了后来有名的《哲学笔记》。《哲学笔记》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直接继续。也可以说，列宁对辩证法的研究是他研究认识论的直接继续。因此，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到《哲学笔记》，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理论战线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创造性地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并作出划时代的伟大贡献的最显著的标志。

确定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划清两种发展观的界限

列宁把对立统一规律确定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经历

了一个发展过程。1913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还只是一般地指出辩证法是“最完整、最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到了1914年7月至11月,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进一步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作了简要的描述,指出发展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以往的阶段,是按螺旋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事物内部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和趋势的矛盾、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等等。1914年9月以后,列宁在写作《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过程中,又多次谈到辩证法的问题,并开始在有地方把对立统一规律突出出来。后来,列宁初步总结了他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成果,写下了辩证法十六条要素。列宁对于辩证法要素的概括,说明了客观事物或过程相互关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说明了客观世界所具有的方面、特性及其相互联系是多种多样和无穷无尽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这就为系统地研究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基础。列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从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方面去把握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

列宁在把对立统一规律确定为辩证法的核心之后,接

^①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0页。

着就说明和发挥这一思想。1915年，他写了《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深入地探讨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内容，探讨了这一规律所包含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内部联结，探讨了这一规律与辩证法的其他规律的相互关系。按照列宁的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一致、互相关联、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等等，另一方面是对立面的差别、矛盾、斗争、互相排斥等等。关于对立面的同一，列宁也作了两方面的分析，即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①

与此同时，列宁提出了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原理。由于矛盾着的对立面在相互依赖时，它们每一方面各自在占据特定的地位、以特定的资格与对方发生相互关联时，需要一定的具体条件，比如战争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守、主动与被动，日常事物在数量与空间位置方面的大与小、长与短、高与低等，它们在复杂多样的关系中之所以能够形成矛盾的相互联结，总要有一定的具体条件来维系，条件变化了，矛盾对立双方的地位必然随之改变；又由于构成矛盾对立面的双方不论在相互依赖时，或发生地

① 《哲学笔记》第111页。

位转化时，它们都在争强竞胜，斗争不息，所以，列宁认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在分析对立统一规律与辩证法的其他规律之间的关系时，列宁明确指出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特殊表现。经过这样的说明和发挥，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而是一个经过深入分析、严密论证的科学理论了。

列宁把对立统一规律确定为辩证法的核心，对于分清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界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庸俗进化论。这种发展观的特点是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在解释事物发展的原因时，又只承认外力的推动，而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列宁在把对立统一规律确定为辩证法的核心以后，明确区分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他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①正是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列宁深刻地揭示了这两种发展观的本质区别：根据第一种观点，发展的动力、源泉、动因都被忽视了；这种被动论的发展观是死板的、贫乏的，丝毫没

① 《哲学笔记》第 408 页。

有生气的。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源泉上；只有这种观点，才能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能提供理解事物从一种质转化为他种质的飞跃、理解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等现象的钥匙。

坚持辩证法的客观性 揭露诡辩论的唯心主义实质

列宁在研究、探讨辩证法时，非常注意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列宁说：“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学说是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神、绝对、纯粹观念等等。”^①列宁不仅处处维护辩证法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坚决主张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把头脑中的辩证法看作是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反映，而且认为，人们在运用辩证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时，也必须坚持辩证法的客观性，决不能有半点的主观武断。列宁正是用这样的思想无情地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们的各种诡辩。

坚持辩证法的客观性，在使用概念时，就必须如实地把握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内容，不允许借口概念的灵活性而歪曲它的客观内容的质的规定性。比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个概念，它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求各国无产阶级为了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而加强团结，相互支援。离开这

^① 《哲学笔记》第104页。

个基本内容，乱加解释，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诡辩。考茨基就是进行这类诡辩的典型标本。他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而驱使各国工人兄弟互相厮杀时，竟然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同俄国交战国家的社会党人）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列宁气愤地写道：“这种绝妙的议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个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请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为这种行为作辩护；为了‘保卫祖国’而让法国工人向德国工人开枪，让德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开枪！”^①

坚持辩证法的客观性，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就必须立足于“自在之物”本身，而不单单求助于“实例”或“枝节之论”。列宁在判明战争性质时，严格坚持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他说：“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②

坚持辩证法的客观性，还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③，认清事物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26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卷，第732-733页。

③ 《哲学笔记》第238页。

的本质和主流,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考茨基却不是这样,他从主观的需要出发,常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某些次要方面,来模糊事物的本质。比如,他为了替“保卫祖国”的口号制造理论根据,硬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它还带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虽然有帝国主义的要求,而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却有“民族的”要求。列宁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具有民族因素的只有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但是,这种民族因素对全欧的战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考茨基借口战争中的某些局部情形,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这是地地道道的诡辩。

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

揭示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就提出要善于辩证地思考,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人的认识怎样由不知发展到知,由比较不确切不完全的知识发展到比较确切比较完全的知的过程,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哲学笔记》中,列宁一方面用对立统一规律考察了人类认识的矛盾运动,同时又深入分析了普列汉诺夫混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错误,然后精辟地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

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①从列宁的批评可以看出,坚持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在当时对于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阐明辩证法和认识论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统一的思想,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的深刻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者统一当然不是抽象的同一,绝对地等同。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别也不是科学分界的差别,只不过是研究的方面和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罢了。辩证法所研究的是客观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论研究的是认识的本质、条件及其发展的历史,而逻辑则是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的。三者的统一——它们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哲学科学。辩证法如果离开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历史,就失去了它的客观意义,变成一种先验的公式。认识论如果不辩证地研究认识的过程,那就会变成形而上学的认识论。逻辑如果离开客观世界的运动和发展,就会变成形而上学的逻辑。可见,这三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是交织在一起的。

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首先可以看到,认识是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过程。列宁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

^① 《哲学笔记》第410页。

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①正是经过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这样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矛盾运动，推动着认识日益深化和发展。设想这个矛盾的最终克服，达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绝对统一是完全错误的。

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过程，是通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一循环往复的发展途径实现的。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②列宁所说的生动的直观是人们在实践中的丰富多采的感性认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了抽象的思维，还要再回到实践中去，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来检验、证实和发展真理。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认识中的一种“圆圈”。这种“圆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人的认识也就一步一步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这中间有一个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转化过程。列宁十分重视理性认识的重要意义。他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

① 《哲学笔记》第208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①在理性认识中看不见事物的细节或现象,可是它掌握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掌握了事物的全面,这是感性认识所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有质的不同。但从整体上来看,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又同是人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它们的不同,仅仅表现在反映深度上的差别。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随着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了解日益增多,积累的感性材料日益丰富,人们的认识就可以由感性阶段转化为理性阶段。不承认从感性认识中可以总结、概括、抽象出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理性认识,或者干脆否认人的认识根本就不能反映客观的必然性,那就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对立统一,也是一个往返循环、不断前进的过程。这样,人们的认识不仅从现象进入本质,而且“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②所以,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认识就只能是一个不断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通过无数相对真理逐步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列宁很喜欢用由一连串向前进展的圆圈构成的螺旋形曲线来比喻这个过程。因为用这样的曲线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区别开来,用这样的曲线还可以揭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

列宁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

① 《哲学笔记》第181页。

② 同上书,第278页。

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②列宁认为,象旧唯物主义那样把唯心主义说成是单纯的胡说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认识过程本身出发,说明它错在哪里,利用了认识过程中的哪一片断,这样才能使人们明了唯心主义的荒谬性,坚决同它划清界限,同时,还能使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自觉遵守正确的思维规律,竭力避免唯心主义的错误。

列宁的《哲学笔记》涉及的范围很广,谈到的问题很多,记载了列宁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光辉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学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通过以上概述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列宁在哲学上着重研究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问题,为党制定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列宁在哲学上的这一贡献,给俄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直接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在逐步认清俄国国情的基础上,把推翻沙皇统治、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

^② 《哲学笔记》第411—412页。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列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客观条件。
2. 什么是民粹主义？列宁是怎样批判民粹主义的？
3. 在批判经济派的斗争中，列宁从哪些方面论述了主观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4. 列宁为什么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他是怎样批判马赫主义及其信奉者的？
5. 试述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以及《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的基本思想。

学习书目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单行本），第五章

列 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第一编，见《列宁选集》第1卷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代绪论，第一、二、三章，见《列宁选集》第2卷

《卡尔·马克思》，见《列宁选集》第2卷

《辩证法的要素》，见《列宁选集》第2卷

《谈谈辩证法问题》，见《列宁选集》第2卷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 和列宁的哲学思想(下)

一 十月革命准备时期 列宁的哲学思想

俄国二月革命的风暴,摧毁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俄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醒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正确地估量了阶级斗争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不失时机地决定了以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工作,着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国家和革命问题

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集中精力研究国家与革命

问题。在研究中，列宁以马克思为榜样，使自己的学说真正成为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具体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创立的国家学说和他们的全部理论一样，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

列宁运用辩证法分析了民主这种国家形式，指出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但是，民主同时又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更民主的国家机器。在这里，表现为“量转化为质”，高度的民主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相联系的。

列宁还运用辩证法分析了大银行这样的国家机构，认为它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应当把它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并且砍掉这个机构中产生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也会转化为质，统一而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办事处，就已经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构了。

列宁认为国家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

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消亡”。但是,这同机会主义者借口“国家消亡”而否认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消亡”,正是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诚然,“国家消亡”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它所经历的长期的渐进过程正是革命飞跃所开辟的。

列宁还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方面考察和分析了民主这种形式对于革命的意义。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其实质绝不差于君主制度下的国家,但这决不是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关紧要的。民主愈发展,愈有利于形成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阶级斗争形式,也就愈能够促进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因此,彻底发展民主,找出这种发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对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都是十分重要的。

机会主义者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往往用折中主义来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他们给人一种假象,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互相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科学的解释。列宁认为只有坚决反对折中主义和诡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能真正反对机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对国家和革命问题进行阶级分析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对待社会革命首先应当分析：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列宁认为党性既是政治开展的条件，也是政治开展的标志。某个阶级在政治上愈开展，愈觉醒，他们的党性也愈强。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以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为出发点。列宁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基本上有三种主要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们常常谈到第一种力量和第三种力量，而对人数众多的第二种力量却不愿意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去冷静地估计，看不到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不重视被俄国二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所证实了的这条真理。因此，无产阶级只有争取小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才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有效地进行阶级斗争。

列宁认为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革命就是旧东西死亡的无比复杂的痛苦过程，也是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生活方式的诞生过程，往往是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从这种意义上说，革命的和平发展，一般总是一件非常少见和极其困难的事情。革命的深刻性并不拒绝必要的改良，但却不能归结为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在保持统治阶级政权的条件下要

统治阶级作出的让步而根本不触动其统治。马克思主义者则把改良作为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真正的革命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

因此，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上讲，或是从它的实际政治意义上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①政权问题之所以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但是，实际生活是复杂的。革命过程中，国家政权有时会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人们往往弄不清楚真正的政权究竟在哪里，形式上的政权和实际上的政权究竟在哪里。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是这种情况。1917年3月至4月间，人们不知道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维埃手中。列宁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指出，关键要看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

列宁的光辉著作《国家与革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历史上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革命问题上重要思想的发展，批判了各种机会主

^① 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

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背叛，划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列宁深刻地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①可以说，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科学地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光辉典范，也是列宁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提供的最锐利的理论武器。

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 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诞生了！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领导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中，在过渡到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列宁都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哲学上分析和论证伟大的战略转变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于1918年3月至4月间写了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纲领性的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提出了从“夺取俄国”到“管理俄国”伟大战略转变的任务。

历史的转变要求苏维埃政权必须确定新的方针，提出新的任务，把管理俄国作为主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为了提高全党实现这一转变的自觉性，列宁从哲学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

第一，阐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

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他首先指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反映经济的利益和发展要求，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任何社会革命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就是要把党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人民，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它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基础；同时它也是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因为只有在基本解决了这个任务以后，俄国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列宁在首先肯定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又尖锐地批评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他们或者片面地从经济上看问题，或者折中主义地既从经济又从政治上看问题。列宁认为，“政

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①当然，这是针对苏维埃政权当时还很不巩固的具体情况，针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错误观点，从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首先要进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并且要保持和巩固政权这个意义上讲的，而不是一般地论述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列宁驳斥了这样一种错误论调，认为俄国原来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农国家，生产力和科学文化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当然需要有一定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但是，达到这一水平的前提，首先需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创造，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等等。列宁还曾经指出：政治是经济的根本保证。正如列宁在批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割裂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时强调指出的，全部问题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②显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列宁多次指示全党要使斗争的中心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要把主要的政治看作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要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为发展经济所提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诸如：正确地运用无产阶级

①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② 同上书，第442页。

专政的国家力量，制定发展经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适时地变革和调整社会的生产关系，加强和提高经济的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首创精神和遵守严格的纪律等等。总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在正确认识与掌握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依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来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第二，阐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

列宁提出的战略转变，要求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即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政治，必然要求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不仅在十月革命以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学说，而且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鼓吹所谓“纯粹民主”，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从右的方面割裂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同时，国内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挑起了职工会问题的争论。他们不顾党从实行战时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的新形势，在对待群众的关系问题上，要求党实行“整刷”、“拧紧螺丝钉”，反对列宁和党提出的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动员、教育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学校的正确主张，他们从左的方面割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忽视民主的方面，甚至妄图用专政的方法来对待广大人民群众。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明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所具有的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实行最广泛的、最深刻的民主。只有实行对少数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才能有广大劳动群众的民主；同时，只有发扬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才能卓有成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强有力的专政。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和专政两方面辩证关系的论述，不仅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学说，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如何正确地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强有力的武器，以保证战略转变胜利实现的问题。

第三，阐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

1920年5月，列宁在批评布哈林混淆矛盾和对抗的界限时，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列宁明确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矛盾，即使在对抗性的矛盾消失以后，非对抗性的矛盾还将大量存在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两类矛盾：一类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和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这一般需要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即“谁战胜谁”的方法来解决。当然，这类矛盾也

可以采取多样的灵活的形式来解决。列宁曾在1920年写的《政论家的短评》一文中具体分析了上述灵活形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前提,如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绝对巩固,资本家的处境已经绝对没有希望,等等。另一类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究竟怎样解决?列宁是非常慎重的。他认为既要看到它们相互之间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又要看到阶级利益的差别性,要充分估计解决这类矛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一文中,谈到工农之间的矛盾时,用了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的“组织科学”的概念,受到了列宁的批评。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伴随有无产阶级的组织起来的趋势和农民的商品无政府趋势这二者之间隐蔽的或比较公开的斗争。”^①列宁在批判这种观点时指出,“应该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之间。在这里放上组织起来一词,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②列宁在谈到解决这类矛盾时,认为要消灭工农的差别,不会一下子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解决这类矛盾,不能用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法,而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对于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列宁认为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就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说服”、“宣传”、“教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

①② 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页。

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性质不同，随之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因而解决矛盾所表现出来的飞跃和质变的形式，也必须具有新的特点。

1921年列宁在回顾四年来革命改造所经历的道路后指出，无产阶级试图尽可能以渐进的方式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苏维埃政权曾向资本家建议，对他们实行和平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却以反革命的武装斗争回答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个建议。这就迫使无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不得不远比预想的更多地摧毁旧的关系。

按照列宁的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如果说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时候，曾经试图用渐进的方式；那末，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就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必须是一个渐进性变化的过程。对于劳动农民只有坚持耐心地用各种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他们觉醒起来，随着他们的觉醒程度和组织程度前进。这种“渐进性变化”和“逐渐的过渡”，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飞跃形式的新特点。

综上所述，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出的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飞跃形式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的许多重要思想，对于实现列宁所提出的伟大的战略转变，真正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阐明实践在新时期的作用，

强调一切都在于实践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建立和巩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斗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变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怎样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必须由革命实践本身来解决。革命的实践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活动。列宁认为实际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人民群众自己会在实际生活的考验中懂得真理的。列宁经常用“事在人为”的道理教导工农群众，要他们懂得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任何一个实际步骤，都胜过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列宁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清楚地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的新事业，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方法来组织。因此，新的革命实践，既要大胆勇敢，又要小心谨慎。这就比任何问题都更需要按照“七次量衣一次裁”的规则办事。所谓“七次量衣一次裁”，就是自己动手并且教会别人动手去仔细地研究实际经验，实事求是地检查所做的事情，用劳动者集体的经验，主要是工作结果的经验来审查和纠正自己的工作，要在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管理制度等等都已

经充分证明行之有效以后再继续前进。列宁认为这种用实际经验来检查自己，不应当是一次两次，而应当是许多次。革命大军在困难的道路上，在当时非常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

列宁认为实践经验是知识的源泉。要使千百万人获得知识不是依靠宣传而是依靠他们的亲身经验。工农群众要参加国家的管理，但管理的艺术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领导群众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不是因为她按照革命词句来行动，而是因为她善于观察事实、从事实中吸取教益。列宁再三强调，不要只从书本上学习，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学习，从工作中学习，从自身经验中学习。群众自己在创造社会主义，无论犯了什么错误，都应当在这个实践中学习，逐步掌握革命的艺术。

总结过去的实践经验是为了今后的实践，决不可以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列宁说要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把过去的实践经验，当作材料，当作教训，当作往前行进的跳板。全部问题在于不要满足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的本领，一定要前进，一定要争取更多的东西，一定要从比较容易的任务过渡到比较困难的任务。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也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步。要前进就不应当推翻一切，事事从头作起，而要善于充分利用现有的东西。要尽量少来些全盘推翻的作法，而尽量多提供些切实可行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意见来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因此，要前进，就应把周密考虑过的、经过劳动和共同努力精心提炼过的实际经验，运用到新的革命实践中去。

面对着十月革命后崭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列宁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这是完全正确的，十分必要的。

在实际斗争中贯彻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是靠威望吃饭的。”^①唯物主义者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如实地认识客观世界的。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要主观符合客观，真正认识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本身的发展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列宁总是按照唯物主义者尊重客观事实的要求，指示党和革命同志要严格地精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1918年3月，列宁在《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中指出，在每一个急速的历史转变关头，必须要估计到各个阶级整个的对比关系，不能仅仅抽出个别例子和个别事件，而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又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是随着阶级斗争的进程经常变化着的。因此，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经常不断地、随时随地地精确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

精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是在阶级斗争中正确认识“事实的铁的逻辑”的基础。党的任务就是要根据阶级关系确定自己的策略。有了对客观事实的正确认识，才能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正确的政策。列宁把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

①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469页。

看作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特别是在激烈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中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是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估计到客观条件和它们的变化，克服对政策的“凝固化”和“僵硬化”的弊病。因此，列宁提出要学会一种必要的“革命艺术”，即既要尊重客观事实，又要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做到灵活机动，善于从千百万群众的实际状况着眼，这样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

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斗争策略，是贯彻唯物主义精神，正确估计客观事实的典范。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敌人是强大的，在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革命的情况下，最重要的防卫手段就是退入腹地。因此，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主动向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和约的建议，以结束战争状态。特别在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和平建议的情况下，列宁为了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使苏维埃政权获得喘息时机，不顾“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反对和阻挠，决定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条件苛刻的和约。这当然是极端痛苦和非常难过的事情。但是，这种斗争策略可以使苏维埃政权赢得时间，重新组织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夺取最后的胜利积极地创造条件。这是出于高度的自信心，相信觉悟的工人能正视痛苦和危险的现实，正确估计自己力量的表现。

列宁十分强调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提出要有“实际精神和求实精神”，要“量力而行”，要反对“冲动”

和“革命空谈”的毛病。他认为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应当把实际精神和求实精神作为当前主要的口号。要量力而行，就是不要去做那些力不胜任的事情。他认为胜利了的苏维埃政权应当承担援助国际革命的义务，但是援助的方式应量力而定。列宁特别反对革命空谈的毛病。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当前事变的转折和当前形势下的客观情况，一味重复漂亮的、毫无根据的革命口号。这种毛病的阶级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其危害性是极大的，它能导致革命政党的毁灭。为了反对“革命空谈”，应该学会尊重科学，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的狂妄自大，要少讲空话，多做实际工作。

严格按照辩证法办事， 坚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际斗争中，列宁极其巧妙地运用了革命辩证法，严格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

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当我们观察任何事物时，总是事物的现象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而现象又是发展的，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不平衡的。列宁根据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次比较巨大的改革，不经过各种力量之间的反复多次的斗争，不经过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革命的发展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革命运动总是曲折前进的。

革命时期党的政策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要善于随机应变。这不仅是尊重唯物论，也是尊重辩证法。列宁认为从辩证法来看，这种灵活性的根本要求就是把握对立面的统一，要善于在恰当的时候用合适的方法把对立面统一起来。列宁就是这样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来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事业的。他所设想的利用外资和实行租让制；他利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巧妙地掌握空间和时间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让出了空间，从而换取了时间；这一切，都是暂时牺牲了次要的利益而保存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解决社会矛盾的斗争中，列宁特别重视革命阶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他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和世界各国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战争造成的破产和贫困带来的饥饿。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循环显然是一个矛盾。列宁认为这种矛盾只有靠上述循环的中断、群众情绪的转变、个别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而首创精神在这种转变中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

在社会矛盾的展开过程中，列宁还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然后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在历史事变发展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联，它们

之间的区别，都不象普通链条那样简单，那样笨拙。列宁在1918年3月至4月间具体分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时指出，国际方面的情况非常严重，必须随机应变和实行退却，这是等候西欧革命重新爆发的时期。在国内是缓慢建设的时期，是无产阶级严格的纪律性与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及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作长期的坚决斗争的时期，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中这一特殊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历史事变链条中必须马上用全力抓住的一个环节。

列宁还运用辩证法进一步阐明新生事物成长的规律。他是从社会主义这个伟大变革的高度来分析新生事物的。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由痛苦、灾难、饥荒、野蛮化的深渊转向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急剧转变的关头，旧事物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新事物又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这种从旧到新的过渡时代，就是革命的飞跃的时代。对于大飞跃时代，真正应当注意的地方，就在于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的数量还积累得更快些。革命者要善于针对不同情况积极扶持新生事物的成长。一般地说，有这样的历史时机，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关；也有另一种时机，即在破坏已经足够的时候，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此外还有一种时机，这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尽力帮助它们成长。

列宁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

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论断不仅有鲜明的针对性，而且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有重大的意义。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者，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迷恋资产阶级的民主，醉心于议会内的合法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种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非法斗争的形式绝对化，拒绝利用其他斗争形式，特别是利用议会斗争形式去教育和争取群众。对于前一种错误倾向，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著名的著作中，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尽管在当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但是列宁丝毫也没有忽视它对革命的危害，对它从理论上作了深刻的批判。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不仅从哲学上总结了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批判，而且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运用辩证法制定灵活的斗争策略而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复杂的、困难的、长期的，它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无数急剧的变化、转折和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革命运动的形式有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暴力的等等方面。可以说，俄国如此丰富地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斗争特色和斗争方法。因此，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就既要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又要准备最迅速和突然

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患“左”派幼稚病的人，认为在革命斗争中是绝对不能有任何妥协的。列宁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问题在于对各种不同的妥协作出具体的分析。他在《论妥协》一文中说过，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同资本家实行妥协或达成协议的。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在长期而又复杂的国内外革命斗争中，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是十分可笑的。列宁指出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

承认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就必须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真理既然是具体的，就应当反对不作具体分析的空谈。真理既然是具体的，就应当反对脱离一定的具体范围而任意夸大。列宁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必然会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走过了一小步，它便会变成谬误。

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理论错误中，揭露了他们用折中主义偷换辩证法，背离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根本原则。列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分析了他们产生错误的原因，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四项要求：第一，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

要努力实现全面性的要求。第二，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所概括的这些要求，对于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客观世界有普遍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大发展。

制定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纲领

1922年3月12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上发表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这是列宁逝世前写的最后一篇哲学著作，是列宁对共产党人在理论战线上，特别是在哲学战线上的任务提出的纲领性的意见。

列宁在这篇纲领性的哲学文献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战斗的唯物主义。他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统一的根本特征。

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在思想战线上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列宁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各种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扶持，分析了资产阶级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向唯物主义进攻的情况，分析了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学上以及社会各个领域内的表现。针对这种情况，列宁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必须战斗，提出了战斗唯物主义的纲领。

战斗的唯物主义必须要向资产阶级宣战，反对资产阶级的种种哲学偏见，揭露和追击一切现代“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不管他们是官方科学界的代表人物，还是以“民

主义左派或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政论家自命。

战斗的唯物主义必须是战斗的无神论，要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宗教迷信，自觉地批判宗教。

战斗的唯物主义必须正确地回答现代自然科学革命中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家，对资产阶级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偷运反动哲学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

战斗的唯物主义必须对社会学上以及社会各个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开展斗争。

战斗的唯物主义为了完成上述艰巨的任务，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要组织战斗的队伍；二是要掌握战斗的武器。

在组织战斗的队伍方面，列宁提出要结成两个联盟：一个是在哲学战线上共产党人和一切非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结成的联盟，其中包括在反对宗教的斗争中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结成的联盟，要善于利用十八世纪末叶无神论者的作品，向宗教蒙昧主义作斗争；另一个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 and 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的联盟，要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去武装现代自然科学家。列宁强调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因此，自然科学家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在掌握战斗的武器方面，列宁认为战斗的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用辩证法改造了的、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了更好地掌握革命辩证法，列宁认为要用很大的力量来系统地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要象马克思那样，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要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其他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总之，一切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武装起来，熟练地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战斗武器。

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占了统治地位，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巩固政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课题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因此，列宁所提出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纲领，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 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一种伟大的理想；而在列宁的年代，特别是在列宁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科学社会主义就开始从伟大的理想变为革命的实践了。诚然，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只生活

了不到七年的短暂时间；但是，无论在理论、路线、方针与政策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都作了深刻的研究与探索，积累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大发展。

运用发展论观察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问题。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十月革命前后写的一系列著作中，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个科学的发展论，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作了探索性的理论分析。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而来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旧的“痕迹”和“残余”。这些旧的“痕迹”和“残余”，主要是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权利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只有在这些旧的“痕迹”或“残余”完全消除，社会主义得到充分巩固以后，共产主义才能发展起来。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还仍然存在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仍然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是说：消灭阶级是社会

主义的目标，在社会主义时期，要为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第三，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生产者的联合体。它只有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具备了上述条件以后，保护资产阶级权利的国家才会消亡，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第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第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从完全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必然是一个经历许多过渡阶段的发展过程。不能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宁所作出的上述基本分析，正是他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依据。

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

阐明社会主义形式的多样性

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已经揭示的一条普遍的、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但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世界各国按照同一种模式同时实现。这样，社会主义在具体国家内的实现，就不能不具有特殊性。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而且是以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它的统一。在方式方法方面的多样性，可以保证生气勃勃地、胜利地达到共同一致的目标。方式愈多，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列宁正确地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即使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时，都必须考察和探索民族的特点和特征。

社会主义在每个国家的胜利，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发展过程的。由于各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

的条件不同，它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这种多样性愈是丰富，就能愈可靠愈迅速地促进社会主义的进程。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是由各国具体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列宁认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前，资本主义虽有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因此，俄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它必然同西欧各国不同，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虽然这些特殊性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通过各国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列宁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

阐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

无产阶级在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广大劳动群众，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代。列宁认为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政治的根

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

1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镇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直至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根据长久的经验和实际事例来向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证明，他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要比拥护资产阶级专政有利。

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特别是工农之间的联盟。这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了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列宁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①

无产阶级要保持政权比夺取政权更为困难。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

263

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不仅因为改组生产是一种困难的事情，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也只有经过长期的坚韧的斗争才能克服。

列宁认为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的新时代的内容。这一时代的口号应当是：消灭阶级。“马克思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理论上的论证。”^①为了正确了解“消灭阶级”的本意，列宁提出了阶级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②因此，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还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克服与小生产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重新教育和改造农民。

①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463—464页。

②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的唯一办法。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要十分重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又要充分发挥非党组织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以及广大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工会就是这样一个非党的、灵活的、比较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的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工农代表苏维埃是在革命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又一种机构,党的全部工作是通过这种不分职业、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来进行的。这些就象是一系列的齿轮,组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

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排斥领袖人物的独特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而且也是经过领袖人物来实现的。同时,实行集体领导也并不排斥个人负责的制度。任何夸大和歪曲集体领导因而造成办事拖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把集体领导机关变为空谈场所,都是列宁所坚决反对的。

列宁还主张在政治生活中既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就要使全体人民都能学习管理国家,直接参加管理国家的事务,保障广大劳动群众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要充分发挥和正确运用法律和法庭的力量,保障人民的

权利，惩罚犯罪行为，善于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创造一切必要条件，以便在将来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使无产阶级的国家自行消亡。

阐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可能立即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现实的社会里，必然有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分析当时俄国社会的经济成分有：（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名称只是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过渡时期的经济，既有资本主义成分，也有社会主义成分。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既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又要将一切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

从经济上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列宁认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了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可以说“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机关象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工作的那样进行

工作,那末也就谈不上实现什么社会主义了。”^①

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只有有了物质基础,有了技术,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作用,就是要领导这些小业主过渡到公共的、集体的、公社的劳动,这只有在有了强大的大工业,能给小生产者以实际利益,使他们看到大经济的优越性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个过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巩固、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有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能从技术上和其他方面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巨大的支援,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逐步过渡到大规模的、用机器耕作的农业上去。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的逐步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只有用示范的力量、用改进农业的力量去影响中农群众,才能逐步实现国家经济中的这个极重要的深刻转变。

在经济上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关系,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所谓正常的关系,应当是并且只能是这样:无产阶级从经济上满足农民的需要,供给他们生活资料,使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看到和感觉到同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4页。

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别。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的。而在农民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优势不能不影响到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和总的政策。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且统一起来。

列宁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特别注意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用，他认为抽象地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进步。既然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那末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和社会化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胜利的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经济中非社会主义成分的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终确立和巩固，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从根本上说来，

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度的发展。列宁说：“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①他强调指出：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以反对资本的英勇斗争精神，领导和组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阶级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地联合结合起来。显然，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更重要。归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才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被彻底战胜，在于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当然是长期艰难的事业，这个事业已经开始了。列宁认为蒸汽时代是资

^①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3页。

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显然，在无产
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实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会最终奠定共
产主义的基础，奠定没有剥削者、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
有商人的文明生活的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
在经济上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列
宁认为只有这个任务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决以后，才
会有社会主义。

组织竞赛在完成经济任务中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社会
主义才第一次开辟了真正大规模竞赛的途径。社会主义的
竞赛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另
一方面要求提出改革国家经济制度的最正确最经济的办法，
逐步向大经济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列宁说社会主义首先就是
统计，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和统计，这就是社会主义的
开端。实行计划经济，要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要求分别
轻重缓急，在执行计划中重点突出是必要的，但同时又要逐
步而坚决地从重点突出过渡到均衡。

列宁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还特别强调要正确地
组织商品交换，要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的
社会主义原则，这些都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重大
问题。

阐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

人类的文化是人类的经验 and 知识的结晶，是人类最宝

贵的财富，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当然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应当是人类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列宁坚决反对和批判对人类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想和错误态度。

列宁指出，如果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那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它对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对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只有确切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可见，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列宁特别对青年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而青年的学习、训练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的材料为出发点。如果不学会利用资产阶级文化所提供的技术、知识和机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把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科学技

术结合起来的任务，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又是我们必需的历史上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

社会主义事业的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要实事求是地提出管理问题，使专家和工人都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都能参加管理。只有掌握了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政权。要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应当借助于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重新教育他们。同时从本阶级队伍中选拔自己的管理人员。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实际训练等等，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无产者、为工农进行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对于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国家尤其重要。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担负训练群众和改造群众的工作。而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社会主义时期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列宁认为必须摒弃从超人类、超阶级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一切道德。我们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而服务的道德。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

争。道德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剥削制度服务的。因此，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时期，宣传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克服群众中的宗教迷信思想，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列宁指出，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一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教育来进行这一斗争。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反对宗教也应当同这种祸根作斗争。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工作，归根结底，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改造人，并且培养出共产主义的新人。列宁严肃地指出：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建设的。因此，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

阐明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 自己创立的伟大事业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只有人民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即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列宁深刻地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

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群众”这个概念，是随着斗争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和农民，是劳动者。正是劳动群众才应该是全部国家生活的主体。劳动群众是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根本和基础。

历史是由千百万人创造的。工人的解放应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得到解放；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宣传鼓动，学会完成新的历史任务。而新的历史任务愈艰巨，愈伟大，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当吸引千百万人自觉地来完成重大的历史任务。

列宁认为：人民是强大的，人民有力量打倒阻挡他们前进的那些人。在人类历史上，政党是会不断地更换和灭亡的，而劳动人民却仍然存在。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也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而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过去，全部人类的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创造，只是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切身需要的东西——

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和剥削手段。过去受尽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的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力量，能够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领导者的工作就是要为这种力量扫清道路。

只有信赖劳动群众的经验和才能，切实担负起这个任务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无产阶级国家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一开始就遵循了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原则，彻底地坚决地依靠群众，使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受摧残的阶层觉醒过来，走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创立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看来，只有当群众听从其指使时才算有力量；而我们的力量概念却不同，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摆脱了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力量，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也在这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应当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参加管理，进行建设。正是组织才是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要武器。没有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和巩固的。

因此，列宁坚定地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才是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发展的主体力量。列宁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其物质承担者,不是别人,正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总结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丰富经验,大胆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重要设想,阐明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根本问题,生动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列宁当之无愧地是伟大的开拓者。

四 斯大林的哲学思想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革命事业,在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中捍卫了马列主义,担当起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重任。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实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的统帅下,苏联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党和国家,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斯大林在一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指导革

命斗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反映在他的许多重要的著作、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著作中，诸如关于论述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等。这些著作，有些是旗帜鲜明地捍卫了列宁主义，有些是深入浅出地综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有些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从哲学上进行了概括和新的探索。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就成为列宁的革命事业的直接继承者。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运用哲学的武器，主要是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斯大林的哲学思想，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总结，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把新时期的哲学作为反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武器

斯大林遵循列宁的教导，高举列宁主义旗帜，注重实践，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把反对理论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实践比理论更重要，实践在发展，理论也应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斯大林正是根据列宁的思想，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一切科学资料都是由实

践，由经验来检验的。科学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它要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斯大林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要经常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会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斯大林无情地嘲笑教条主义者是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他们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句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只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的内容。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中，还尖锐地指出，教条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不放，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斯大林认为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指路明星。

斯大林遵循列宁的教导，高举列宁主义旗帜，把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

社会主义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事业。斯大林认为要完成这个事业，必须有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巨大的革命力量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要把处于分散状态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汇集成为伟大的革命力量，必须加强组织、教育和领导，把自发运

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因此，他强调干部决定一切。而干部又必须向群众学习，必须以群众的经验来充实自己，一分钟也不能削弱同群众的联系。只有实行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才能有正确的革命领导，才能发挥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他用古代希腊神话中英雄安泰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布尔什维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斯大林坚决反对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说，领导者可以上台下台，而人民还是人民。只有人民是永存的。其他一切都是暂时的。

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其成为群众手中的革命武器

斯大林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导，始终不渝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来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他极其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人民群众，使其成为广大革命群众手中锐利的武器。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简明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他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归结为四个基本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归结为三个基本特征。这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

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斯大林正是根据恩格斯的思想，首先把世界看作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处于不断运动、变化、更新和发展的状态；然后指出世界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最后指明发展的内在内容是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辩证法正是这样揭示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过程。同时，辩证法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要求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就是要把握事物的互相联系、运动变化、发展过程和内在矛盾，这样，就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斯大林着重指出：事物的内在矛盾具有新的、产生着的、发展着的与旧的、衰亡着的、颓化着的这样两个对立的方面，它们之间的斗争决定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从而揭示了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客观规律。同样，斯大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他在本体论上首先指明客观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然后在认识论上阐明了人的思维、意识来源于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意识是第二性的，思维是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最后他指明世界是可知的，人们经过实践和经验而不断认识世界及其规律。斯大林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阐明了在决定社会性质、面貌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进一步指出生产方式的三个特点，阐明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诸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社会

发展的根本规律。可以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明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也精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一致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在概述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提出了“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著名论断。他根据唯物辩证法强调指出，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斯大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际活动，不应以领袖人物的愿望为基础，而应以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不应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以社会发展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不应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因此，无产阶级政党首要的是认识与掌握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要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规律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出的这些重要结论，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从哲学上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斯大林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法。斯大林强调，事物的逻辑比任何其他逻辑都更为重要，事物都是按照其固

有的客观规律发展的，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世界上的事物，既根据个别的、特殊的规律互相区别，又根据共同的、基本的规律互相联系。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如果否认有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宣告可能‘创造’和‘改造’规律，其结果就会使人们陷身于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不承认客观的规律性，不研究这些规律性，就是否认和取消了科学。而取消了科学，也就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斯大林既反对人们把规律偶像化、甘当规律的奴隶，又反对人们不顾客观规律、为所欲为、任意冒险。他提出只有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客观经济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斯大林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就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正是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使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斯大林还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量变和质变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质变有两种形式的新见解。他认为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除了通常所说的“突然的爆发”的形式以外，还有一种是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这样的“逐渐过渡”的形式来实现的。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

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的。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绝不是必需的了。苏联用八年到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这是一个在乡村中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这个变革就不是经过爆发、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个变革是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倡导、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斯大林总结的这种“逐渐过渡”的革命形式，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至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阐明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有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即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以及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它会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就出现更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正

因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起作用，所以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阻碍者将发展到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然后从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又将发展到生产力的阻碍者，这种发展的特性充分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斯大林进一步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利用经济规律无论何时何地都有阶级背景，而且为社会的利益来利用经济规律的旗手，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先进阶级，而衰朽的阶级则加以反抗。无产阶级正是利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使新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斯大林作出的这一新贡献，是自觉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

斯大林还结合社会主义实践进一步概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每个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会或迟或早地随着发生变化或被消灭。如果基础改变了，社会也将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消极地反映基础；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会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

去根除、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对于社会生产,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们的生产活动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斯大林所阐明的上述理论,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

斯大林还对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基本状况作了分析。他指出这个社会的基础是公有制,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剥削,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没有民族压迫。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是友爱合作的关系。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社会里,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消失,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着,等等。

斯大林正是在上述总结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未来的发展又作了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共产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差别将会保存下来。他认为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前,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阶段,通过这些阶段,劳动将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从仅仅是维持生活的

手段变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则成为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斯大林还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一定会消亡，而社会却一定会留存下来。因此，作为全民财产的继承者的，已经不是将要消亡的国家，而是以中央经济领导机构为代表的社会本身。

关于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人类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继续积累经验，但是斯大林在列宁探索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探索，毕竟提出了许多新思想，给人们以新的启发，这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征途中是十分珍贵的。

复习思考题

1. 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是怎样研究国家与革命问题的？
2.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3. 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意义何在？
4. 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探索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5.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意义何在？

学习书目

- 列 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3卷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列宁选集》第3卷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见《列宁选集》第4卷

《论我国革命》，见《列宁选集》第4卷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第 六 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的传播和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在中国传播，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但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理论的武装，结果都失败了。直到1919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我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才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发生了新的转机。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运动

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显示出了辛亥革命还不曾有过的姿态，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它不仅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而且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划出了一个崭

新的阶段。五四运动到了后期，就逐渐由宣传民主与科学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伟大的思想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手。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由急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五四运动前夕，他已经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满怀信心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经过认真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参加国内政治斗争和勤奋不懈地学习，他比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以后，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与此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通过这些著述和讲学活动，他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文章。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详尽的阐述，并指出这些部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按即阶级斗争）论，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他反复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

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他尖锐地批判了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正确解释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主张人民群众赶快联合起来,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李大钊也是在中国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18年5月,他就发表了具有若干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论文:《青春》和《今》。他指出,宇宙是个大实在,这个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空间为无限,时间为无极,人的生命也永远奔流不息。他勉励青年抓住宝贵的现在,承担大任,创造青春的国家、青春的宇宙。

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之一的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不仅传播最早、最系统,更可贵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武器,去观察中国的命运,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国情、改造社会联系起来。从1919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写了很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认为中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彻底改造中国社会。而改造中国社会则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不应当也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只能经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920年3月,他在北京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团结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革命问题,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作了准备。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思想,李大钊的论述尽管还有不甚成熟、不甚妥当的地方,但是,他的基本观点是

正确的，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伟大的先河。

在五四运动中，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积极贡献的还有陈独秀。他在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的推动下，逐步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919年12月，陈独秀为《新青年》杂志撰写《本志宣言》，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这里说的军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金力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在此期间，陈独秀先后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劳动者的觉悟》等文章和讲演，通俗地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指出只有做工的人才是社会的台柱子。陈独秀比较明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从他的《谈政治》一文开始的，文章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由于他长期主编《新青年》和著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陈独秀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往往暴露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有时甚至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相提并论，这说明他在世界观上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说明他后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背叛革命都不是偶然的。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也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留学日本。在那里，他大量攻读并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翻译有《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向国内介绍。1920年，他回国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并主编了我党第一个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党的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李达出席大会并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建党前后，他发表了许多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文。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等文章中，他用通俗的语言分析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的根源，指明推翻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实行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遇到了各式各样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李达积极参加了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1920年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研究系”^①的首领张东荪、梁启超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借口所谓中国没有劳动阶级，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必须先由资产阶级发展实业，造就劳动阶级，再实行社会主义。李达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启超）等文章，予以反击。他批判了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明确肯定中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

在和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斗争中，李达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并利用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荒谬，并着重分析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它的世界观的基础是个人主义。

① 研究系，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团体。前身是袁世凯的“进步党”。袁死后，首领梁启超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归附北洋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来反对社会主义。

李达还积极参与了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他发表了《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分歧的焦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加以分析，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深刻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指出，劳动专政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而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劳动者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劳动阶级专政的目的在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的根基。李达还发表了许多文章，热情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

中国人民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进行了积极的宣传活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期间，就吸收了新的文化思想，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了由急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由于他早就有着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又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状况有所了解，与劳动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便能用它来分析、研究中国的革命问题和社会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萌芽思想，在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便显露出来。

1919年3月，毛泽东由北京回到长沙后，便开始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北京等地的反帝爱国活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成

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展开了学生运动。以后又团结各界人士，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领导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为了推动革命群众运动深入发展，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于1919年7月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以气壮山河的姿态，号召人民大众向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冲击。他认为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①

毛泽东总结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经验，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革命的动力，但人民群众要发挥作用，必须联合起来。在1919年7月，他发表了《民众大联合》的著名文章。文章宣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还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分析了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及可能性，他认为经过长期斗争，广大民众已经觉悟了，已经认识到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工农劳动群众大联合的胜利。我们也应该进行仿效，刻不容缓地实行民众大联合，向反动统治者斗争。毛泽东还指出了民众联合的具体办法，在工农各界组织小联合的基础上组成大联合。他充满信心地为民众大联合指出胜利的前景，认定中国革

^①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命必胜，“黄金的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由于《湘江评论》鲜明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引起了反动政府的仇视和恐惧，仅仅出了四期就遭到查封。以后，毛泽东又接替主编《新湖南》周刊，并利用湖南《大公报》的阵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反动势力和旧礼教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毛泽东在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第二次到了北京，又进一步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对他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回忆这一段斗争生活时说过：“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①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从此，他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经过上海回到长沙后，立即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研究会，引导进步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同时，他也加强了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这一时期，他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主张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认为应当组织列宁式的党，由党来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斗争，实行俄国式的革命。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展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开了激烈的争论。蔡和森坚决主张中国应当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进行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还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即唯物史观，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错误。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表示赞同他的观点，并强调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的重要，认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根据。”^①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展开了斗争。1920年10月，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到长沙演说，鼓吹用教育方法改造社会，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毛泽东给留法的会员写信时，对罗素散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指出罗素企图用教育的方法来使资产阶级觉悟，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掌握了国家机器，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同时，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思潮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绝对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只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还积极参加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的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8页。

贡献。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以前，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周恩来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阅读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6月，他回到了天津，立即投身到五四运动中去。他积极参加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在中国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同年9月，他和邓颖超等发起成立了革命团体《觉悟社》，这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社团之一。1920年1月，周恩来在率领数千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请愿示威斗争时，不幸被反动军阀逮捕。他在狱中英勇不屈，领导难友与反动势力斗争。同时，他把监狱当讲坛，热情向难友宣传马克思主义。据《检厅日录》记载，周恩来多次在晚间开会讲演，讲马克思传、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阶级竞争史和剩余价值理论。这说明周恩来不仅相信马列主义，而且敢于在敌人监狱中系统地进行宣传，表现出他已经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和为真理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1920年11月，为了继续学习革命理论并了解各国工人运动状况，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仔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等，树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信念，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法国，周恩来还主持出版了《少年》刊物(后改名《赤光》)，经常为它写

文章。在《少年》第2号上,他以伍豪笔名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文章运用唯物史观,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他主张“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更绝对不能容许拥护这个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①周恩来还经常到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及勤工俭学学生集中的地方发表讲演,批判形形色色反动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

此外,瞿秋白、蔡和森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开展得蓬蓬勃勃,有声有色。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全国各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报刊,达二百多种。1920年,《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中译本在中国出版了。列宁的著作也开始在中国问世了。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

^① 《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322、324页。

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发展革命运动，准备了思想的和干部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

同任何新生事物成长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形形色色敌对思潮的阻挠和反对。于是，产生了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第一次论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挑起的。他在1919年7月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胡适以反动的实用主义为武器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他认为主义不过是人们主观设想出来的抽象名词，以“少谈些主义”为借口，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他散布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谬论，以“多研究些问题”为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他故意避开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鼓吹孤立地研究什么人力车夫的生活、大总统的权限、卖淫问题等等。他公然宣称，谈根本解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为了反击胡适的进攻，李大钊于同年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驳斥了胡适把主义与问题割裂开来，用研究枝节问题来代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谬论。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靠多数人的努力，而要动员多数人，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否则就没有共同的立场，共同的世界观，当然也就不

会有共同一致的行动。所以他认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相互为用、并行不悖的。当然，空谈主义是不好的，应当与实际相结合。根本不谈主义更是错误的，只会就事论事，舍本求末，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他认为理想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有力地揭穿了胡适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幌子，实际上推行主观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李大钊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驳斥了胡适主张社会问题一点一滴解决的改良主义谬论。他指出，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在这些构造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为基础。经济制度一有变动，它们都将跟着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制度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制度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又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否则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李大钊给中国人民指出了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斗争，它关系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还是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问题。通过论战，驳倒了胡适的谬论，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与假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由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12月，张东荪发表了《现在和将来》，1921年2月梁启超发表了《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集中地宣扬了他们的观点。《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在这次论战中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主要阵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发表了许多文章，比较重要的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等，李大钊、毛泽东都参加了批判。

关于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张东荪、梁启超断言，中国与欧美的国情不同，实业不发达，劳动阶级也不存在，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李达等驳斥了这种谰言，指出中国工业发达程度虽不如欧美和日本，但中国的劳动阶级所受的悲惨痛苦，却比欧美和日本的劳动阶级更甚，只是还没有组织罢了。中国现实的社会状况，虽与欧美略有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却是一样的。张东荪、梁启超还鼓吹，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造就劳动阶级，然后再实现社会主义。李达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了开发实业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即资本主义的方法和社会社会主义的方法。资本主义的方法，只能给人民造成灾难，社会主义的方法，才能使人民得到利益。既然中国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市场，是他们经济掠夺的焦点，在中国利用资本家造就劳动阶级，那只能是帮助资

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取消社会主义。

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梁启超伪装成关心社会主义的样子，提出要“矫正”资本主义，一方面使资本家“觉悟”，不要“掠夺太过”，一方面劝说劳动者不要反对资本家，使劳资协调等等。李达等揭露了这种论调，指出这是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是帮助资产阶级来欺骗工人阶级。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除此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

在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发表的许多文章，不仅痛击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假社会主义的谬论，打破了他们所散布的种种幻想，而且直接宣传了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赢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思潮早在清朝末年就传到了中国，在冲击封建专制统治方面起过某些作用。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以后，它的反动本质就日益暴露出来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空想，它集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1920年起，《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先后发表了陈独秀、李达等人的文章，如《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和论战首先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把阶级斗争必然产生的国家，当作人类互相仇视、侵略、杀害的根源。他

们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国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工农武装，就是压制个人的自由，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法律是“抹杀个人”、“独裁专制”。他们主张建立无政府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针对这种否定一切国家的观点，指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种根本对立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因而这种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是劳动人民痛恨的，必须彻底推翻。而无产阶级的国家则是劳动人民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保卫人民利益的工具，人民群众是欢迎的。对这样的国家及其政治、法律制度应当保护。他们还尖锐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宣布不要国家、不要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者，实质上是有产阶级的好朋友和恩人，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这种批判和论战还集中在所谓“绝对自由”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是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他们极端夸大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他们不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法律，而且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民主集中制，要求个人的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曾赤裸裸地承认：“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这种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绝对自由的论调，对于小资产阶级众多的中国青年影响较大。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在人类社会里，自由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一个人如果追求绝对自由，只有离开人类社会，去过完全孤寂的生活，而在那种情况下

也就没有自由可以选择了，甚至根本无法生活下去，因而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现实社会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的国家里，只有剥削阶级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的自由。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才有自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也要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纪律。所谓绝对自由，那只不过是极端个人主义所要求的一种空想罢了。

总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种思潮，既违背了世界革命的实际，也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它们在理论上又都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基础的，在历史观上是彻底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同这些思潮的论战和斗争中，不仅为自己的传播和发展扫清了障碍，而且为先进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如何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考察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命运，解决自己的问题，改造黑暗的旧中国，还是一个有待解决而尚未解决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等，为了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经历了长期的痛苦的摸索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摸索过程呢？因为这里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农民，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的残余，这里的情况是欧洲各国所没有的一种特殊情况，也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遇到过或解决过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既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找到现成的经验。它只能依靠本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地、创造性地去解决。这当然是一桩极其困难的事业，而要完成这一事业，就既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要系统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并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在我们党创建的初期，无论是当时还比较幼稚、经验不多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和王明，都不可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他们用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已经在历史的考验下宣告破产了。历史的曲折和革命的失败有力地说明，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才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在于他能在艰难、复杂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一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和研究本国特殊的国情上面，集中在寻找本国革命发展的道路上面，集中在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正确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面，集中在反对那种不从中国实际

出发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上面。毛泽东这种踏踏实实而又充满创造精神的富有成果的工作，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任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正是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被动为主动的历史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踏踏实实地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国情

中国革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如何？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错综复杂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是中国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了解和研究的问题，也是在中国进行革命的出发点和根据。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路的教条主义，就是离开中国的国情，依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主观主义地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深深感到正确了解和熟悉中国国情的重大意义，他全身心地投入社会调查，认真了解和研究各种基本情况，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着重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分析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分析各种阶级关系，为分辨敌友、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供了前提。

一个革命党要带领群众前进，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自己的敌友观念建立在科学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过去中国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基本原因是不善于分辨

真正的敌友，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为了给革命找到一条通向胜利之途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于1926年3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这篇为中国民主革命分辨敌友、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奠定思想基础的文献中，处处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之所以反对革命，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因而和中国人民革命的目的水火不能相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以表现出既赞成革命，又怀疑革命的矛盾的状态，是由于他们代表了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受外资的打击、军阀的压迫，另一方面又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剥削同被剥削的利害冲突。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所以最富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由于他们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在大机器生产中从事集中的有纪律的劳动，加上经济地位低下，失去了生产资料，又受到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压榨，所以特别能战斗。可见，任何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和表现，都是由它所赖以生存的客观经济条件和物质利益决定的。只有这样观察问题，才能找到分辨革命敌友的客观标准。

毛泽东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观察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不仅注意了同一阶级的共同性，而且结合中国社会经

济的特点,具体分析了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差别性,贯彻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把他们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是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的特点,无产阶级既要吸收他们参加革命,又要提防他们扰乱自己的阵线。中国由于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而拥有汪洋大海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人数上、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有余钱剩米,其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颇接近,对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革命取怀疑态度。第二部分在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但必须精心经营、苦力支撑,方能维持生活,他们虽不敢贸然参加革命,对革命往往取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他们每况愈下,越过越穷,瞻念前途,不寒而栗,精神上感受到极大的痛苦,这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左翼,是赞成革命的。对于各阶级、各阶层进行这样深入具体的分析,就为无产阶级实现正确的阶级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经济地位固然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态度的基础,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经济因素之外,革命形势本身的发展变化也会影响一个阶级的政治态度。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动摇不定的中间阶级身上。比如民族资产阶级,当革命尚未起来时,他们希望借助革命的发动来改善一下自己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的处境;而一当革命发动起来,工农群众不但勇猛参加,而且决心打碎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时候,他们又被革命的急风暴雨吓得惊慌失措、魂不附体

了，于是便由怀疑革命进而反对革命了。小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在平时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运动，虽然取中立态度。但一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使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革命浪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由此可见，一个阶级的政治态度，是在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又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动而发生变化的。看不到经济地位是决定政治态度的基础，就会离开唯物论；如果把这一因素绝对化，当作唯一因素，则又会陷入机械论。

毛泽东正是在上述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中的敌友我问题作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他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当我们党处于幼年摸索时期，毛泽东这一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精辟分析，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同盟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帮助党确定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而且在踏踏实实地了解和研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究中国的国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事业上，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第二，对中国革命举足轻重，而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作了实地考察和研究，不仅批驳了党内忘记农民的种种“左”右倾错误论调，而且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农业国中要想得到胜利，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考察法国和德国革命时所得出的结论。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又进一步针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特点，明确指出这里的主要群众是农民。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把农民问题看作革命成败的关键。他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①

认识农民问题和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经历了严重斗争，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在国民党的反动潮流面前妥协、退让、迁就，不敢支持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抛弃了农民这个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从而使工人阶级和党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看不到农民革命的伟大作用，同样抛弃了农民这支巨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大的力量,使工人阶级脱离了本国最广大的群众。“左”倾或右倾错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革命事业的失败,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去认真地研究本国的国情,寻找革命的力量究竟在哪里?

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深入农村实地考察而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一篇从中国国情出发,阐述农民运动,解决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的重要著作。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革命形势的高涨,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几万万农民,正在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大革命。“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①因此,在这场革命洪流里,一切敌人都将被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葬入坟墓。这正是国民革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不仅充分肯定了这场革命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批驳了反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好得很”和“革命先锋”的高度评价,把对待农民运动的不同态度作为区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而且对农民进行了科学的阶级分析,具体分析了富农、中农和贫农不同的政治态度,提出贫农人数最多,斗争最坚决,革命性最强,“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②因此,没有贫农阶级,就不能造成乡村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的革命状态，就不能完成民主革命。这就把农村中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提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

农民革命之所以是完成民主革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由农民的革命实践决定的。毛泽东通过实地调查，具体地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这些大事包括从政治上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击封建势力，解除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封建统治；经济上打击地主的剥削，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组织合作社；文化上普及政治宣传，兴办农民学校，改革社会风尚，破除宗教迷信等等。这一切，不仅使农村的面貌一新，而且生动地体现了农村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方向，有力地论证了革命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巨大作用。

第三，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为深入地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坚定对中国革命的信心，批判党内的悲观思想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面对着大革命的暂时失败，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革命高潮能不能迅速到来？党内一部分同志对此丧失信心，悲观失望，认为革命高潮的来到非常遥远，从事艰苦的建立政权的工作也为时过早，纯属徒劳。毛泽东认为这种思想之所以错误，是由于对中国的国情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①没有从中看出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时，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它只看到事情

^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

的现象，而没有看到实质。“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①

怎样才能认识事情的实质？怎样判断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毛泽东认为这要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存在，是否发展而定。正当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党内思想急待统一的时刻，毛泽东以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透辟而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

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6页。

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①上述分析，深刻地揭露了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反动统治者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把中国社会的工农商学兵各界的特殊矛盾逐个地作了具体分析，描绘了一幅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图景。可以说，不掌握这幅图景，不了解其中的各种矛盾，就不可能正确地估量革命形势，也就不可能对革命有正确的认识和做出正确的行动。

从实践中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革命还有没有成功的希望？什么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当时，陈独

^①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98页。

秀等人悲观失望,主张取消革命。“左”倾盲动主义者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鼓吹党应当继续采取进攻策略,主张在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走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左”右倾错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8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随后,他又认真总结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著作,分析了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了由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斗争而得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首先,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具体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一方面,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而进入起义。只有拿起枪杆子,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反革命势力在中心城市拥有巩固的阵地,而广大农村则是他们

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只能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变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伟大的革命根据地，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在一个国家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但是，这种奇事出现在中国，是有其独特的原因的。其一，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宰割的对象，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它扶植的军阀势力来实行的。因此，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就表现为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这就给了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发生和发展以可乘之隙。这种情况也是和中国广泛存在着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存在着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分不开的。其二，红色政权的存在是同北伐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分不开的。红色政权总是发生在那些民主革命具有广泛影响的地方，而红军也往往是从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其三，红色政权的存在有赖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全国的革命形势，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分析的那样，由于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着。因此小块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发展，以至逐步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其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那就只能对付地主武装挨户团，而不

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从而也就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谈不上长期坚持。因此，离开了人民的武装，就不会有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其五，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在政策上不犯错误。党组织的建设，这是红色政权存亡的关键。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色政权的理论，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矛盾中提出的，是总结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果。同时又从这一政权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力量上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从而阐明了红色政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战胜的前途。中国革命正是依靠着这种红色政权，给反动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动摇着它的基础，促使着它内部瓦解；同时又给全国革命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和希望；并且在实践上积累了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促进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标志着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已经开始形成。这就是，在农村首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一般原理，又形成了一条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的革命道路。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独立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曾盛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当时的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一些“左”的方针和我们党内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同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格格不入。他们不调查、不研究，主观主义地从书本出发，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丢掉了农民这个主要群众，企图超越革命历史阶段，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他们坚持“城市中心论”，主张举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全国的胜利，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深深感到，如果不在实际斗争中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特点有正确的认识，更不可能确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革命就有失败的危险。为了帮助中国革命摆脱危险的处境，毛泽东在党内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严重时刻，于1930年以大无畏的精神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的论文。论文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唯心主义先验论，阐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深刻地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同实际斗争中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的机会主

义盲动主义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精辟地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这是一篇在中国革命危难时刻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巨大历史作用的光辉篇章。

第一，这篇论文把坚持调查研究作为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要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必须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作一番调查，否则就只能瞎说一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只有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才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些思想，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反对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对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哲学概括。

第二，这篇论文把反对本本主义的斗争提到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高度。中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本本主义，不论是迷信书本、迷信“先哲”，还是盲目执行上级指示，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种思想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也就是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和工作。从哲学上说，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表现。而唯心主义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其结果必然要在政治上犯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错误。因此，必须洗刷实际工作中的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反对

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的口号，击中了当时党内教条主义统治的要害，抓住了他们错误倾向的根本，对于进一步清算“左”倾错误，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这篇论文还从实际斗争中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反对本本主义并不是不要本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这种学习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共产党员，已经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这种沉痛的教训说明，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和实际情况相结合，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一定要反对。为此，在实际斗争中要端正全党的学风，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从群众斗争和实际经验中制定我们的斗争策略。

第四，论文明确提出进行革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必须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当然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最了解中国情况，最熟悉中国革命的还是本国的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这是任何外国的力量，包括当时的共产国际所代替不了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就是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得出的结论。既然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去了解情况，靠自己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那就要

反对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线，反对那种饱食终日，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的精神状态，换上共产党人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进步的斗争思想。这就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如上所述，我们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这些哲学思想，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神和战斗精神。他所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结合、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和自己的力量来进行革命的思想，正是“左”倾错误根本丢弃的思想作风；他要洗刷的唯心精神，正是针对当时党内教条主义统治、唯心主义横行的情况提出的；他所倡导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正是那种形而上学的保守路线的对立面；等等。随着上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党内的普及和深入，为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战胜教条主义创造条件，于是在历史上相继出现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实践论》、《矛盾论》这样伟大的哲学著作的发表。

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经验的哲学概括

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但斗争还是十分艰难的，斗争还有待深入。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统治，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他们照搬苏联和欧洲革命的模式，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以马克思主义和最革命的词句为外衣，以势压人，指挥一切。要彻底战胜这样一个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特别是要彻底肃清它的影响，绝不是短期内靠几个回

合的斗争就可以解决的。它既需要有革命的胆略，敢于顶住一切压力，破除一切迷信，进行坚忍不拔的斗争，又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善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错误的表现，揭露错误的实质，找出错误的根源，依靠理论和真理的威力来战胜错误。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这样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甚至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以后，毛泽东仍然清醒地看到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如果不从哲学上分析和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不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来代替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影响就不会彻底肃清，而受它迷惑的一些同志就不会从教条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全党就不可能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开始的时候，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这两篇哲学著作，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总结了党内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揭露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武装了全党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发挥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为同一目的而写的。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它们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深化的整体。但是，它们在具体内容上又

各有侧重。

《实践论》针对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看轻实践的要害，全面而深刻地阐发了实践观点，分析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任何其他认识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实践论》详尽地阐明了认识是怎样从实践中产生，又是怎样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的。社会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而且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毛泽东对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概括，进一步丰富了列宁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的著名论断，科学地论证了认识和实践相统一、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基本原理，有力地批驳了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企图使认识离开实践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

《实践论》还进一步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主观主义者割裂认识和实践，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而辩证唯物主义则认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两者存在着质的区别，但又不是彼此独立、互相隔绝的，而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首先接触到的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形成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并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要完全地反映事物

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必须对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方能形成理性认识。但是理性认识也离不开感性认识,没有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的感性材料,理性认识便失去了可靠的基础,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把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认识运动发展到理性认识并未完结,还只是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还只是说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理论的重要性,正如列宁说过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把认识的发展过程,归结为两个能动的飞跃。“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一思想不仅有力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而且丰富了认识辩证过程的理论。



主观主义者割裂认识和实践的又一个表现是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条主义者把自己装扮成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封“天下第一”,把主观上的想当然当作真理,用它来制定政策,指导工作。在他们那里,理论是不需要到实践中去检验的。针对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

的错误，毛泽东明确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①一方面是为了指导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为了检验它的正确性。要证明我们从实践中得到的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符合于外界客观规律，必须把它应用到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去检验，否则，人们便无法知道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只有经过多次检验和反复补充、修正，人们才能得到大体上符合于外界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这时，人们对于一个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才算完成了。由此可见，主观主义者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歪曲了人类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辩证过程。

★ 《实践论》全面论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主观主义者割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还表现在他们割裂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他们不懂得，人们认识客观真理的过程，绝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永不停息地向前推进和向前发展的。由于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着的，因此，人们所获得的对于客观世界某一具体过程的认识，即使受到了实践的检验，也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才是绝对真理。因此，人们如果要使自己的认识经常保持客观的真理性，就不能使自己的认识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当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发生了新的推移转变，自己的认识也必须跟着推移转变，使之符合于新的客观过程的规律。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从认识论上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割裂实践和认识的种种表现后，精辟地提出了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一切“左”倾或右倾错误都是从根本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背离了这条唯一正确的认识路线。它们既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也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它们到处碰壁绝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着重揭露了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那么，在《矛盾论》中则集中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特别是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者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要求全党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为了帮助全党划清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两种宇宙观的界限，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所谓形而上学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宇宙观由于否认了事物因内部矛盾而引起的发展变化，否认了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动力，因而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转变为他种质的现象。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则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上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它认为事物内部固有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唯物辩证法并不否认外部条件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事物内部自身的规律性而起作用的。唯物辩证法的这种见解，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找到了解释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出现的“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转化”、“旧东西的灭亡和新东西的产生”等现象的钥匙，因而能够科学地说明世界上的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以及它们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矛盾论》着重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教条主义的致命弱点是不愿意也不善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对于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概括地指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究。这就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中的矛盾，也带有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

各方面的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以上几个方面说明，既要从矛盾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中去研究，又要从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研究。这都要求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也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为什么说了解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有着重大意义呢？首先因为共性与个性、相对与绝对的问题贯串于全部矛盾学说之中，是理解整个矛盾学说的关键。例如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的问题，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实质上都是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的。因此，掌握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理解全部矛盾学说，也就懂得了辩证法。其次，掌握了这个矛盾问题的精髓，可以有助于贯彻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建立一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例如建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反对机械照搬外国经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建立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再次，了解矛盾问题的精髓，可以有助于掌握正确的认识运动，克服教条主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赖

关系,除了表现于客观的事物当中,还反映到人们的认识运动中来。人们的认识运动,总是包括这样两个具体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再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如此循环往复地进行,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们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们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恰恰在于:他们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又不懂得在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新冒出来的具体事物,继续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为了深入地了解事物的内部矛盾是如何具体地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毛泽东还进一步研究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研究了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道理。原来,任何矛盾着的对立面,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具备着两重属性:一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二者之间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又互相否定、互相排斥,二者之间有斗争性。矛盾诸方面在互相渗透、互相依存时,每一方都处于特定的地位,具有特殊的规定性,所以,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反之,矛盾诸方面不管每一方处于何种特定地位,具有何种特殊的规定性,它们之间的斗争则是永不停息的,所以,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使事物保持着自身的和谐、平衡和质的稳定,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则破坏事物的和谐、平衡和质的稳定,并使事物走向自身的反面。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就是由这种相对的平衡和绝对的运动实现的。所以,毛泽东认为有条件的相对的

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因此，在把握对立统一规律时，只看到矛盾诸方面的同一、一致、互相依存、互相渗透是错误的，反过来，片面强调斗争，只看到矛盾诸方面的互相否定、互相排斥，同样也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上深刻地概括和总结了党内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且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夺取 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 中多方面展开和成熟

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全国奋起抗日的情况下，中国革命面临着一个十分广阔、十分复杂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科学地分析了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制定了适应这种变化的新的策略任务，而且在民主革命的全部进程中，成功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多方面的实际斗争中去，在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分析矛盾，认清形势，确定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亚洲。1931年9月18日，它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了中国的东北，然后又向中国内部扩张，占领上海、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如何正确地分析国内形势，决定党的政策，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就成了新形势下党面临的迫切的任务。

这个迫切的任务，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的，因为当时党的领导陷入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不仅没有在人民抗日反蒋的有利形势下将革命推向前进，反而使革命受到了新的挫折；这个迫切任务，也是1935年处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所不能完成的，因为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解决党的政策和政治策略的任务，只有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在中国革命转入较为安定的情况以后，毛泽东才有可能在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完整的分析和系统的说明。

毛泽东的分析和说明，最集中地反映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这篇报告和毛泽东的其他有关报告，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武器，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分析了阶级关系和各种矛盾的新变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态

度是不同的，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面临着亡国、失业或破产的威胁，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他们早就打定了卖国投降的主意。复杂的问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于如何看待他们中的大部分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于如何看待国民党营垒会不会发生分裂。毛泽东同那种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变化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有可能参加抗日斗争，而另一部分也可能由动摇而中立，同时“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①对于导致这种破裂的缺口、矛盾，我们都应当“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扩大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则减弱了。因此，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在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各种矛盾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2页。

② 同上书，第134页。

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①

可见，毛泽东为全党规定的政策和任务，是在科学地分析各种阶级关系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②毛泽东的领导之所以是正确的，就在于他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反对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长期存在着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使党和红军遭到严重的挫折。关门主义用以观察形势、指导革命、制定政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恰恰是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他们既看不到革命高潮的到来，又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看不到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不懂得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地改变策略。他们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他们只相信自己，只依靠单枪匹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把统一战线斥为机会主义的策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页。

②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

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①

只有批判关门主义，才能扩大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争取一切中间势力。而为了从组织上和政策上真正体现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就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我们的政府不仅代表工农，而且代表全民族，“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②人民共和国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民族资本家和民族工商业是保护的。这一切既规定了党在现阶段的政策，又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人民战争

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开始，毛泽东就特别致力于研究军事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反围剿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1页。

^② 同上书，第145页。

的经验，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随后，他为了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又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的军事著作。在中国革命转入解放战争以后，毛泽东又根据战争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总结了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等军事著作和文章，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的这些军事著作，把辩证唯物论运用于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揭示了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不仅指导战争赢得了胜利，而且给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宝库增添了珍品。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夺取胜利的科学武器，它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批判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和唯心论，坚持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观察战争。

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和唯心论，曾经使中国革命战争招致了极大的失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种观点集中表现为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或苏联内战的军事条例或条令，固守老一套的战法，拒绝了解任何特殊的情况，不承认中国革命战争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痛斥了这种观点，指出一切战争的指导规律都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到了抗日战争

时期，这种观点又表现为观察战争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不是客观地全面地从决定战争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出发来把握战争的运动规律，而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个侧面、一个时候的表现妄下判断，或者是完全抛开交战双方所固有的各种特点，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这样来观察战争，势必把问题弄错。要么得出“亡国论”的结论，在政治上产生妥协倾向；要么得出“速胜论”的结论，在政治上产生轻敌倾向。听任这些错误论调泛滥下去，只会将抗日战争引向失败之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①

在考察战争时坚持客观性和全面性，必须从“自在之物”本身出发去揭示战争的本质，紧紧地把握住战争的阶级性和它的时代特点。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②这就是说，这个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之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它所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则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战争又发生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4—415页。

② 同上书，第415页。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方面，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正处在大崩溃的前夜；另一方面，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①日本虽是帝国主义强国，但由于内外矛盾的尖锐化，它已处于没落阶段，它的疯狂侵略，只是垂死的挣扎。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非常腐败，但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有了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中国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中国的进步，既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别的时期，又决非阿比西尼亚之所比。抓住了中日战争的阶级性和时代特点，就找到了抗日战争之所以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之所以必属中国的总根据。“亡国论”与“速胜论”离开了这个总根据，就必然把问题看错。

为了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还必须进一步具体地分析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因素，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经过这样的分析，不仅找到了敌我双方在军力和经济力方面的对比，而且找到了由战争性质所决定的敌我双方在人力和人心方面的对比。战争就是这些因素的竞赛，胜负之数就决定于这些因素的彼此制约及消长变化的总和。从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因素中可以看出，敌人的长处只有一个，短处却有三个；中国的长处则有三个，短处只有一个。敌人虽强，但已为或将为其他不利因素所减杀；中国虽弱，但已为或将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0页。

为其他有利因素所补充。“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①“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在于：“亡国论”者夸大敌强我弱的矛盾，而无视其他矛盾，结果是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则夸大了其他几个矛盾，而无视敌强我弱的矛盾，结果是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局部而没有看到全体，因此就离开了真理、坠入了谬误的深坑。

为了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在分析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因素时，不仅要看到各因素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且还要看到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只有这样，才不致被一时的片面现象所迷惑。毛泽东指出，只要中国“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②这是因为，日本方面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变化趋势是逐步向下的，它的许多不利因素，如军民厌战、兵源枯竭、经济困难、国际孤立等，必定会因战争的持久而扩大。反之，由于中国进行的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0-421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9页。

是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所以，其变化趋势是逐步向上的，战争愈是持久，愈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抗日武装组织起来，经济亦能发展，国际援助也将增加。根据中日双方在战争过程中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二）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三）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虽然不能预断，但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法改变的。只要坚持持久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就一定逃脱不了自取灭亡的下场，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战争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在明确地指出了抗日战争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之后，又要求人们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去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说：“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做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①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客观条件，然而，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还没有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就要既反对机械论，又反对唯心论，做到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机械论者把规律当作偶像，把人当作奴隶，以为尊重客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观规律就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提倡无所作为。毛泽东批判了这种论调。他强调指出，反对主观主义，并不是要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能动性。他写道：“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坐着不动，束手等待，只有被消灭，既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毛泽东还指出，人类的自觉的能动性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在一定条件下，它是使战争局势改观、使战争胜负由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事物的决定因素。战争的经验证明，交战双方都在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努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可以化劣势为优势，也可以化主动为被动。由此可见，“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①

当然，在强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必须反对离开客观规律和客观物质条件去任意夸大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②这样，就把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放在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基础上了。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带有更大的流动性和“盖然性”。但是，战争不是神物，它有朕兆可测，有端倪可察，有规律可寻。聪明的指挥员必须极大地发挥自己的主观努力，以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从中找出原理、光明和确实性来，以形成自己的作战方案。这样，才能夺得战争的主动权，取得行动的自由。毛泽东还认为，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在于使自己的作战方案建筑在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之上，而且在于当应用这一作战方案于作战行动时，还必须审时度势，依据具体条件来灵活运用。为了使灵活不致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实际情况是至关重要的。指挥员养成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并非易事，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才可以获得。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455页。

② 同上书，第445页。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又是一致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①

第三，学会驾驭战争大海的游泳术，掌握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毛泽东所阐明的战略战术的理论，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独创的贡献，也是他的军事辩证法中极为精采的部分。毛泽东把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比做驾驭战争大海的游泳术。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能够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就必须掌握这一科学的游泳术。

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从哪里来的？它决不是任何天才统帅脱离实际情况的主观想象物，而是由战争双方的特点决定的，是对战争实际情况的反映。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特点，规定着双方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的指挥员不能离开中日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在讲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在辅助正规战争时，在一般情况下本来只有战术问题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而没有战略问题。但是，由于中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又由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国家正处于进步时代，这样就发生了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造成了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从而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①这种把战略战术理论看作是客观地考察战争情况的产物，同战争指导问题上的唯心论划清了界限。

正确的战略战术既然是从科学地考察战争情况中产生的，而战争情况又是千变万化，交战双方又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指挥作战、部署行动，就决不能抱住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而必须随机应变、扬长避短，采取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原则，以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具体条件，根据敌我双方的不同特点，提出在战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我应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的、被动的地位，蒙受着许多不利，但是，我在战役战斗上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为我军在战役或战斗上的进攻，将敌军

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4页。

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行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这就是相反相成的辩证道理，就是战略与战术、内线与外线、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之间的具体的对立统一。只有实行这样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国才能坚持以劣抵优、以弱制强，随时随地争得主动，最后把胜利夺到自己手里。

为了充分地发挥自己之所长，攻击敌人之所短，实现以劣抵优、以弱制强的目标，不仅要正确处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关系，而且要采取适合敌我双方特点和战争发展规律的作战形式，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灵活地运用。毛泽东提出，在战争第一阶段，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在第二阶段，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而辅之以运动战和阵地战；到第三阶段，主要的战争形式仍然是运动战，但阵地战提到重要地位，游击战则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起着战略配合作用。但不管采取哪种作战形式，都应该力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每战都要充分准备，精确地计算敌我力量对比，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消灭敌人。这样，才能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逐步地积小胜为大胜，随着战争的推移，经过不断的量变的积累，达到敌我双方战略地位的根本改变，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

第四，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的武装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军事理论上的创造性贡献，不仅在于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观察战争，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还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注意在战争中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问题。他认为，在白色恐怖的重重包围和严密封锁下，党领导的红军之所以能够屹立不摇、岿然不动，而且还能够一天天发展、一天天壮大，主要是由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在他看来，真正的铜墙铁壁并不是坚固的城池，也不是林立的碉堡，而是广大的群众，是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只要使军队真正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里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反动派畏惧民众，害怕民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抵抗的心理，也针对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只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身上的右倾情绪，进一步鲜明地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争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做好政治上动员军民这件“头等大事”。不仅要联系士兵和群众的生活实际，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在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争取自己的解放、谋求自己的生

存权利而战，而且要在战争中实行正确的政策，如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精兵简政等，千方百计地减轻群众的负担，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起广大军民进行战争和支援战争的政治热忱，才能造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任何胆敢向人民进攻的反动派陷于灭顶之灾。

实行人民战争，必须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人民的军队，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为了建设这样一支军队，毛泽东在红军的初创时期，就特别重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军，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广大指战员，及时肃清一切旧式军队以及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影响。为了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他规定了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原则，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在军队中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总结和制定出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为了使军队保持工农子弟兵的本色，永远同人民打成一片，他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强调军队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允许侵犯群众的利益。军队的任务不仅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作为执行打仗任务的战斗队以外，同时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为了发挥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在军队中提倡和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切实保证官兵团结，上下一致，等等。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建设提出的这一套独创性的指导思想，成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的崭新篇章。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

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人民正确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毛泽东所阐述的军事辩证法，是经过战争实践考验的科学真理，也是指导人民军队继续夺取战争胜利的强大武器。

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建设党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向全党提出的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

当时，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依靠着过去的革命经验，依靠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依靠着广大人民对党的政治信仰，依靠着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更加深入更加统一的理解，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但是，“左”右倾错误统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歪风还严重地侵蚀着党的机体，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影响着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同时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或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这就使得

党的许多工作带着盲目性。这一切也说明党的建设首先要加强思想建设，从思想上来一次彻底的整顿，使党内的思想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在全党开展一次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这就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所进行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本质上也是哲学战线上的一场斗争，是同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毛泽东不论在整风运动前还是在整风运动中都以极大的精力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不仅提供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给整风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演说，阐明了这场运动的方针和方法，从批判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唤起人们学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自觉性，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办事的自觉性。

首先，整风运动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必须分清马克思主义同主观主义的思想界限，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整风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于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

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①毛泽东提出的整风运动的方针，完全符合党组织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而获得巩固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方针，既反对了那种闭眼不看党内矛盾、分歧，主张无原则和平的右的倾向，又反对了那种夸大党内矛盾、分歧，主张不问情况如何，一律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倾向。只有采取这样的方针，才能做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使党在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一天天兴旺发达起来。

为了实行这个方针，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地揭露了党内主观主义一类歪风产生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分析了这些歪风的历史演变及现实表现。从阶级根源来说，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它的很大数量的成员又出身于这个阶级，所以很容易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带到党内来。从认识论的根源来说，它是由于党内一些同志不了解唯物论的反映论，不了解认识过程的辩证本性，因而常常陷入盲目性、缺少自觉性所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一类东西，既和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有很深的渊源，又和“五四”时期产生的洋八股、洋教条直接相关。“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下同），第786页。

继续或发展”。^①这类东西在党内流传，也经历过一个演化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到了整风运动时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毛泽东认为，肃清这些东西很有好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②同时，弄清这些，还可以使党在清算主观主义一类歪风时，注意到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社会现象，不仅有它的阶级基础，而且有它根深蒂固的传统，千万不可鲁莽从事，操之过急。

其次，整风运动要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变为党在从事革命活动中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使党在争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斗争中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系统地揭露了党内主观主义者在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的严重脱离实际的种种表现，他痛切地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③正是

①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② 同上。

③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把生动活泼、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窒息人们思想、束缚人们行动的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教条,严重地妨碍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因此,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能抬头,党性才能加强,革命才会胜利。

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的特点之一,是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他们记诵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个别词句,便以不折不扣的“理论权威”自居,到处充当“钦差大臣”,仅仅根据自己的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限于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结论和公式,而更重要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结论和公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客观情况的结果,它们都和一定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密切联系着。因此,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也不懂得,理论来源于实践,还必须回到实践,在实践中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要力求精通它,但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不把它应用到实际斗争中去,那不是尊重理论,而是扼杀理论,使理论变成毫无生气的东西。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对理论与实际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理解,给理论下了一个明确的界说,彻底澄清了教条主义者在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等问题上所造

成的糊涂观念。他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①而我们所要的理论家，则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②如果在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之后，只知背诵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那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除了自恃理论水平高之外，还特别标榜他们有渊博的知识。他们从外国故纸堆里零星地捡到一些希腊和其他外国故事，便自以为很了不起；他们又以能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词句而炫耀。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认识要完全地反映事物就必须经过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的理论，明确地区分了什么是完全的和什么是所谓一知半解。他指出：“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③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大都是前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的总结。人们学习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轻视书本知识，就会导致狭隘的经验论。但是对于没有实际经验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5页。

② 同上书，第772页。

③ 同上书，第774页。

的人来讲,这种书本知识还是片面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别人证明而他们自己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東西。他们都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因此,“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①

主观主义者的致命弱点,就是脱离实际。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他对“实事求是”一语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指出了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反对教条式的或经验论形式的主观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做到将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毛泽东就把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活动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问题具体化了,把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从理论领域推进到实际工作的领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

第三,整风运动要同改善领导方法,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结合起来。

为了彻底地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他要求全党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坚决摒弃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正确领导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党在领导革命活动中把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起来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毛泽东把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规律运用于领导工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作，制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也就是从实践中来。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在实践中表现了无限的创造力，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尊重唯物论，尊重实践，首先就要尊重群众。脱离了群众，也就脱离了实践，在认识上必然陷入主观主义，在政治上往往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回到群众中去，这就是用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领导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被群众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应当坚持；凡是不符合群众要求、为群众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当改正。从一方面来看，是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群众、领导、群众的过程。每个过程中对立的双方不断发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如此循环，不断发展，既改造了客观世界，又改造了革命队伍本身的主观世界，既提高了群众的认识，又提高了领导的认识。这样，就把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完全统一起来了。

毛泽东还根据人们认识事物总是经过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这样辩证的认识途径，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

归于落空的危险。”^①一般号召的作用，是使领导的意见、方针、政策能迅速地直接地与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否认一般号召的作用是不对的，但这种一般号召，决不可脱离个别指导。离开个别指导，一般号召不仅无从产生，而且，即便有了现成的一般号召，若不通过个别指导的方式来实行和推广，那么，一般号召就会失去其具体的丰富的内容，变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洞的口号和公式，根本不能起到普遍指导的作用。同时，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的工作方法，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的组成部分。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这样沿着螺旋式的曲线不断地运动，就使领导与群众的认识及实践不断地进到高一级的水平，使革命的理论 and 革命的实践不断地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成功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左”右倾错误，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使广大党员和干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起来，这就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伟大的整风运动既为党的思想建设找到了一种适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合于党内斗争的运动形式，也为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提供了一种理论同实际结合的学习方法，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建党学说的一个伟大贡献。

**坚持统一战线，依靠人民群众，
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出现了错综复杂、奇异多变的情况。为了坚持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依据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灵活地、巧妙地利用各种矛盾，通过必要的让步和妥协，通过不同形式的斗争和批评，把一切积极有利的因素团结起来，把一切消极有害的因素孤立起来，从而卓有成效地争取了多数，孤立了少数，使自己在斗争中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把唯物辩证法具体地运用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光辉典范。

首先，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灵活地利用各种矛盾，建立斗争中的优势。

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策略思想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战胜异常强大的

敌人，绝不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冒险硬拼，而必须善于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去分化敌人的营垒，争取自己的同盟军。这样，革命力量虽然在总体上暂时处于弱者的地位，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问题上，却可以建立起自己相对的优势；弱小的革命力量完全能够把强大的敌人分割包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

实行这一策略原则，既是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于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论述这一策略思想、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紧紧地抓住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并且分析了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分析了地主买办阶级营垒内部的矛盾和分化，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形势、阶级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都不是凝固不变的。他要求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不但要善于区分同盟者和敌人，而且要善于区分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把力量集中在反对主要敌人上，绝不能同时反对几个敌人，更不能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同时，还要善于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其次，毛泽东全面阐明统一战线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反对只斗争不联合或只联合不斗争的两种片面性。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陈独秀实行的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实行的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方针。这两种极端的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鉴于历史的教训，毛

泽东提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一方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极不稳定的同盟者，同他们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主要的敌人。另一方面，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又要依照他们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动性，同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至军事上进行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毛泽东从联合、团结中看到矛盾和斗争，又通过斗争来达到联合和团结。这就反对了两种片面的极端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

在论述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时，毛泽东特别详尽地论述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情况。他指出，我们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共顽固派的反革命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加以孤立的政策。他还指出，即使对汉奸亲日派中的两面分子，也应加以区别，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即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和孤立，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

根据历史的经验，毛泽东阐明了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的辩证法。他说：“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②

①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

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3页。

这是因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是极端仇视和残忍的。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寻。同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务使每一斗争取得胜利，不仅是保存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所必须，而且也是迫使顽固派继续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所必须。但这种斗争应当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不可以无限制地使用。认为任何斗争都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都是把统一战线中团结和斗争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其结果，必然是或者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错误，或者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错误。

再次，毛泽东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紧紧地把握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明火执仗的军事“围剿”，变成了通过“合作”而进行的阴谋暗算；昨天还是兵戎相见的仇敌，而今却戴上了“朋友”的面具。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好走极端的分子，被第二次国共合作冲昏了头脑，产生了右的倾向。他们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抹杀国共两党的原则界限，说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美化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中枢”。他们只讲民族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甘愿充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尾巴。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告诫全党牢记陈独秀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自觉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他强调指出：“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

为了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阐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毫无疑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就把中国推向了严重的民族危亡的关头，使全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开展阶级斗争、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首先就要投入到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日派。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使整个民族得到解放，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才有获得解放的可能。毛泽东在讲到这一点时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②这种情况，表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又是包含着差别的一致；因此，坚持民族斗争，并不要求取消一切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虽然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使中

①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②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4页。

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中国内部各阶级的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但是,这些处于次要地位的矛盾并未减少或消失。事实上,参加抗日民族战争的各阶级和各政治派别,尤其是其中的无产阶级和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①一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战争的利益;为了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应该并实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让步。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这种让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有原则界限的而不是无边无际的。加入统一战线的任何政党,必须保持其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保持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这样才有利于合作,有利于统一战线。如果否认这种独立性,否认照顾各阶级的利益,那么,合作就变成了混合,其结果必然是牺牲统一战线。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实行有限度的、必要的阶级斗争,不仅不会妨害统一战线,相反的,正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是发挥各阶级的积极性以坚持全民族的抗战所必须的。这些,就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之间的对立统一。

很显然,坚持独立自主既然以实行统一战线为前提,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就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有条件的而不是不受制约的,把这种独立性夸大为绝对的、不受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任何制约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明确这一点，对于正确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时，一方面，要使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要使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而在采取自主行动时，又要随机应变，因时因地因具体条件制宜。既不能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又不可冒冒失失地乱碰乱撞。毛泽东提出，在不破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应该采取灵活的策略去发展革命势力，如“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等，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只讲民族斗争、否认阶级斗争，只讲统一性、否认独立性；或只讲阶级斗争、否认民族斗争，只讲独立性、否认统一性，都是片面的，都是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把统一性与独立性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的表现。将这两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是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因而能够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牢牢地掌握住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最后，毛泽东一贯把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同建立人民的政权联系起来，指引人民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

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毛泽东及时地提出必须在抗日根据地内部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权。“这种政权，

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①这种政权，和旧政权不同，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也和未来的新政权不同，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当抗日战争逼近胜利，毛泽东又及时地提出，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成果，应当“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②在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以后，毛泽东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在空前扩大和巩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系统地说明了将要建立的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各个阶级和各种经济成份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以及这个国家的前途，更为完整地阐发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

①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

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①革命的统一战线绝不能离开革命的这一根本问题和根本目的。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两者之间的联系，不仅对统一战线的政策作了深刻的论证，把统一战线的成果及时地巩固下来，给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而且表现了在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中高瞻远瞩的伟大抱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两次规模巨大、战功卓著的革命战争，是对夺取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决定意义的伟大的革命战争。这两次革命战争以至整个民主革命所提供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的经验，关于落后的大国反对帝国主义强国侵略的经验，关于组织广泛的革命大军消灭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国内反动统治的经验，关于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党、自己的政权的经验等等，都是同毛泽东的卓越的领导分不开的，也是毛泽东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的结果。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早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1927年至1949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6页。

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胜利。它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上，在中国革命多方面的运用和展开上，已经成熟起来，发展到新的高峰。

* * * *

建国以来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一步表明，什么时候我们按照毛泽东所阐述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办事，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它们，我们的事业就倒退，就失败。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之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取得辉煌的胜利，就是因为党一不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现成答案，二不靠盲目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现成模式，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集中全党的智慧和群众的经验，从而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相反地，党在以后的建设事业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了“左”的错误，脱离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根本原则，结果便遭到了严重挫折；特别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毛泽东所阐述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任何时候都是违背不得的。历史的发展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当着毛泽东在几十年中坚持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办事，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的时候，他的思想和实践是何等光芒四射，为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何等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因此，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拨乱反正，正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正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使一切敌对思潮、各种错误倾向、形形色色的叫骂和“围剿”，都相形见绌，而它自身却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从一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发展成为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巨大力量。历史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而今天，又正是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新起点，也是我们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出发点。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夺取马克思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复习思考题

1.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三次论战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试述毛泽东是怎样从实践中找到中国革命道路的？
3.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怎样从哲学上反对教条主义的？
4. 试述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5. 毛泽东是怎样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建设中国共产党的？
6. 毛泽东是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来阐明统一战线的？
7. 为什么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学习书目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再论问题与主义》，见《李大钊选集》

李 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见《李达文集》第1卷

毛泽东：《民众大联合》（一）（二）（三），见《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

《实践论》

《矛盾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

《战争和战略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附录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若干重要人物简介

狄 慈 根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生于德国,只受过中等教育。狄慈根在俄国彼得堡一家制革厂做工时,独立地研究了许多哲学问题,并且得出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极其相近的结论。后来,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和帮助下,系统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有所创新,成为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哲学家。

狄慈根的哲学著作有,《人脑活动的本质》(1868年)、《论逻辑书简》(1880—1883年)、《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6年)、《哲学的成就》(1887年)等。马克思看到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的手稿之后,写信给恩格斯说,“狄慈根的论述,除去费尔巴哈等人的东西,一句话,除去他的那些来源之外,我认为完全是他的独立劳动。”^①恩格斯也认为狄慈根的“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文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科学修养的情况下得出这样多正确的结论。”^②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5页。

② 同上书,第182—183页。

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①

“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狄慈根的著作中。他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并且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狄慈根明确指出:“世界只有一个,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存在的总集……都来自一个共同的自然的自然。”^②他认为人的意识、精神是人脑这种物质的属性。

狄慈根把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运用于认识论领域,同不可知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一切事物是思维的对象,也是思维的内容。”^③他认为人们的认识是通过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即从对现象的认识进到本质或自在之物的认识。在他的认识论中,也论证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他认为整个的自然界,即客观世界本身,就认识要把握的对象来说,就是绝对真理。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认识是通过相对真理来进行的。我们对每一个真理的认识,都不是完全一样,而是近似的,或反映着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或一种关系。他说:“我们的视力是有限的,我们的听力、触觉等等,以及我们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却知道这一切事物都是无限的有限部分。”这就是说,“在相对真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无限的”绝对的真理。

狄慈根对辩证法也做了独立的研究。他的《论逻辑书简》就是专门讨论辩证法问题的。狄慈根认为,整个客观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物质世界,事物的发展是由事物内部矛盾引起的。他非常称赞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不赞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是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吸取这一思想的。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② 《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84页。

③ 《人脑活动的本质》,《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7页。

狄慈根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但在他的理论中也有比较严重的失误。比如夸大人类认识的相对性。但他的错误不是主要的，而他的贡献则是主要的。列宁认为：“约·狄慈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①

拉 法 格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创立人之一，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马克思和恩格斯忠实的战友和学生。拉法格在青年时代，曾经受到孔德思想^②和蒲鲁东主义^③的影响。后来，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和影响下，逐步抛弃了孔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并成为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宣传马克思主义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一直流亡国外。1880年回国后，开始发表一系列理论文章，为在法国和欧洲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拉法格的主要哲学著作有：《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5年)、《宗教和资本》(1887年)、《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1895年)、《财产及其起源》(1895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1900年)、《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等。此外，还写有《回忆马克思》和《忆恩格斯》两篇传记性的文章。

宣传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是拉法格哲学著作的主要内容之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53页。

② 孔德(1798—1857)，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否认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性，认为科学的任务只是描写人的主观感觉。

③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一。拉法格的哲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战斗性。他把哲学看作是批判各种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的锐利武器。他注意宣传唯物史观就是从这种革命需要出发的。在九十年代，他深刻地批判了让·饶勒斯的唯心史观。饶勒斯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法国社会党国会党团领袖、哲学教授、机会主义思想家。饶勒斯利用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宣扬唯心史观，攻击和歪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鼓吹“进化论”，反对马克思的革命论，用合法主义来代替阶级斗争理论。拉法格同这种唯心史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认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是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所引起的，这种矛盾才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源泉。因此，他写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从唯心论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他还进一步反驳说，按照饶勒斯的说法，“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的博爱和正义的概念，导致人类的发展。但是假如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末就不会有历史的进化，因为人永远不会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在这阶段上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正义的概念和在这阶段上博爱的感情比在任何其他的社会环境更能自由表现出来。”^①拉法格对其他唯心史观的代表人物也作了一般方法论的批判。他批判说，以往的历史观为了寻求历史各种现象的原因，去求助于超自然的某种力量，绝对观念、世界理性，这样的历史观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不科学的。只有唯物史观，才能够科学地说明各种社会的复杂现象。

批判新康德主义，宣传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拉法格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要内容。针对新康德主义极力复活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活动，拉法格指出，宣扬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是害怕事物客观进程，害怕客观真理的资产阶级的需要。拉法格坚

①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11 页。

持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他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客观的经验事实，连数学的抽象公式也来源于经验和实践。他曾用尼罗河泛滥迫使埃及人发明几何学的初步原理，以便在河水泛滥淹没界标时有可能分配土地来证明认识是对客观实际的反映。

为了进一步探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在他的晚年，专门写了《思想起源论》一书，对马克思的反映论作了鲜明的阐发。

恩格斯对拉法格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很高的评论，称他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当中最好的著作家”。列宁也称赞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拉法格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陷。比如，他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决定论”，这是不恰当的。

拉布里奥拉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是罗马大学教授，曾是罗马一位有名望的黑格尔派哲学家。早年站在空想社会主义立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逐渐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此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893年12月，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里，称拉布里奥拉为“马克思严格的追随者”。拉布里奥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论丛》。他的理论活动对意大利共产党和知识界发生过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拉布里奥拉的理论活动，主要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他针对斯宾塞^①的反动理论，系统地科学地宣传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

① 斯宾塞(1820—190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实证论认为物的本质不可认识。在社会学上他提出有名的社会有机

持和捍卫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总结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

他批判斯宾塞的资本主义社会无矛盾论或自然永恒论。他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的动力，是生产力和工具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造成的阶级的冲突和斗争。而这一切都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原因所决定的。他还着重论证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他说，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想发现“经济因素”而把其他的一切东西作为废物抛掉这是不对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直接用经济结构来说明一切是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作法。他认为，新建立起来的经济结构，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往往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弯弯曲曲地创造出合适的政治、法律、道德等的形式，建立起适宜的政治秩序，安排出比较完善的社会调整方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前进。在讲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时，他还特别考察了科学的产生和作用。他认为，科学不仅推动生产的发展，而且，它具有反对黑暗、迷信、教会和宗教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它的基础上还发展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因此，科学决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财产，而是人类共同的财产，这个科学还可以是共产主义从以往世纪毫无保留地继承过来的唯一遗产。

拉布里奥拉宣传唯物史观，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他指出，社会是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不是生物学的永恒的，而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证明资本主义规律的相对性，同时也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基础的剥削不能在这个制度范围内消灭，只有靠革命无产阶级打碎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论。根据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服从生物学规律，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似乎带有“自然的”和“永恒的”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内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完善的和“最和谐”的制度。

拉布里奥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有某些比较严重的错误。他在认识论上对不可知论作了错误的让步，承认有某些领域人们的认识无法达到。另外，他还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认为意大利民族是属于积极民族之列的，它在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中落后了，应当急起直追。拉布里奥拉的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的这一错误曾受到普列汉诺夫的严肃批判。但拉布里奥拉的功绩是主要的。

梅 林

弗兰茨·梅林(1846—1919)是德国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869年梅林在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同时，参加了柏林激进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活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科比和魏斯交往，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前，梅林开始接触和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逝世时，他撰文赞颂马克思：“十九世纪的革命事业在这个人身上达到了最高和最纯的程度，约翰·雅科比在他旁边犹如侏儒依傍巨人。”后来，梅林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也刊登梅林的文章。1890年梅林写了《林达乌的怪事》和《资本和报刊。林达乌的怪事的结局》，从斥责资产阶级记者林达乌到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从此梅林与资产阶级决裂，离开了柏林《人民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力地支持了梅林，《前进报》和《新时代》都赞扬《资本和报刊》一文对资产阶级的揭露。从1891年6月起，梅林以柏林通讯员名义为《新时代》撰写社论，同年梅林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92年梅林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莱辛传奇》。

梅林在《新时代》上发表的作品，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赞扬。恩

格斯说：“他为《新时代》撰写的社论确实是十分精彩的，我们每次都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待这些社论。”^①恩格斯说梅林“很会写东西”，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理解历史事件”，特别赞扬“《莱辛传奇》写得极好”“感到十分满意。这的确是一篇出色的作品”。^②恩格斯指出梅林这个著作的“巨大功绩”就是：“在普鲁士历史这一摊污泥浊水里清出一条路来，并指出了事物的真正联系。”恩格斯因此欣慰地说：“令人鼓舞的是，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③当1893年《莱辛传奇》以单行本出版后，梅林马上给恩格斯寄去，恩格斯就此写了给梅林的一封极为重要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信。

梅林卓有成效地致力于德国史的研究。1895年他准备写一部多卷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得到恩格斯的支持。1897年底到1898年初，梅林完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这部名著。

1898年开始，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梅林的态度非常鲜明。1902年4月梅林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他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写得很尖锐，引起修正主义分子的憎恨，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累斯顿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分子发起了对梅林的攻击，梅林为此在会后写了小册子《我的辩护》，以回答修正主义分子的攻击。在窃据党领导地位的考茨基的中派面目暴露以后，考茨基为了打击左派，相继把梅林从《新时代》和把卢森堡从《莱比锡人民报》排挤出外。1913年12月梅林和卢森堡等人一起创办了左派第一家独立刊物《社会民主党通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

① 《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97页。

② 同上书，第310页。

③ 同上书，第310页。

战爆发，党内的右派公开背叛无产阶级而支持德国帝国主义，梅林以辛辣的语言痛斥这伙叛徒。1915年4月，梅林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组织出版《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周刊》，从此他们被称之为国际派，即后来的斯巴达克派。梅林经常在刊物上痛斥艾伯林、谢德曼之流，也无情地批判考茨基。1916年5月1日斯巴达克派组织了反战大示威，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因此被捕，梅林因为组织抗议审判他们的活动，也被监禁，后因梅林患病释放。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梅林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一起创建了德国共产党。

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梅林由衷地热烈欢迎十月革命，他写了《布尔什维克和我们》、《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等文章，拥护俄国革命，支持布尔什维克，批判考茨基对十月革命的攻击。

1918年春梅林出版了《马克思传》，他写这部著作从开始计划、搜集材料到写作完成，共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马克思传》写成于1916年，因战争而在1918年才出版。梅林在该书中虽然有过分推崇拉萨尔和对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的斗争作了不正确的评论的缺点，但该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1919年1月梅林在重病疗养中获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的消息而深受刺激，患肺炎于1月29日逝世。

梅林不愧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斗争中，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主要著作有：《莱辛传奇》（1893年）、《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年）、《马克思传》（1918年）、《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史》（1910-1911年）、《哲学史论文集》、《文学史论文集》等。梅林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中，特别深刻研究和精辟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庸俗唯物主义、叔本华和尼

采的唯意志主义以及对修正主义及其哲学基础新康德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列宁赞扬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①

考 茨 基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出生在捷克一个名画家的家庭。学习于维也纳大学哲学系。1875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随后又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考茨基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工人运动。他的政治活动和哲学观点可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他受路易·勃朗、拉萨尔、杜林等人的影响较多。这时，他的哲学观点是折中主义的，政治观点是改良主义的，信奉达尔文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当时，他对马克思还抱着淡漠的态度。从七十年代后期，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是他政治活动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他直接接触了许多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认真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直接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和帮助，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1881年，他随同倍倍尔来到伦敦，初次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经倍倍尔介绍，担任了恩格斯的私人秘书。1883年，他在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时代》杂志(1883—1923年)，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他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一直到1917年。在这一时期内，考茨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他先后写了一系列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婚姻和家庭的起源》(1882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8年)、《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年)、《近代社会主义的先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3页。

驱者》(1894年)、《土地问题》(1899年)、《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1899年)、《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基督教之基础》(1908年)、《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贡献》(1908年)等等。考茨基这些通俗的著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些著作曾用好几国文字出版过许多次,在各国马克思主义小组里被研究过。他的这些著作,对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都曾经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

首先,通俗的、系统的传播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辩证法思想。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用来宣传《资本论》(第一卷)的。他的书完全是按着《资本论》的逻辑安排的。他在转述《资本论》内容的时候,并不求助于引证原著,而是努力想把马克思的思想过程再现出来,并且努力引导人们如何学习《资本论》和掌握它的要领。

考茨基通俗化传播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的时代,宣传新的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考茨基在宣传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辩证法思想时,还力图“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他对《资本论》中阐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了通俗地说明。他强调指出,马克思“证明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他第一次研究了资本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他第一次证明当前社会运动的目的是过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人们良心发现某种‘永恒正义’后随便提出来的。”^①这些现在看来很通常的道理,但在那个时代,却醒人耳目,起到了教育和鼓舞的作用。

此外,考茨基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广泛地研究了历史观上其他一些问题。他认为,我们必须历史地考察各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从而掌握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如果我们不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便不能在阶级斗争中变成一个有意识和眼光远大

①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09页。

的战士。”^①

考茨基的最后一个时期，是由于他以往理论上的折中主义及进化论等思想没有认真的克服，致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酿成了严重的错误。比如，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极力加以回避。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他的这些折中调和的立场和错误观点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了。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成为顽固的反对者，终于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列宁同他的错误进行过严肃的斗争。尽管如此，列宁在批判他时还公正地指出：“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善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②

① 《基督教之基础》，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 17 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249 页。

附 录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大事简表

1818年

卡尔·马克思于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

1820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巴门市。

1835—1836年

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

1839—1941年

马克思研究希腊哲学，写作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

马克思毕业于柏林大学，随后又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在柏林大学旁听，和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兄弟、弗·科本等人交往，并在自己写的《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及《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等著作中尖锐地批判了谢林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基督教的本质》。

1842年

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后又任该报主编。

马克思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发表。

马克思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第一次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恩格斯服兵役期满，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在赴英途中访问该报编辑部，和马克思第一次见面。

恩格斯直至1844年8月前，着重研究英国的社会状况，同时研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

1843—1844年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迁居巴黎，筹备《德法年鉴》的出版。

马克思在赴巴黎前，在克罗茨纳赫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为《德法年鉴》写《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恩格斯为《德法年鉴》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由此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随后恩格斯又在巴黎拜访了马克思，从此开始了两人的友谊和合作。

马克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进行了经济和哲学研究，部分成果反映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恩格斯在巴门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时，共同商定合写一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即《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分别着手批判青年黑格尔分子麦·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1845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出版。

马克思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恩格斯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1846—1847年

马克思、恩格斯写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主要章节，由于书报检查未能在德国付印。

马克思写《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并于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恩格斯写《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补充。

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的委托，撰写《共产主义原理》的纲领草案。

马克思、恩格斯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受大会委托拟定同盟纲领。

1848年

共产主义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被缺席选入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恩格斯从法国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革命。

《新莱茵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任该报的主要领导工作，恩格斯撰写了大部分社论。

马克思写《革命运动》一文，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发展，德国和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1849—1852年

恩格斯参加一系列武装起义和军事活动，随后又在曼彻斯特开始系统地研究军事理论问题。

马克思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其历史。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斯的信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

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阐述了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

恩格斯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

1853—1860年

马克思继续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继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军事科学,撰写一系列军事评论和军事理论文章,并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有关军事科学的条目。

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有关美学的条目。

马克思着手写他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草拟了这一著作的《导言》,提出撰写这一著作的计划要点和研究方法。

马克思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愿意用两三个印张阐述辩证法,使一般人都能理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时,阐述了有关文学和美学问题的主要原理;恩格斯也对拉萨尔的剧本提出了批评。

马克思接到《美国新百科全书》邀请他撰写关于黑格尔条目的建议,要求他对黑格尔的观点不要进行批判,被马克思所拒绝。

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认为达尔文的学说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认为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越来越证明了用辩证唯物主义态度研究自然界是正确的。

1861—1870 年

马克思长期在英国博物馆写作,为完成《资本论》新的手稿而紧张地工作,并从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书籍中作了大量摘录。

马克思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临时委员会委员,他认为这个协会的成立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恩格斯继续研究自然科学问题,撰写军事评论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在通信中对工人哲学家狄慈根的世界观给予很高的评价。

马克思写信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分析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形势,认为任何战争都不能长期地使历史车轮倒退,第二帝国的失败可能会引起法国革命。

1871—1883 年

巴黎在 1871 年 3 月 18 日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为总结这次革命写了《法兰西内战》一书。

马克思、恩格斯为反对巴枯宁主义,从理论上写了一系列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作了大量的札记和写了一些片断。

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科学地预见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继续修订《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马克思特别重视人造细胞的试验,认为它对解释生命起源有重大意义。

恩格斯为批判杜林的观点,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首先写出《反杜林论》第一篇(《哲学篇》),发表在 1877 年 1 月至 5

月的德国《前进报》上。1878年全书正式出版。

马克思表示他和恩格斯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东西。

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有关章节改写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研究原始公社制度，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详细摘要。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恩格斯为整理马克思的理论著作和出版他的遗著而紧张地工作。

1884—1895年

恩格斯写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充分利用了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

经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相继出版。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

恩格斯阅读了意大利社会主义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的《论社会主义》和《历史的哲学》，对前者表示赞誉，对后者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

恩格斯复信给“青年派”首领之一保·恩斯特，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

恩格斯应康·施米特和约·布洛赫的请求，在书信中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原理。

恩格斯就研究黑格尔著作提出许多建议，一方面强调正确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原则区别。

恩格斯阅读弗·梅林的著作，给以很高的评价，特别认为《莱辛传奇》一书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普鲁士的历史，

对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恩格斯写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后译成德文，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继续从事早在四十年代开始的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写成《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

恩格斯写信给德国大学生瓦·博尔吉乌斯，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原理，特别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历史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多次会见在伦敦暂住的普列汉诺夫。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导言。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

恩格斯逝世后，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杰出的代表，他诞生于1870年4月22日俄国的辛比尔斯克（现为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从青年时期起就参加革命活动，钻研马克思主义，还在1894年就写出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等著名的哲学著作。

1896—1899年

列宁在狱中开始准备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在1899年4月出版问世。

列宁在1895年写成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发表于《工人》文集第1—2期上。

列宁因“斗争协会案”被流放西伯利亚东部，为期三年。

列宁与流放中的弗·维·林格尼克通信，主要讨论哲学问题。

1900年

列宁秘密居住在彼得堡，同回到俄国来的维·伊·查苏利奇会见，商谈关于“劳动解放社”参加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和杂志在国外出版的事宜。

列宁动身去德国。途中，先在苏黎世访问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后在日内瓦再访格·瓦·普列汉诺夫，同他们讨论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事宜。

1901—1902年

《火星报》编辑部在制定党纲时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列宁直率地批评了普列汉诺夫所写的理论部分，普列汉诺夫也不同意列宁所写的土地问题的某些论点。

列宁写作《怎么办？》一书的序言，3月中旬该书即在斯图加特出版，书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奠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1904—1905年

列宁写信给波格丹诺夫，批判他的《经验一元论》一书。

列宁撰写《俄国革命的开始》，号召准备武装起义。

列宁在革命高潮中回到俄国，在彼得堡直接领导革命斗争。

1906年

列宁为了批判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一书（第三版），开始腾出时间来研究哲学，并给波格丹诺夫写了一封关于哲学问题的长达三个笔记本的信，原打算以《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为题公开发表，后因故未能实现。

1907年

列宁撰写卡尔·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小册子的俄译本序言，该书由列宁校订，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

列宁为自己的《十二年来》文集（三卷集）作付印的准备

工作。

1908年

列宁再度侨居日内瓦。在革命低潮时期，他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恢复和筹办党的机关报上，以便同颓废消沉的倾向作斗争。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秘密的《无产者报》第21号见诸于世了。

由于《新时代》杂志登载了一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哲学问题上的斗争的评论，列宁召集《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列宁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声明。接着，列宁又给高尔基写信，指出必须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列宁开始写《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

列宁应邀去喀里普岛访问高尔基，他在那里向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声明，在哲学问题上同他们有分歧。

列宁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写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列宁写《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作为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印诺肯齐）在日内瓦就波格丹诺夫的报告所做的发言的提纲。

列宁写信给敖德萨的瓦·瓦·沃罗夫斯基，告诉他同波格丹诺夫集团在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加深，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建议波格丹诺夫在报刊上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

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序言，并把该书的手稿按秘密地址寄出，准备在莫斯科公开出版。

1909年

列宁在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中做了关于哲学问题的讲演。

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莫斯科出版。

列宁就工人政党和宗教问题在巴黎《无产者报》编辑部俱乐部做报告，同时撰文分别在《无产者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

列宁在巴黎的索尔邦图书馆研究有关哲学和自然科学问题的著作。

1910—1911年

列宁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那里同普列汉诺夫商谈了共同创办《工人报》和《明星报》的问题。

列宁的《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等文章先后在《明星报》等报刊上发表。

1913年

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在《真理报》第50号上发表。

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专刊《启蒙》杂志第3期出版，其中刊有列宁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列宁两次写信给高尔基，揭露造神说的反动本质，并批评高尔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列宁研究德文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作了提要 and 摘录，同时撰写《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

1914—1915年

列宁草拟《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计划，并为该文集写序言和结束语。

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全书》写《卡尔·马克思》一文，于1914年11月17日将手稿寄给俄国格拉纳特百科全书出版社。

列宁在伯尔尼图书馆研究费尔巴哈、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他在题为《哲学笔记》的笔记中，作摘要、订提纲，写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草稿。

1916年

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先在伯尔尼图书馆，后在苏黎世图书馆。该书于7月初写完，随即将手稿寄给“帆船”出版社。

1917年

列宁于8—9月间在秘密状态中写成《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

列宁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写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一封信《马克思主义和起义》。9月15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列宁的这封信以及另一封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加米涅夫反对列宁提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斯大林回击了加米涅夫的进攻。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把列宁的信分发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各大组织。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7日晚十时四十五分在斯莫尔尼开幕。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列宁做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

1918年

列宁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提出了实现从夺取俄国到管理俄国的战略转变这一伟大任务。

列宁在10月初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写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1919年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

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

1920年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

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一著名论断。

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

列宁写《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中国出版。

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对罗素等人的改良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1921—1927年

列宁写《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提出新时期哲学的任务。该文载于1922年3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第三期。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同时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上总结了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

列宁于1924年1月24日逝世。

斯大林先后发表《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演说和著作，坚决捍卫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

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引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工农群众，研究革命实际问题。

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了革命的敌我友，明确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到湖南湘潭、长沙等五个县考察农民运动情况，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农民运动、如何正确解决革命同盟军的问题。

毛泽东出席了党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提出武装夺取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后，率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并领导三湾改编，建立了工农红军。

1928—1937年

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文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在毛泽东主持下，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强调洗刷唯心精神要进行社会调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上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胜利到达陕北。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彻底清算了“左”倾关门主义，从理论上政策上系统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发表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它是一部马列主义的军事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报告和结论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

毛泽东发表了伟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

毛泽东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

1938—1945年

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军事著作。

毛泽东写《〈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并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法宝。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一部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性著作。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重要报告，全面系统地制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及有理、有

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毛泽东发表《论政策》一文，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党的政策。

毛泽东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一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极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党领导文艺的纲领。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运用到领导方法中去。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学习和时局》的重要报告，对于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作了基本总结，为召开党的七大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这次大会标志着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在党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提出和美蒋进行斗争时要坚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其中讲到几个理论问题。

1946—1949年

毛泽东发表了《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在打倒蒋介石统治集团、建立新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伟大纲领。

毛泽东发出关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等重要指示,使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提出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规定了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政治上、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